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文丛

# 省港大营救 与文化统战研究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港澳和海外统战工作理论广东研究基地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 著

鲁开垠 主 编  
冯颖红 肖 莉 副主编

鲁开垠 冯颖红 肖 莉 陈童敏 林 伟 张 山 刘伟炬  
杨竞业 谭建军 林少红 杜联藩 田千山 张 婷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省港大营救与文化统战研究 /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港澳和海外统战工作理论广东研究基地,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编著; 鲁开垠主编; 冯颖红, 肖莉副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2.12

ISBN 978-7-218-16435-9

I . ①省… II . ①中… ②广… ③鲁… ④冯… ⑤肖… III . 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研究 IV . ① D61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 2023 ) 第 001292 号

SHENGGANG DAYINGJIU YU WENHUA TONGZHAN YANJIU

### 省港大营救与文化统战研究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港澳和海外统战工作理论广东研究基地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著  
鲁开垠 主编 冯颖红 肖莉 副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梁 晖

责任技编: 周星奎

装帧设计: 奔流文化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10号 ( 邮政编码: 510199 )

电 话: ( 020 ) 85716809 ( 总编室 )

传 真: ( 020 ) 83289585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佛山市迎高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2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 020-85716849 ) 联系调换。

# 前 言

QIANYAN

在2022年7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回首百年，广东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一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先河的开创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确立了国共党内合作统一战线的政策。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国民党被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广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发源地，并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二是营救中华民族文化精英的主阵地。1941年12月至1942年11月，广东各级党组织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转战粤港澳三地，组织营救滞留于香港沦陷后处于困境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使他们脱离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从而为新中国建设以及中华民族文化赓续发展保留了重要的民族文化火种。三是改革开放统一战线先行先试地。广东积极推动统一战线为经济建设

和改革开放服务，率先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人力支撑；率先在全国开展了港澳和海外统战工作、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率先在全国建立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暑期会议制度”。赢得了中共广东省委原书记林若“广东改革开放，统一战线功不可没”的称赞。四是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出台地。2010年5月，广东省制定颁发《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成为全国第一个省级规范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制度建设的文件，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发展提供了制度样板。

文化统战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统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任务，在文化领域开展的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的团结争取工作，以正确的文化理念为引领开展统战工作，运用各种文化力量、借助各种文化手段开展的统战工作。文化统战探索于大革命时期，始建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左联团结引导，形成于组织动员文化界人士“以笔为戎”的烽火抗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专制的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新时代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明确提出“共建人文湾区”，为新时代文化统战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时代要求。

1941年底发生在粤港澳三地影响全国的省港大营救，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保护中华民族文化精英而精心部署、组织有序、成效显著的文化统战实践。80年来，省港大营救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渐行渐远。中国统一战线理论会港澳和海外统战工作理论广东研究基地和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始终以宣传教育和研究统一战线的历史、理论和方针政策

为己任，数年来，把省港大营救作为广东统一战线历史性贡献的重大课题，从文化统战的视野，挖掘统战红色资源，深入调查研究，通过课堂教学、现场教学、展览展板、理论研讨、与党刊合作等途径，展示党的文化统战实践的强大生命力，使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广为人知。今天呈现的《省港大营救与文化统战研究》一书，是集全省统战系统、社会主义学院系统之力形成的成果。省港大营救的意义在于它意味着不仅是几百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虎口脱险，无一伤亡的营救结果，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统战的伟大胜利，更是为了唤醒历史记忆，体现历史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为开展新时代文化统战工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启示。

本书以省港大营救为基本线索，以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为主题，以党的坚强领导和各级党组织的有力贯彻执行为依据，还原省港大营救的历史原貌，提炼其时代价值。全书主体共六章，包括“历史背景：中国文化人的大浩劫”“部署营救：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合力营救：广东各界的历史贡献”“伟大创举：省港大营救的重大历史意义”“理论价值：省港大营救对文化统战思想的贡献”“实践启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统战的新发展”。编写中遵循了以下原则：

1. 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深入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为依据，完整地还原了这场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奇迹历史，彰显出广东对党领导的文化统战的历史贡献。

2. 坚持以史为主、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力求生

动地反映党中央在高度重视知识分子这一宝贵财富的战略远见、在营救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重要战略部署，清晰地展示广东各级党组织和各界人士严密组织、克服艰难险阻和倾尽心力的营救过程，揭示了这次文化统战的实践对于保护保存好中国的文脉，发挥他们在抗日战争和未来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的笔杆子”的先驱作用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

3. 坚持统一战线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要求。统一战线历来是党的总路线总方针总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省港大营救是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广东各级党组织跨越粤港澳三地、行程两万里，出色地完成了秘密护送近800名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脱险的历史任务；同时，营救了一批国际友人，维护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总结凝练省港大营救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启示，讲好省港大营救故事、广东统战故事、新时代人文湾区故事，对于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把现代化建设所需与统战所能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 目 录

## 第一章 历史背景：中国文化人的大浩劫

第一节 大营救前的动荡变局 .....	002
一、风云突变的国际形势 .....	002
二、矛盾危迫的国内形势 .....	011
第二节 大营救前的重要爱国文化力量 .....	014
一、未雨绸缪，转移阵地 .....	014
二、投身抗战，引领文化 .....	021
第三节 大营救前的坚实组织基础 .....	031
一、抗战时期香港党组织建设 .....	031
二、建立和发展东江抗日根据地 .....	037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 .....	038

## 第二章 部署营救：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

第一节 中共中央战略部署 .....	044
一、始终高举全民抗战旗帜 .....	044
二、实施大营救的战略指示 .....	046

第二节 各级党组织勇挑重担 .....	049
一、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迅速响应 .....	049
二、东江游击队的积极配合 .....	055
第三节 周密翔实的营救方案 .....	059
一、确定营救线路 .....	059
二、寻找联络并确定被营救人员 .....	068
三、克服重重困难的营救准备 .....	073

### 第三章 合力营救：广东各界的历史贡献

第一节 迂回曲折的东线 .....	078
一、穿越火线撤离港岛 .....	078
二、翻山越岭陆路撤退 .....	080
第二节 惊涛骇浪的西线 .....	093
一、隐蔽渡行撤至澳门 .....	093
二、从澳门多线疏散转移大后方 .....	100
第三节 惊心动魄的特殊路线 .....	113
一、何香凝、柳亚子的有惊无险 .....	114
二、高士其的艰险脱困 .....	121

### 第四章 伟大创举：省港大营救的重大历史意义

第一节 巩固和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126
一、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界统一战线中的政治威信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	126

二、汇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大的力量 .....	127
三、彰显了广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突出贡献 .....	129
<b>第二节 保护了中华民族文化血脉 .....</b>	<b>132</b>
一、保护文化精英逃离日本侵略者的魔掌 .....	132
二、保护文化精英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杀迫害 .....	134
三、保护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	135
<b>第三节 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 .....</b>	<b>142</b>
一、争取港英政府支持共同建立反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142
二、营救国际友人扩大了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影响力 .....	144

## **第五章 理论价值：省港大营救对文化统战思想的贡献**

<b>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统战工作 .....</b>	<b>148</b>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对文化统战的探索 .....	149
二、中国共产党文化统一战线的创建 .....	151
三、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大发展 .....	154
<b>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大营救时期对文化统战的探索 .....</b>	<b>158</b>
一、深化了文化统战的战略意涵 .....	158
二、开拓了文化统战工作的范围 .....	165
三、丰富了文化统战的策略手段 .....	172
<b>第三节 省港大营救深化了文化统战的思想内涵 .....</b>	<b>177</b>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是文化统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	177

二、广泛团结知识分子是文化统战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 .....	178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文化统战的新使命 .....	180
四、统战干部的忠诚与担当是开展文化统战的关键 .....	182

## 第六章 实践启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统战的新发展

第一节 人文湾区建设是文化统战的新实践 .....	186
一、粤港澳三地共建人文湾区的要点 .....	186
二、人文湾区的内涵剖析 .....	191
三、“人文湾区”的建设目标 .....	193
第二节 人文湾区建设的机遇和挑战 .....	197
一、作为文化综合体的大湾区的形成 .....	197
二、当前人文湾区建设的机遇 .....	199
三、当前“人文湾区”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 .....	207
第三节 发挥好大营救文化资源推动人文湾区建设 .....	211
一、大营救文化资源在建设人文湾区中的作用 .....	211
二、大营救文化资源在粤港澳三地的分布状况 .....	214
三、做好大营救文化资源的阐释和开发利用 .....	219

## 附录一 永远记忆：铭刻历史的丰碑

一、参加营救行动人员（部分） .....	224
二、经东线被营救的名单（部分） .....	231
三、经西线被营救的名单（部分） .....	247

四、经特殊路线被营救的名单（部分） .....	254
五、被营救的国际友人和盟军人员名单（部分） .....	255

## 附录二 大事年表

## 附录三 《南方》杂志对大营救研究成果的报道

### 大营救与大统战

——当我们谈“省港大营救”时，我们在谈什么 .....	276
-----------------------------	-----

最伟大的抢救 .....	278
--------------	-----

“省港大营救与文化统战”研究的时代价值 .....	287
---------------------------	-----

参考文献 .....	292
------------	-----

后 记 .....	299
-----------	-----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民族抗战先锋旗帜，率先号召中国人民站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通过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大地推动民族抗战胜利的进程。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在日本“政治诱降为主”策略的引诱下，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大肆搜捕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中共中央始终顾全大局，将大批爱国人士秘密护送至香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在香港坚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形成广泛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香港沦陷。大批爱国人士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中共中央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也为保护中国文化发展的有生力量，作出实施营救爱国人士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广东党组织与香港共产党人共同实施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爱国大营救行动。



## 第一节

# 大营救前的动荡变局

## 一 风云突变的国际形势

### （一）二战形势变化及日本侵华政策的调整

1937年7月7日，日本策动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后，日本逐步调整其侵华策略，这影响了整个亚洲的战争局势，从而也影响中国抗日形势及抗日战略。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初期继续坚持以“广田三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事变”的外交政策。“广田三原则”是日本大陆政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日本侵华早期日本政府对华的纲领性文件，在日本对外侵略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活动，并接受日本的侵略“提携”，承认日本对华北的权益，以及最终承认“满洲国”存在的“合法性”。至“八一三”事变之后，随着侵华野心的膨胀，以及企图快速吞并中国，日本政府于1937年8月17日决定放弃此前采取的不扩大方针，并于同年9月2日，将“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处理“中国事变”的政策，成为日本此后的侵华战争期间对华政策的代名词。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日本攻占广州、武汉后，汪精

卫集团投降。虽如此，但“速决亡华”计划破产，徒然扩大了战线，日本面临着战略被动的态势，因而再次改变对中国的政策。1938年12月22日近卫首相根据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而发表的第三次声明，明确提出了取代“广田三原则”的“近卫三原则”，即所谓的日中“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个原则，其核心战略转变在于：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企图以政治方法为主施行侵华，对国民党转而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阴谋联合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主要兵力用于攻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力量。就东南战场局势而言，从1940年初开始，日本军队持续展开对中国沿海的战略封锁作战。例如，在华南切断香港至韶关公路，同时进攻雷州半岛，以及对东南沿海各港口和交通线进行攻击。但为达封锁目的，日军要在沿海各要地长期驻守。中国海岸线长达一万多华里，牵制了大量兵力，日军从外部封锁相当困难，且封锁政策也影响了日本占领区的物资交流，于是，导致其加大对作为物资中转重要战略阵地的香港的侵略企图。

由于受到日本南进的威胁，美、英同盟此时试图制造并玩弄“东方慕尼黑”阴谋，力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取与日本的妥协，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采取让步纵容的绥靖政策，希望日本在解决中国问题后把侵略矛头指向苏联。同时，德、意帝国主义为了让日本放手南进，也改变自身对华政策，1938年2月，德国承认伪满洲国，撤出了其驻中国军事顾问团，并放弃援蒋策略，转而对国民党政府使用军事武力，疯狂轰炸国民党统治区，还使用了外交诱降等办法。

至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一直企图策动中日妥协的英、法被迫卷进了欧洲战场，欧洲大战的爆发使得法西斯国家与反法西斯各国间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世界各国关系的主要

矛盾。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中日战争形势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导致了我国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局面的最终形成。

## （二）日本对香港的觊觎掠夺

香港一直是中国大陆南方门户。鸦片战争以后，香港成为英国的远东经济枢纽和政治、军事前哨阵地。太平洋战争前，香港一直是向中国内地运输物资的重要通道。经香港内运的物资，1939年、1940年分别为价值1550万元、1.1亿元，分别占同期广东进口总值的16%、48%。就货物重量而言，平均每月在1500吨左右。1940年6月，曾达到6万吨的进口量。<sup>①</sup>

香港当时不仅是国际政治活动的场所，也是我国在华南地区与国际交通联系的跳板，也是输入战略物资、支援抗战的据点。国民党政府通过香港购运物资输入内地，大批爱国商人也从香港经广东惠阳游击区沙鱼涌等地运输大量的货物进入内地，以支援抗战。当时，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所接收的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捐献的物资，即由廖安祥<sup>②</sup>在香港开办的运输公司秘密运进来。据当时的密报透露，经由港沙（香港至沙鱼涌）国际交通线秘密运送到大后方的物资，“其数量实十倍于取道滇缅路者”，该路线的重要性可以想见。而日军为了破坏这条交通线，经常派飞机轰炸或派出军队拦截、劫掠。伪军、国民党杂牌军和土匪等也在这条运输线上设置关卡，对客商进行勒索或抢劫。

<sup>①</sup> 龚学遂. 中国战时交通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7: 142.

<sup>②</sup> 廖安祥. 廖安祥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秘密交通员，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积极投身香港抗日救亡运动，为了工作方便和统战需要，曾有公开身份：香港义顺源货栈的管货员（1940年以前）、香港东利运输公司老板（1938年至1941年底）、惠州源吉行经理（1942—1945年）等。参见：游海华. 抗战时期香港秘密大营救若干问题续考 [J].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1 (3).

港澳地区战略地位特殊，对华南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辐射力都非常强，因此受到日本的格外重视，日本觊觎香港。特别是战争期间，日本依托香港得以畅通南太平洋至中国大陆的物资运输及贸易。并且，日本一直将香港作为走私活动的基地。抗战前期，日本在港澳地区的走私倾销活动使其独占了该地市场。面临欧洲的紧张局势，同时在日本的施压下，1938年5月2日，英国即同日本达成关于中国海关的协议，让日本控制了沦陷区的中国海关收入，<sup>①</sup>各国的绥靖政策使日本更容易控制着进出口贸易市场。就香港而言，在市场上，1940年初，印、英棉纱销售一落千丈，这正是由于自欧战爆发后，英、印棉纱运港大为减少，厂商不得已大规模采用日纱为原料。在布匹方面，日货已占40%。道边小贩所称的九龙土布，十有八九是日货。中环布匹店40余家，九龙也有40多家，都在经营日货。市面上的人造丝织品也以日货居多。香港市场上的海味由华商自神户运港，德辅道西咸鱼店所售鱼品75%是日货。罐头食品基本上都来自日本。这些巨额的日货必然有相当数量流入华南，使日本换得大量法币，套购到大量的法币外汇基金。据专家估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在上海的外汇市场上套取中国法币外汇基金达2500万英镑之巨。<sup>②</sup>

除了上述进出口贸易获取的巨额款项，日本还在战争期间以港澳为基地，获得大量军需原料。例如“日本每年需用钨砂，约在3000公吨以上。朝鲜所产，近年来达2000吨左右，约当所需数量三分之二，而其所缺三分之一的数额（约千余吨），大部经由香港，

<sup>①</sup> 《1938年5月2日日本外务相广田宏毅致克莱琪第59/A1号照会》、《1938年5月2日克莱琪致广田照会》（中国海关档案）。

<sup>②</sup> 齐春风. 抗战时期日本在港澳地区的走私活动[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3(03): 89.

购自中国”。<sup>①</sup>其他原料更是不可胜数。大量军需原料源源不断地输向日军中，使日军在无声无息中完成了“杀人不见血的经济掠夺”，无疑对日军起了“输血”的作用，从而使抗日战场大后方患上了严重的“贫血症”，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困难。<sup>②</sup>

### （三）英国对香港的绥靖态度

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英国在远东“前哨”的香港，地位微妙。面对日本侵华，英国既不甘心放弃在华利益，也不愿意直接与日本对抗，对中国的抵抗运动往往抱持同情态度。英国一方面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另一方面又在对日妥协退让，其政策往往矛盾而反复。面对抗日局势日渐紧张，香港日益成为华南抗日救亡的中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港英政府对国共两党的活动予以一定程度上的默许，香港与广九铁路仍持续作为重要物资输华的基地和通道。但为了持续其对香港的有效控制以及香港社会秩序的稳定，港英政府又希望尽量避免刺激日本，它既防备国共对在港日伪势力采取激进斗争，也担心国共在香港民众中展开政治动员，损害其殖民政府威信。于是，为监视和应对香港各派政治势力，早在1934年，英国就在香港设立政治部（Special Branch），该部门在1946年归属警队建制。

总体而言，1938年10月广东沦陷是港英政府收紧对香港社会控制的分水岭，其对香港的社会管制日趋加强。1938年9月，在日

---

<sup>①</sup> 钨矿—中国的宝藏 [J]. 东方杂志 (39卷12号), 1943.08.30. 参见: 齐春风. 抗战时期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 [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3 (03): 89.

<sup>②</sup> 齐春风. 抗战时期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 [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3 (3). p: 89.

军侵打广东之前，港英政府重新修改1922年制定的《紧急情况规例条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并于10月7日刊宪。其后，港英政府对该法例进行多次增修。依据该法例，政府可以拘捕任何违反此法的嫌疑人、驱逐无固定工作者、禁止煽动性或组织混乱的集会、解散可能影响秩序的组织、审查香港所有中外文报刊、实行出入境管制等，这严重影响并制约了香港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

广东沦陷后，港英政府进一步强化对香港社会的管制，以防控国共在港抗日活动。在致港督罗富国（Geoffry Northcote）的电报中，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直截了当地阐明香港必须对日本妥协的态度及原因：“这个殖民地的历史表明，香港必须要与实际控制广州的政权相处。之前是孙中山、西南政务委员会、南京中央政府，而现在日本人。”“虽然这个殖民地对中国抱有天然的同情心（我本人亦有同感），但香港要准备向日本人让步。”<sup>①</sup>

#### （四）香港沦陷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开始窥伺侵占香港，并逐步谋划具体侵略步骤。1939年12月14日，日军参谋本部拟定1940年的作战计划，将攻占香港列为“对华作战中，英美参战时的作战要领”中的一部分。1941年下半年，日本法西斯为了夺取英、美帝国主义在太平洋的殖民地和附属国，配合德、意法西斯在欧洲作战，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天皇于1941年11月5日批准参谋本部上奏的对美、英、荷开战的作战计划，做出具体部署。

随着日军南下步伐的提速，由酒井隆主持制定的攻占香港行

---

<sup>①</sup> 孙扬. 全面抗战时期香港国共两党组织工作析论（1937—1941）[J]. 抗日战争研究, 2020（2）: 110.

动计划，上报到了参谋本部。酒井隆，绰号“冷血屠夫”，恶名昭著。从踏上中国土地伊始，他积极参与策划了种种侵略阴谋。作为率领日军攻占香港的首要人选，他于1941年11月出任日本驻广州第二十三军司令官。<sup>①</sup>11月6日，日军参谋本部向中国派遣军及华南方面军发布了攻占香港的“大陆命第557号”，命令由酒井隆麾下的第二十三军协同海军，做好攻占九龙半岛及香港岛的准备。

日军蠢蠢欲动，野心昭然若揭。重庆国民政府一再督促英方，若再不加强香港防御，香港恐将不保。然而，在当时的英国殖民者眼中，香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英国对香港的防卫始终漠不关心。1938年4月，英国皇家防卫委员会甚至建议将香港的防卫力量削减一半，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表示要将香港的防卫力量削减至一个“适当的程度”。直到1941年岁末，日军已逼近香港，英国当局才象征性地下令增调两营加拿大步兵防御香港。英国首相丘吉尔此时放言：“决不让远东香港这颗女王王冠上的亮丽明珠，落入日本之手。”同时成立了由色法姆大将担任司令的英军远东司令部，陆军少将玛尔特比任香港英军总司令，调集了英、印、加等国军队，并招募义勇军，计1.4万余人守卫香港。然而，尽管英方此时增加兵力，但由于前述港英政府一直以来的绥靖态度及欧洲战场上自顾不暇的牵制，加上长期的布防不力，终是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步伐。

从1941年11月开始，日军在港九外围和惠州、东莞、宝安地区集结了3万多兵力，准备进攻香港。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凌晨，日军第二十三军三十八师团和海空军及后援部队共1.5万人，向香港进攻。日军步兵、骑兵在飞机

<sup>①</sup> 陈启兵. 抗战时期的香港烽烟 [J]. 抗战风云, 2020 (8): 53.

的掩护和炮火的支援下，分两路越过边界。日军12架轰炸机在36架护航机的掩护下，空袭九龙启德机场，使英军仅有的5架战斗机全部化为灰烬。接着，6万多日军从深圳河越过边界，迅速向九龙推进。英军轻易地放弃了在九龙的“酒徒”防线，与此同时，两艘英国皇家旗舰——威尔斯王子号和却敌号亦被日军击沉。<sup>①</sup>12日，九龙失守。18日，日军在香港的北角登陆成功，迅速占领浅水湾、跑马地，英军加拿大旅全军覆没。25日，时任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香港沦陷。

占领香港后，日军按照把香港“变成海空军辅助港，太平洋战争的后方根据地”的目的，对港九地区实行野蛮统治。1942年2月20日，日军宣布香港为其“占领地”，任命矶谷廉介中将为“香港总督”。日军加强对香港外围的防守，并加强对境内的控制和舆论上的欺骗性宣传，也加紧对香港的经济掠夺。日军派水上宪兵分驻于香港岛、九龙两地，从而控制了港九海域。此外，日军还开辟了一条从台湾经过汕头到香港的海上运输线，一面把从华南抢掠的财物和战略物资运回日本，一面由日本运输武器装备到东南亚和华南战场。为此，日军专门组织了“海上挺进队”，保护其海上航线。<sup>②</sup>香港遂成为日本南太平洋作战兵力调动、军需补给、舰艇维修、飞机中途加油的中转站和补给站。由此开始直至1945年8月，日本占领香港共三年零八个月，香港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至1946年，工厂数急剧下降为366家，外贸基本处于停顿状

<sup>①</sup> 管林. 东江人民抗日武装与柳亚子香港脱险 [J]. 惠阳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8 (1): 45.

<sup>②</sup> 潘琦. 中共在香港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J]. 党史博览, 2014 (12): 15.

态，全港人口从1941年的160万锐减至1945年8月的60万。<sup>①</sup>

日军占领香港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粮食、饮水奇缺，盗贼蜂起，趁火打劫，社会秩序大乱，入夜枪声不绝。日军以“强化治安”为名，在交通路口设岗哨，对过往行人进行野蛮搜查，任意扣留、审问、毒打以至杀害香港市民。与此同时，为限制香港对日抵抗活动，管控抗日宣传舆论，日军开始大肆搜捕抗日爱国人士。为了搜捕“抗日分子”，日本侵略者封锁港九交通，实行宵禁，分区分段搜查，贴出布告限令“抗日分子”前往“大日本行政部”或“报道部”报到。侵略者的这些行动，严重威胁着在港坚持抗日的爱国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

1941年冬至次年初春，香港异常寒冷。日治政府对燃料严加控制，电力按区限时输供。由于燃料缺少、电力紧张、交通停顿、店铺歇业、食物短缺等问题，以酒井隆为首的日军政府以保障“大东亚圣战”为由，开始大量遣散“港岛”居住人员。1942年1月，军政府“民治部”成立“归乡指导委员会”，负责疏散市民。凡没有工作和居民证、“良民证”的人员，必须离境。由日方用火车、轮船遣散出境，抛之不管。不少家庭成员走散，或途中抛弃老人、幼儿，其状惨不忍睹。<sup>②</sup>

中共香港市委在得知日军进攻的消息后，立即布置留港党员隐蔽事宜，并积极协助八办（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营救滞留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

① 潘琦. 中共在香港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J]. 党史博览, 2014 (12).

② 陈启兵. 抗战时期的香港烽烟 [J]. 抗战风云, 2020 (08): 55-56.

## 矛盾危迫的国内形势

如前述，日本在中国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以后，逐步调整其侵华策略，逐步停止对中国的战略进攻，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力图分裂国共合作，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它还对英美表示，欢迎“第三国”对中日战争的“善意斡旋”。如前所述，英美则希望通过对日妥协以保护其在远东的利益，便积极策划牺牲中国利益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劝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停战讲和”。

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下，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危机加重，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情况下，一贯主张对日妥协的汪精卫集团不久即公开叛国投敌。“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而被迫着赞成抗日”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此时抗战立场大为动摇，发生投降、分裂和倒退，<sup>①</sup>其政策重心由合作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转为以打击中国共产党为主。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军队”的专制主义，确立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并按此主张和方针，先后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同时在各级党部设立“特别委员会”，强化独裁统治，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设立集中营，囚禁、屠杀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向边区、解放区派遣大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派遣游击武装在抗日根据地周围频繁制造军事摩擦事件，袭击中国

<sup>①</sup> 毛泽东. 矛盾论 [M] //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9.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此后，反共摩擦活动愈演愈烈，极大地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剧了局势的严重性。国民党害怕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多次掀起反共高潮。

1940年夏开始，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年7月，国民党拟定一个所谓“中央提示案”，其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和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至10月，国民党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內撤到黄河以北。考虑到抗日大局，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和6个团共9000余人开始北移。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约8万余人的包围伏击，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要把叶挺军长交军事法庭审判。皖南事变严重影响了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遭到全国爱国人士的强烈谴责。

国民党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各民主人士的迫害。1940年5月初，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防最高会议报告中诬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或“全救会”）的沙千里、沈钧儒及邹韬奋将于7月7日“在重庆领导暴动”，并令军警特务“严密防范”。到所诬称的“七七”“暴动日”，令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到沙、沈、邹三人住处“防守”骚扰，并以此为借口，株连迫害青年学生四五百人之多。<sup>①</sup>1940年12月6日，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曾于同年11月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于重庆举办的“星期讲座”上揭露四大家族利用权势大发国难财，被国民党

<sup>①</sup> 邹韬奋. 经历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8: 255.

逮捕。<sup>①</sup>

随着政治、军事上反共的加剧，国民党在文化上也大力推行专制主义和高压政策。蒋介石政府上下奉行消除异己的政策，大肆迫害共产党人、民主党派人士和爱国文化人士，封杀进步作品，停办进步报刊，迫害文化志士，并大造国民党一党独裁和取消共产党的反动舆论。同时严厉管治出版事业，将书店、报社、印刷所等收归国有国营，取缔、破坏民主进步报刊及新闻出版事业。以重庆《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共报刊的出版发行即遭到阻挠和破坏，“《救亡日报》《国民公论》《全民抗战》和国际新闻社等数十家宣传抗战的进步报刊、新闻社也被迫停刊、停办”。不出一月，“昆明、成都、桂林等地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均被查封”，被查封的书店分店数量多达几十处。1941年2月，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仅剩重庆一处总店了，国民党继续破坏，一方面长期派特务包围监视，一方面派人交涉恫吓，提出“合并”或由国民党派“代表监督”，“不接受即须全部消灭”。<sup>②</sup>中国大陆笼罩在国民党的舆论控制之下。整体形势矛盾更尖锐，斗争更激烈，环境更艰难。<sup>③</sup>

---

① 张军民.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 [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23.

② 张军民.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 [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23.

③ 唐正芒. 论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 [D].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1998.

## || 第二节 ||

# 大营救前的重要爱国文化力量

### 未雨绸缪，转移阵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积极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联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起来。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文化人士等始终坚持团结抗战，积极组织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方针、路线，大力援助抗日战场，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爱国民主人士、爱国文化人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9日，中共领导下的“一二·九”运动爆发，进一步推动上海的救亡运动。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华、周新民、王造时、江恒源、沈兹九等280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表示对“一二·九”学生运动抱以“十二万分的同情”，并指出：“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够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上海各界救国会开始陆续成立，并公开活动，如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

会、大学教授救国会等。为壮大抗日力量，进一步团结起来，1936年1月28日，在“一·二八”四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会议选举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等30人为理事。在此基础上，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博物院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会议室举行成立大会，“救国会”（或“全救会”）宣告成立。大会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如何促进民族抗日联合战线案》等，选出的常务委员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等15人。沈钧儒负责组织，章乃器负责宣传，《救亡情报》为机关报。救国会有比较系统的救国主张，这些主张与中共的主张相一致，其坚持团结、抗战，积极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例如，依托鲁迅先生逝世追悼会，大力组织、号召团结抗战形成了一次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终年仅56岁。鲁迅遗体安放在万国殡仪馆，后下葬万国公墓。10月22日下午移灵安葬时，以“民族魂”大旗为引导，送葬队伍长达二里多。救国会主要领导人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章乃器等都参加，呼喊“鲁迅精神不死，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号召全体中华儿女，特别是爱国青年团结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一次隆重的葬礼，也是救国会组织的一次向国民党当局的示威，是一次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像救国会这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团体，以及当中的爱国民主人士，引起国民党的忌恨，于是千方百计破坏和镇压救国运动。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在上海悍然逮捕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押解至苏州，制造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自“七君子案”提起公诉日起，举国上下

再次掀起了营救爱国领袖，团结抗日救亡的高潮。中共中央于1937年4月12日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指出，“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我中华男女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sup>①</sup>高度赞扬救国会领导人的爱国抗战精神。由爱国民主人士领导的救国会所发动的救国运动，对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全国抗日高潮的兴起，发挥了重大作用。

爱国民主人士，爱国文化人士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工作。爱国民主人士和知名文化界人士在抗战初期，在内地创办刊物、写文章，发表各种宣言，以及从事各种文艺活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成就，抨击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推动了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因此，国民党顽固派视他们为眼中钉，进行种种迫害。

邹韬奋战前即曾长期在上海从事生活书店的事业，上海沦陷后，他从上海撤出后先到香港，又到武汉，再到重庆。他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配合战时需要出版刊物和各类图书，加之科学的管理和经营，生活书店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他主编的《大众生活》印行达20多万份，影响力遍及海内外，出版战时读物几百种。生活书店在后方的分支店、办事处、营业处达56个，遍及后方14个省份。他还吸纳大批知名文化界人士作为生活书店的编审委员及为生活书店出版各类报刊、图书担任主编、撰稿。<sup>②</sup>沈钧儒、李公朴等救国会领导人，于1937年12月创办《全民周刊》，在其创刊号（12月11日）上公开登载《为争取全面全民族战争胜利而奋斗》一文，明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 解放周刊 [J]. 1 (01): 1937.4.12.

<sup>②</sup> 张培德. 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向香港的迁徙 [J]. 史林, 2002 (4): 18.

确提出反对“单纯”的政府和军队抗战，实行全面全民族抗战的主张，积极响应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指出，“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现在已进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阶段。这一个阶段，最基本的任务是加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以突破当前民族的危机”，对促进全面全民族团结抗战起到重要作用。夏衍战前也长期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是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上海主持《救亡日报》的工作。上海沦陷后，他先到广州，再到桂林，继续主持《救亡日报》。在他的努力下，《救亡日报》发行量达到8000份，形成较大影响力。

随着前述抗战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逐渐转为消极抗战，出台了大量有关新闻舆论的法令、法规，这些法令的矛头也直指由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政权。为了限制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民主人士的舆论活动，1938年1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统一革命理论肃清政治斗争之意识案》，要求社会各界人士，不论其政治派系如何，“尤应捐除成见，在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之下”。次日，临时大会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要求全国“捐弃成见，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统一行动”，并规定以三民主义及孙中山先生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的最高准绳，提出“全国抗战力量应置于国民党及蒋介石的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力迈进”。<sup>①</sup>其本质即是加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破坏全国团结抗战大局。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名义下掀起两次反共高潮，在国共之间制造军事摩擦、政治摩擦的同时，

---

<sup>①</sup> 桂湘书. 孤岛喉舌：抗战时期《华商报》统战言论研究 [D]. 合肥：安徽大学，2014：10.

对进步文化的压迫也日益加剧。皖南事变爆发后，包括《救亡日报》在内的数十种宣传抗战的进步报刊被勒令停刊，进步书店和出版社被查封，进步的文化工作者被拘捕。各民主党派人士和爱国文化人士的宣传舆论活动受到极大限制，且生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在这一紧迫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有计划地组织爱国民主人士撤离。如此，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后，从上海来到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人不得不再次迁徙。这次转移撤离与第一次迁徙不同的是，此次撤离是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在国统区局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中共在重庆的指导机关为了保护进步的文化力量和向国民党表示抗议，组织大批爱国文化人离开国统区。一部分去延安和新四军根据地，一部分则转移到香港。<sup>①</sup>

香港，作为爱国文化人撤离的目的地之一，有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如前所述，香港本就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联系内地及上海孤岛和海外的重要通道。加之太平洋战争前，香港仍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日军尚未对香港进行军事侵略，香港尚未被战火波及。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的政治形势也朝着有利于中共活动的方向变化：由于英、美与日本南进的矛盾日益明显，港英当局对进步的抗战文化活动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对民众运动的限制有所松动；香港民众的爱国情绪日益高涨；香港的自由港性质，使各种政治势力可以借用商业活动的形式展开角逐，形成一个较好的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环境。香港党组织在党内进行统一战线的理论教育，同时加强对各党、各派、各团体及各阶层的统战工作，克服统战工作中的短期行为，特别是争取“大量吸收文化界的左倾分子入党和有计划的培养和领导非党的文化工作干部”，以适应文化人来港，

<sup>①</sup> 张培德. 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向香港的迁徙 [J]. 史林, 2002 (4): 18.

使“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成文化城市”。<sup>①</sup>帮助上述大批爱国文化人从国统区撤到香港不单是为了“避难”，其有重要的战略考量：使这批爱国人士能依托香港的环境，建立一个对东南亚及西方各国的华侨和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中共得以依托香港这个平台，建立起向外宣传党的政策，争取国际舆论和海外侨胞同情支持的窗口，让香港同胞、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和外国进步人士，能有机会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玩弄的“东方慕尼黑”阴谋。<sup>②</sup>

如此，为保护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文化人士，发展抗战文化事业，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党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内地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其中包括：胡愈之、柳亚子、茅盾、夏衍、邹韬奋、阳翰笙、杜国庠、陈翰笙、司徒慧敏、蔡楚生、胡绳、萨空了、欧阳予倩、林林、戴望舒、杨刚、杨潮（羊枣）、恽逸群、刘思慕、萧红、端木蕻良、金仲华、马思聪、郁风、周钢鸣、林焕平、黄苗子、张铁生、范长江、戈宝权、胡风、章泯、丁聪、宋之的、千家驹、廖沫沙、于伶、黎澍、张友渔、韩幽桐、黄药眠、凤子、舒强、葛一虹、胡仲持、沈志远、袁水拍、叶浅予、冯亦代、梁漱溟、乔冠华、梅龚彬等。全面抗战爆发前已在港的文化人有许地山、胡春冰等。从欧美归来的有戴爱莲、姚锦新等。<sup>③</sup>

如前述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创办《大众生活》，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做出重大贡献。也鉴于其影响越来越大，国民党当局先是拉拢，试图劝服邹韬奋加入国民党，接着又提出要生

① 潘琦. 中共在香港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J]. 党史博览, 2014 (12).

②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 (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 第3辑 [M]. 1984.

③ 潘琦. 中共在香港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J]. 党史博览, 2014 (12).

活书店与国民党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并许诺由政府资助生活书店。但这些都遭到邹韬奋严正拒绝。此后国民党当局对生活书店采取各种压迫手段，至1940年生活书店50余处分、支店大部分被查封，只剩下重庆的总店和贵阳、桂林、香港三个分店。1941年初，贵阳分店被封，桂林分店被限期停业，不少工作人员无辜被捕，有的生死不明。国民党的书刊审查制度和特务肆无忌惮的活动使得进步的出版工作和文化活动越来越困难。邹韬奋虽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屡次抗争，但终无效。他愤然辞去参政员的职务，秘密离开重庆，坐汽车经贵州、湖南到广西桂林，在桂林搭飞机于1941年3月5日抵达香港。<sup>①</sup>

还有夏衍和他负责主办的《救亡日报》。皖南事变后，因拒登国民党污蔑新四军的消息，1941年1月18日的《救亡日报》被桂林新闻检查所全部扣发。国民党当局准备将《救亡日报》一并查封。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决定组织保护夏衍先期撤离至香港。1941年1月27日，夏衍乘坐欧亚航空公司的小飞机飞往香港。还有茅盾先生，战前即长期在上海从事出版和文学创作等文化事业。上海沦陷后经汉口、广州于1938年2月迁徙至香港，住了10个月，于1938年底离港去新疆。后又从新疆经延安，于1940年末到重庆。由于茅盾是著名的进步作家，又从延安来到重庆，分外引人注目，生命安全再次面临威胁。1941年2月间周恩来亲自动员和安排茅盾乘长途汽车到桂林，再乘飞机撤离至香港。这是茅盾在短短三四年内第二次迁徙至香港。<sup>②</sup>

① 张培德. 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向香港的迁徙 [J]. 史林, 2002 (4).

② 张培德. 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向香港的迁徙 [J]. 史林, 2002 (4).

## 二 投身抗战，引领文化

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后，依托当时香港独特的政治环境，坚持团结抗战，继续坚持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宣传活动，逐渐使香港成为抗战救亡活动的一个重要前沿阵地，从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批爱国文化人士的生命安全，以及他们抗日活动的开展，从组织、策划爱国文化人士转移至香港开始，即多次进行明确指示。大批文化人士汇集香港后，周恩来就“如何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的问题，明确指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廖承志：

“第一，不能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他们已经进步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他们，因他们已经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从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衡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因为他们终究是做上层统战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留有一些文化人的习气和作风。”香港党组织遵照这一精神，积极做团结文化界人士的工作，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占领和开辟香港抗日舆论阵地。<sup>①</sup>

而诸多爱国文化人士自身，勇于肩负起支持抗战，救民族于危亡之责。这一次爱国文化人士集中转移迁徙至香港，与第一次不同，更多是由于政治原因，国民党当局压迫所致。邹韬奋、夏衍、茅盾等与其他进步文化人士带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即是要在香港建立宣传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的文化阵地。<sup>②</sup>茅盾在回忆他1938年和1941年两次迁徙到香港的情形时说，“两次的心情迥然不同。

<sup>①</sup> 潘琦. 中共在香港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J]. 党史博览, 2014 (12).

<sup>②</sup> 张培德. 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向香港的迁徙 [J]. 史林, 2002 (4).

1941年来到香港，正值皖南事变和国内政治形势恶化，使我有一种巨大的紧迫感——必须全力以赴地工作。”<sup>①</sup>

这些爱国文化人士中有著作家、报人、画家、电影戏剧艺术家等等，到了香港之后继续以各种形式从事文化活动：办报办杂志，写书编书，编演进步戏剧，拍电影，办讲座，办培训班甚至办学校。这些活动不仅使战前在内地的各种文化事业得以延续，对全国抗战文化产生影响，而且对香港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这一时期也被认为是香港文化最为活跃、最为蓬勃的时期，是香港文化史上第一个兴盛年代，使香港成为“继北平、上海以后的中国文化中心地”。<sup>②</sup>

### 1. 创办报刊，宣传抗战思想

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依照中共中央指示，不失时机地通过文化界领域的中共党员广交朋友，创办或复办了一批抗战刊物，如办事处主办的《华侨通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批评》、香港学生赈济会主编的《学生呼声》、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主编的《新闻通讯》等等。这些刊物积极宣传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给香港的抗战文化发展带来了生机。<sup>③</sup>

《华商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牵头组织，有大批赴港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参加的，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刊物。该报以团结、民

① 茅盾. 我走过的道路：下[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411.

② 卢玮銮. 香港文踪：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M]. 香港：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7：3.

③ 梁上苑. 抗战初期的香港文化界[N]. 人民日报，1983-06-17（16）.

主、抗战，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为宗旨，是向香港和海外侨胞，以及全世界进步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皖南事变后，党中央认为党在香港建立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宣传阵地的时机已经到来。一是多年来香港党组织的苦心经营，加之日本征服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南进态势已明朗化，赢得了相对独特宽松的政治环境；抗战形势的发展，也要求在香港建立党的文化基地，顽固派加强文化检查和邮检，查封各地生活书店，港澳及海外读者看不到《新华日报》等。二是这大批爱国报人赴港，为香港新闻舆论界提供了新的力量和发展契机。此时，周恩来致电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廖承志：在香港建立我们自己的宣传据点，出一张我们的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等地去。<sup>①</sup>

廖承志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41年2月10日，向周恩来发出电报。他陈述道：“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报纸……以救国会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不过，中国共产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sup>②</sup>之所以依托“救国会”的名义，考虑在于：其一，救国会是一定时期内被承认的合法抗日团体，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二，有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邹韬奋参加，在香港办报的中坚力量，无疑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1941年4月8日，《华商报》正式创刊。筹备人有廖承志、夏衍等，由爱国商人、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任督印人兼总经理，副总经理为范长江，总编辑是胡仲持，总主笔由张友渔担任，工

<sup>①</sup> 潘琦. 中共在香港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J]. 党史博览, 2014 (12).

<sup>②</sup> 葛美荣. 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化和内地文人向香港的迁徙 [J]. 四海钩沉, 2010 (5).

作人员有邹韬奋、金仲华、乔冠华等。该报一经面世，便在香港引起巨大反响。这不仅是因为该报集了孙中山先生的生前墨迹“华”“商”“报”三字作为报头，更重要的是，该报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其文之所及、笔之所触，无不使人亢奋，催人奋进。该报在国内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在国外反对对日妥协，批判“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的办报方针。

《华商报》从创刊号起即以连载形式，推出了著名出版家和文化人邹韬奋的20万字长文——《抗战以来》，有力地揭示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行为。作者以其亲身经历披露国民党顽固派“表面和骨子脱节”的黑暗政治现象，强烈呼唤国内外社会舆论制止一切破坏抗战团结的倒行逆施和罪恶行径。同时，热情歌颂中华民族在伟大的抗战中不断觉醒和滋长的新生力量，鼓舞国内外民众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文章使读者深受感动。<sup>①</sup>该文在《华商报》连载80余天，连载结束后印行单行本，两个月内印了三版15000册。数月后结集成书出版，广销香港和东南亚各地。1941年5月31日，邹韬奋联合救国会留驻香港代表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志远、沈兹九、韩幽桐等九人，共同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这篇文章以鲜明的立场向国内、国际宣告了文化界旅港人士的政治主张，揭示了国民党政府残暴横行、破坏民主、侵略人权、虐待百姓的种种不堪事迹。接着，范长江的《祖国十年》于1941年9月18日开始连载，该文以他的切身体验，还原历史真实面目，斥责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消极抗战的行为，记载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为坚持抗日救国，团结全国人民和社会各

<sup>①</sup> 潘琦. 抗战时期在香港及海外的中共报刊[J]. 党史博览, 2019(1).

界人士奔走呼喊，起着先锋作用的。<sup>①</sup>还有千家驹的《抗战以来的经济》等亦陆续问世。抗战四周年之际，《华商报》又发表郭沫若、茅盾、巴金、许地山、夏衍、胡风、许广平等人署名的《致世界作家书》，呼吁全世界文艺界团结起来，组织反法西斯作家联盟，还在副刊《灯塔》上连载《如是我见我闻》（茅盾），以及相继发表《沉渣》（巴人）、《故乡》（艾芜）等较有影响的作品。<sup>②</sup>

1941年5月17日，在廖承志等的积极支持下，与《华商报》相呼应的刊物《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面世。这是一份旨在宣传民主与抗日思想的综合性文艺刊物，由邹韬奋于1935年底在上海创办。创办之时，实质是以《大众生活》的名义恢复了被国民党政府先期扼杀的《生活》周刊。上海的《大众生活》紧紧与“时代最进步的运动——救亡运动联结在一起”，一刊出即备受欢迎，销量达20万份。然而，出刊仅16期即遭遇了与当年《生活》周刊同样的结局，“不得不于万分沉痛中暂时停刊”。邹韬奋是第二次抵达香港。复刊的《大众生活》由邹韬奋自任主编，曹克安任督印人，同时还聘任了一批在港文化名人为该刊编委，其中包括茅盾、夏衍、胡绳、千家驹、金仲华、乔冠华等。一经复刊，《大众生活》即以其鲜明的团结抗战立场和抗日政治主张昭示于读者。其复刊词曰：“我们不愿意讳疾忌医，对于进步的，有利于民族前途的一切设施，固极愿尽其鼓吹宣传之力。但对于退步的，有害于民族前途的现象，我们也不能默默无闻。……我们相信，靠着全国人民的巨大力量也一

<sup>①</sup> 侯萌萌. 浅析抗战时期中共报刊的新闻宣传策略：以香港《华商报》为例[J]. 新西部, 2017(4).

<sup>②</sup> 葛美荣. 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化和内地文人向香港的迁徙[J]. 四海钧沉, 2010(5).

定能扭转乾坤，而到达胜利与光荣的彼岸！”《大众生活》陆续连载的茅盾长篇小说《腐蚀》，通过一个青年受骗上当被迫做了女特务的日记，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真相。《腐蚀》在《大众生活》连载引起轰动，后来出版单行本，一度再版，成为国内版本最多的小说。还有夏衍的中篇小说《春寒》等，以广州沦陷为背景，描写了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男女青年在这段时间的坎坷遭遇。这篇后来被认为是充分地揭开了真伪抗战之谜的作品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sup>①</sup>而由一批同时在港的国际问题专家如乔冠华、金仲华、张友渔、张铁生、千家驹等人撰写的国际时事述评，以及由夏衍、胡绳和邹韬奋自己撰写的或杂谈或随笔等，既剔透清晰，又入木三分。<sup>②</sup>

上述这一报一刊紧紧扣住当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针对英美的“绥靖政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国际时评。对国内出现的汪、蒋合作逆流和国民党当局种种不利于抗战的做法也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抨击，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夏衍等后来回忆：《华商报》和《大众生活》互相配合，在宣传战线上起了很大作用，在香港建立宣传基地的任务是达到了。<sup>③</sup>

除此，还有由梁漱溟负责创办的《光明报》，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创建后的机关报，于1941年9月18日正式创刊出版，梁漱溟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俞颂华任总编辑。《光明报》的创办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周恩来与梁漱溟面谈后，亲自嘱咐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廖承志负责接洽。同时，刊物的创办也得到了当时已在港的何香凝、廖梦醒、柳亚子等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

① 张培德. 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向香港的迁徙[J]. 史林, 2002(4).

② 葛美荣. 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化和内地文人向香港的迁徙[J]. 四海钩沉, 2010(5).

③ 夏衍. 懒寻旧梦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460-461.

持。其创刊号上刊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出版公约五项》，揭示其办报宗旨：“眼前最切之要求为加强国内团结，本报言论是以此为目的”，其所肩负的任务就是向国内外公开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并宣传中国抗战主张，以及民主思想。

## 2. 团结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反映到各个领域。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为适应形势变化，争取时局好转，采取内外有别的方法，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香港党组织将香港新成立的进步文化团体团结起来，去掉“抗敌”“抗日”等字样，以免刺激港英当局和日伪。如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漫画界协会香港分会、香港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业余联谊社等，报刊则如前述，以及《东江》《耕耘》《文艺周刊》《世界知识》《戏剧与电影》等。香港党组织正是依靠这些进步群众文化团体和刊物，宣传党的方针、主张，培养和团结进步青年，配合和支援内地的斗争。

大批爱国文化人士来到香港后，中共中央南方局（简称“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致电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廖承志，就如何接待文化人，建立文化工作领导机构，领导和团结各界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文化宣传阵地等问题做了一系列指示。办事处审时度势，认为中共在港建立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宣传基地的时机已经到来。1941年5月，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成立了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5人组成的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文委”），负责领导香港的文化宣传工作，并设立了由夏衍、胡绳、张友渔分别负责的

文艺、学术、新闻、妇女、国际问题座谈会。香港文委通过这些座谈会，组织领导文化人士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sup>①</sup>香港文委的成立，团结并壮大了香港抗日民主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香港文委成立后，办事处得以借此进一步加强了中共与文化界人士的联系和对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使抗战以来香港文化宣传事业发展迎来高潮。此后，香港文委又历经改组，成立了一批进步文化团体和机构，推动了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国际政治军事评论等活动的迅猛发展，使香港成为盛极一时，影响深远的抗战文化宣传阵地。

### 3. 成立组织，支援、募捐等抗战救亡运动

在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还积极组织起来，直接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与香港党组织密切合作，通过实践鼓舞香港民众的抗战热情，形成了较大范围的社会影响，轰动一时。

1938年，香港曾掀起抗战宣传和为内地募捐筹款高潮，特别是“八一三”献金运动，在驻港办事处领导下取得献金百万的巨大成绩，得到了“无产阶级领导富人献金救国”的好评。

宋庆龄是爱国人士的一面旗帜，始终坚持领导中国爱国民主运动。全面抗战开始后，宋庆龄迁居香港。与周恩来商议后，她决意在香港努力创建一条沟通外侨与内地的合作抗日通道。1938年3月16日，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发表《致海外同胞书》，号召海外侨胞积极给予祖国抗战军队以“鼓励援助”。同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宣告成立，宋庆龄任主席，宋子文任会长。保盟是具有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性质的救济组织，其主要任务包括：宣传中国抗战主张，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

<sup>①</sup> 李军晓.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述略 [J]. 抗日战争研究, 1997 (3).

药、救济物资等援助中国，特别是争取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先锋力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解放区人民。保盟成立以后，积极组织领导香港的抗日救亡、援助活动，其中包括颇具影响力的“一碗饭运动”。

1941年，宋庆龄等在香港倡导“一碗饭运动”，以救济同胞，支援抗战为目的，声势浩大。“一碗饭运动”原是由美国医药援华会和旅美华侨团体于1938年在美国发起的，其初始目的是在美国民众和华侨中募集捐款，购买医药和医疗设备，支援中国抗战。之所以叫“一碗饭”运动，原因在于其活动形式：用发售餐券的形式作为募捐赈济的形式，每一名认购者可以拿着餐券到指定餐厅吃炒饭一碗，而除炒饭成本以外的饭钱则用于赈济中国灾民、支援抗战。运动发起后，各种自发捐赠形式悄然兴起，认购餐券最终变成了一种标志，“一碗饭”成了一种凝聚力。除“一碗饭”外，认购纪念章、登台义演、上街义演、时装表演等各种劝募形式兴起，在纽约，一些华人团体后来还自发建起救国血库，呼吁民众献血，救助中国战争难民。

“一碗饭运动”在美国兴起后，向南传到南美洲，在古巴等地的华人中接力举行，后来又传到英国伦敦。1941年，宋庆龄即在香港重新演绎“一碗饭”运动精神，号召香港各界资助抗战，救济同胞，一时间，香港民众纷纷认购饭券，吃“爱国饭”“救国饭”。1941年8月1日，计划进行3天的香港“一碗饭运动”正式拉开帷幕。宋庆龄为整个运动亲笔题词：“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史料记载，运动发起当天，一只特制的大碗模型出现在街头，把活动引向了高潮。一大群人簇拥着这只“大碗”喊着“多买一碗饭，多救一个难民”的口号，穿过中环、西环、湾仔等闹市区，给本来就已是家喻户晓的运动增添了气势。

“爱国之门”“光荣之门”“欢迎来吃爱国饭”“欢迎来吃救灾饭”等标语出现在香港酒家、餐厅，香港民众纷纷上街购买饭券，不少家庭举家出动去吃“爱国饭”“救灾饭”，更有不少餐厅将活动持续到了当年的8月30日。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到8月底，一共募集到两万多元港币，这些钱全部都捐给了内地，主要捐给了黄河流域的伤残士兵和穷苦人民。

宋庆龄深入阐述了运动的意义：“‘一碗饭运动’是同情于我们抗战建国而发扬民主精神的表示。最初由华侨和美国的同情者发起，已经在美国普遍地举行了三次，伦敦方面也曾经举行过。今晚在香港首次举行，并承各友邦同情的友人们都来参加，这是何等有意义！”可见，其在香港极大地激发起了全社会的爱国热情，形成大团结抗战的局面。香港《华商报》即对这个运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舆论影响也非常深远。这次运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7月29日，香港《华商报》就刊登了“一碗饭运动专辑”，并刊登了《响应“一碗饭运动”》的社论，号召香港广大市民积极参与这个救援伤残士兵和穷苦人民的爱国运动。

抗战期间，大批爱国文化人士向香港的迁徙，前后两次的背景情况不同。第一次是因为躲避日本侵略军的炮火。第二次是因为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政策，对进步文化人的压迫、对进步书刊的查抄封禁、特务捣乱等使得进步文化人士难以在后方内地立足。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在香港建立文化宣传阵地而使进步文化人再次迁徙至香港。但是前后两次的迁徙，其结果却是同样的，即大批文化人士的云集及其所从事的文化活动，使香港成为传播抗战文化的一个特殊据点，对香港地区文化发展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sup>①</sup>

<sup>①</sup> 张培德. 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向香港的迁徙[J]. 史林, 2002(4).

### || 第三节 ||

## 大营救前的坚实组织基础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先锋旗帜，积极推动并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华南党组织的领导下，广东以及香港各地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对国民党抗日将领、地方实力派、华侨及港澳同胞开展广泛深入的抗日统战工作，推动了广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

### ➤ 抗战时期香港党组织建设

#### （一）中国共产党广东、香港组织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即在香港建立组织、开展活动。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香港迅速发展，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在华南的生存环境日益严峻。1932年12月，中共两广工作委员会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1月，中共两广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负责领导华南和香港的党组织活动。1934年3月，中共两广临时工作委员会改组为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此时，香港设有7个支部，有党员26名。在该委员会领导下，中共在华南和香港的组织一度有所恢复。然而，1934年9月，委员会遭到严重破坏，领导人郑怀昌、陈

光、林德隆等先后被捕，书记郑怀昌被杀害。此后，中共在华南和香港的活动一度陷于停顿。

1936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简称“北方局”）鉴于两广地区的情况，基于此时各地党组织多被严重破坏，决定不受地区限制，委派河北省委员薛尚实到香港开展华南地区的工作。薛尚实到香港后，与当地的一些党员取得了联系。他返回天津汇报工作时，正值刘少奇赴津主持北方局，刘少奇决定再次委派薛尚实南下，向两广实力派人物传达中共的意见，相机在南方建立党组织。薛尚实第二次赴港后，借助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区总部的合作，大力发展党员。1936年9月，经北方局批准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负责两广及港澳地区党组织的重建。1936年12月，南临委设立中共香港市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市工委”），下辖文化、学生、妇女和工人4个支部，并另设一个海员支部。海员支部随即改组为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海员工委”），由南临委直接领导。至此，香港地区的党组织得以正式恢复。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撤销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张文彬任书记，薛尚实任组织委员，饶彰风任宣传委员。南委机关设在香港（1938年2月迁至广州），隶属于中共中央领导（1937年12月后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委机关刊物为《大路》，饶彰风任主编。南委领导广东、广西、香港、澳门、贵州、昆明等地的党组织。

南委成立后，书记张文彬亲自领导香港市工委的改组工作，他将吴有恒从广州市委调到香港市工委担任书记，并于1937年12月将

香港市工委改组为香港市委，提出健全组织生活、开展群众运动、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依照此方针，大力发展并向内地输送党员，壮大广东抗日力量。1938年1月，又改组香港海员工委，曾生任书记。至3月，香港党员人数增至470名，其中工人占60%。<sup>①</sup>

1938年4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批准建立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干部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宣布撤销南委，选举产生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张文彬任省委书记，薛尚实（后为李大林）任组织部长，饶彰风任宣传部长，古大存任统战部长，梁广任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尹林平任军委书记。

1938年10月13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电示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时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遂召集曾生、吴有恒等开会，决定由曾生、谢鹤筹、周伯明等带领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广东惠阳组织人民抗日武装。10月18日，当广州即将沦陷时，广东省委针对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派李大林到西江，尹林平到东江，梁广到香港，加强对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活动的领导。10月20日，中共粤西南特别委员会（简称“西南特委”）成立，罗范群任书记，下辖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阳江、阳春、鹤山、高明等县的党组织。随后，10月24日，中共粤东南特别委员会（简称“东南特委”）在香港成立，梁广任书记，下辖中山、番禺、南海、顺德、惠阳、东莞、宝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党组织。<sup>②</sup>

广东沦陷后，香港市委暂时撤销，改设香港、九龙两个区委，

① 潘琦. 中共在香港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J]. 党史博览, 2014 (12).

② 潘琦. 中共在香港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J]. 党史博览, 2014 (12).

直属新设立的东南特委领导，机关驻于香港，同时负责东江地区的惠阳、东莞、宝安三县，以及中区的中山、南海、顺德和广州近郊等地党的工作。建立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成为广东沦陷后东南特委的中心工作。为因应新形势，香港党组织的工作重心也由发展党员，转变为根据抗战形势需要向广东各根据地输送党员和干部。为此，香港党组织动员党员和群众离港参加游击队，随即派遣了20个工作团奔赴广东各地。1938年11月至1939年7月，香港党组织共动员了230余名党员赴广东各根据地和游击区工作。这些党员中，知识分子和学生约占30%，其余为工人。工人中最多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主要赴东江地区参加曾生领导的游击队，这其中甚至包括少数打过仗的红军战士。此外，香港党组织中70%以上的干部被抽调到广东各根据地工作。

至1939年11月，香港市委复设，由杨康华担任书记，并兼管此前相对独立的海员工委、文化支部以及澳门市工作委员会，香港党组织日渐充实。此时的香港市委直辖54个支部，加之海员工委和文化支部，香港党员已达631人，基本恢复至广东沦陷前的规模。<sup>①</sup>

1940年6月，广东省委在韶关召开会议，由从延安回来的张文彬传达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会议确定广东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应放在敌后和前线，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加强对沦陷区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将广东省委分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粤北省委驻韶关，领导国统区和东江游击区工作，张文彬任书记；粤南省委设在香港，领导沦陷区、珠江三角洲游击区等地的工作，梁广任书记。会议之后，粤南省委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敌后大城市。太平洋战争之前，主要注意力放在香港，太

<sup>①</sup> 孙扬. 全面抗战时期香港国共两党组织工作析论（1937—1941）[J]. 抗日战争研究, 2020（2）.

平洋战争之后，则将重心逐步转向广州。<sup>①</sup>

## （二）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设立及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口岸相继被日军占领。港澳及海外同胞积极支持内地抗战，捐助了大批汽车、药品等物资，很大一部分运往香港，但此前中国共产党却无法在内地顺利接收。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重要战略地位突显，即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和联络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枢纽，加之由于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一度采取中立态度，具有相较便利的条件。因此，为了更便于联系海外及港澳，中共谋划在香港建立并完善党的组织机构变得十分重要且迫切。

1937年12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在武汉面晤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提出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等事宜。经卡尔协调，得到港英当局应允，但要求八办不得公开挂牌，以保持英国的中立国地位。周恩来通过卡尔转告时任香港总督杨慕琦，八路军、新四军抗日非常英勇，得到海外华侨的热爱和支持，他们纷纷捐赠以支援抗战，但一大批货品在香港无人接收，所以八路军、新四军需要派人驻港以便管理。周恩来还转告港督，八路军所设办事处不公开挂牌，不会影响港英当局的中立地位。中共的请求得到港英当局的默许。

在这一背景下，1938年1月初，经先期抵港的廖承志、潘汉年、连贯等人周密筹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同时兼新四军驻港办事处），位于现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其公开挂牌“粤华公司”，经营茶叶生意，以作掩护。任命有主持海外和上层

---

<sup>①</sup> 左双文. 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南沦陷区的抗日斗争 [J].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2021 (2).

统战工作诸多优越条件的廖承志（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为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另具有隐蔽战线丰富经验的潘汉年参与领导，连贯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李默农、张唯一、乔冠华、罗理实等20多人先后以各种合法身份和社会关系为掩护在办事处工作。办事处在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南方局（1939年1月成立）的领导和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环境，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搜集国际局势信息，宣传党的抗战主张，恢复整合香港等地党组织，领导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争取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同情和支持，接收并转运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国际友人捐赠的抗战物资，动员华侨青年和港澳同胞回内地抗战，组织营救被困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sup>①</sup>

1940年8月7日，周恩来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指出：“香港这块地方我们不能丢，国外工作以香港为中心，由廖承志管筹捐，刘少文管统战，潘汉年管情报、文化。”1941年2月，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期间，在重庆与茅盾谈话时又指出：“现在香港有了很大的变化，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海外侨胞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和爱国侨胞支持的窗口，又是与内地及上海孤岛联系的桥梁，香港将成为我们重要的战斗堡垒，因此，我们要加强香港的力量，在那里开辟一个新阵线。”<sup>②</sup>足以显示办事处当时的地位及其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① 杨汉卿.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统战工作 [J]. 广东党史, 2005 (6).

② 实施大营救行动时，还未改名为“东江纵队”。此处为原文引用回忆录。

## 二 建立和发展东江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根据地是华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部分。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广州之后，广东党组织领导人民武装英勇抗击侵略者，在与日、伪、顽的艰苦斗争中，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人民武装——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游击队），并建立了东江抗日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东江纵队”。而围绕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党组织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后来，游击队领导人曾生、王作尧在回忆中曾精辟概括游击队的发展历程和主要任务：“东江纵队是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从初创时期开始，我们团结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参加抗日斗争。”<sup>①</sup>

东江抗日根据地毗邻港澳，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较多。团结发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回内地支援抗战，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即是党依托东江游击队开展战时港澳及海外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例如，全面抗战爆发后，组织香港爱国青年奔赴惠阳、宝安沿海参加抗日斗争。当时，中共香港市工作委员会和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港澳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宣传发动，许多商会、同乡会、文化社团、青年社团和工厂纷纷组织起来，相继成立了香港学生赈济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从1937年8月至1938年11月，中共香港市工委和海员工委以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的名义，先后组织了第三批爱国青年回到惠阳、宝安沿海地区参加抗日斗争，共100人左

<sup>①</sup> 曾生，王作尧. 论东江纵队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5.

右。1938年10月下旬，曾生等人在惠阳坪山建立了中共惠宝工委和人民抗日武装之后，时东南特委又通过香港的党组织，在港澳地区组织大批党员和爱国青年回惠阳参加抗日斗争。到年底，共500余人回到惠阳参加抗日武装。<sup>①</sup>1938年12月中旬，在中共的领导和支持下，南洋惠侨救乡会和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香港海陆丰同乡会三个爱国团体的代表在香港开会，决定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在香港设立总团部办事处，并确定以“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救护伤兵赈济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为宗旨。1939年1月，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即在惠阳县的淡水正式成立，团长叶锋。<sup>②</sup>除此，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积极援助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极大地扩展并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之前，曾生部队的军需物资，主要是靠华侨和港澳同胞捐献的。华侨和港澳同胞精神上、物质上的大力支持，对全国抗战初期中共在东江地区建立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东江地区游击武装力量的坚实发展，也为后来得以成功实施营救爱国文化人士大行动充实了力量。

### 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至香港沦陷前一段时间，香港党组织首先是对港英政府开展争取工作，谋划在香港能够创造相对良好宽松的

<sup>①</sup> 莫岳云. 广东统一战线史（1921.7—2011.7）[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115.

<sup>②</sup> 莫岳云. 广东统一战线史（1921.7—2011.7）[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115.

政治环境。英国对日本的态度客观上在一定时间内为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最终也为营救文化人创造了有利形势。

港英当局为维护香港利益，曾默许中共在香港的抗战活动。抗战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大大损害了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尤其是日本对广东等地的侵占，对港英政府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英国需要借助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中国抗日力量牵制日本在东亚的侵略。为了维护香港的利益，港英当局对香港民众运动的态度也从原来的高压政策向“睁一眼，闭一眼”转变。例如，中共在香港的募捐就得到了港英当局的默许。包括前述宋庆龄、何香凝等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建立及其所策动的抗战救亡运动。又如随着平津沪宁等重要城市的失陷和被封锁，香港成为中共对外联络的重要渠道。为便于更好地开展对港英政府的工作，1937年底，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会晤，在其帮助下，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得以设立。而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与英国是直接的敌人，港英当局更是谋划英军与中共领导的港九游击队合作共同抗日。港英当局对中共在香港抗日的“暗中支持”为中共开展对港英当局和澳葡当局的统战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与港英政府的合作，始终坚持斗争与团结相协调的策略，在与“绥靖”日本的港英政府做斗争时，始终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一定程度上在较长时间内保护了中共在香港的抗日统战工作大局。例如，1939年秋，英国在远东地区试图策划“东方慕尼黑”阴谋时，曾一度采取对日本让步的策略，港英当局因此也限制中共在港文化活动，对抗日宣传严加控制，凡有“抗日”“抗敌”“汉奸”字样的文章一律不准见诸报端。当时，廖承志非常注意采取斗争与团结相结合的策略，既提出指责，又与

港英政府接触，加强与香港警察总监联系，援救被捕的爱国进步人士。<sup>①</sup>

抗战全面爆发时，香港暂时没有被战火波及，成为中共战时对外联系的一个窗口和战略物资、生活资料的补给点。同时，为了躲避战火，大量的民众来到香港，使之成为各阶层人士聚集之地，也包括前述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爱国文化人士。因此中共十分重视在香港的工作，依托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等组织机构的设立和运作，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联系和组织香港进步力量，为以后的工作，特别是香港沦陷后实施对爱国文化人大营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整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统战工作的开展，以及香港在全国抗战中的战略意义，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到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以前；第二阶段，从日军占领香港，到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第三阶段，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以前，史称“战后初期”。

第一阶段，抗战初期。1937年10月初，毛泽东在延安与廖承志彻夜长谈，他说：“中国抗日面临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抗战的物资极为缺少，急需发动海外的华侨捐献物资，支援抗战，这也是在香港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意义所在。”按照毛泽东谈话精神，廖承志明确了党中央需要依托香港的特殊条件完成三大任务：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二是把海外华侨及各国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

<sup>①</sup> 杜俊华，赵小洁. 论抗战时期中共对港澳当局的统战工作 [J]. 甘肃社会科学, 2014 (3).

三是搜集国际最新动态情况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决策参考。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在港成立后，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性，出色完成了中央明确的三大任务。第二阶段，香港沦陷即所谓日据时期，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在这三年零八个月中，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始终高举民族抗战旗帜，在香港坚持抗战。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始终在华南坚持抗战，并组建了港九独立大队，毅然跨过罗湖南河，进入香港，殊死抵抗日本占领军，直到日本投降。这期间，国民党军队早就撤出华南。日军1941年12月8日渡过深圳河，侵入香港时，国民政府也没有出兵香港的打算。英国守军只抵抗了18天，港督即宣布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独立大队，深入香港的日军占领区，在香港同胞支持、配合、帮助下同日寇浴血奋战，深受香港各界和市民拥戴欢迎，英雄事迹可歌可泣。其中一件英雄事迹就是对在港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文化人士进行秘密大营救。<sup>①</sup>

---

<sup>①</sup> 曹二宝. 抗战时期的香港与中国共产党 [J]. 中国法律评论, 2015 (3).



香港沦陷，因国民党当局迫害避险于香港的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文化人士危在旦夕，严峻形势迫在眉睫。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始终顾全民族抗战大局，高度重视，做出不惜一切代价，将爱国人士抢救出来的重大战略部署。各级党组织迅速响应，积极落实，快速而细致地落实制定出周密翔实的营救方案，充分彰显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使命担当。



## 第一节

# 中共中央战略部署

## 始终高举全民抗战旗帜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始终高举民族抗战先锋旗帜，通过《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中华民族共同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并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上，明确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抗日民族斗争的完全胜利。毛泽东深刻阐明当时战争形势及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生死存亡紧要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因此，“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sup>①</sup>毛泽东根据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5年12月25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12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36.

会议精神，在稍后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分析了“九一八”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人物政治态度的变化，强调指出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是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同盟者，强调“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不要关门主义，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致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着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并表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以及其他爱国的抗日力量的积极支持态度，为实施营救在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奠定思想认识基础。

当香港沦陷，滞留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危害时，为营救这批大多数为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率先及时做出重大部署，其首先的战略考虑即是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民族抗战胜利，这也同时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的、大无畏的爱国团结精神和在民族危亡时刻勇于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使命担当。

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南方特别是广东以及港澳的抗战局势，重视领导其抗战活动。一则是由于前述香港特殊的军事、经济战略地位，更多是因为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领导香港的民主革命及抗日活动，具有较为坚实的组织力量，得以成为香港争取独立解放的坚实依靠。

中共中央和以周恩来为领导核心的南方局十分关心香港的命运。周恩来时刻关注日本南进战略动向，香港沦陷前后，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及时制定应变措施，多次指示香港党组织未雨绸缪，早

做准备。<sup>①</sup>

## 实施大营救的战略指示

1941年12月25日，驻港英军不敌日军攻势，港英总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香港沦陷。攻占香港后，日军立即对香港展开了各方面封锁，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大肆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勒令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前往“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日军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事务所”在报上登出启事，日本文化特务和久田幸助在电影院打出幻灯，企图诱捕。此前陆续转移到香港，此时滞留在港的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香港沦陷前，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就已通过各方情报获得日军即将南进侵占香港的侵略意图，多次致电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指示要求其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强调要想方设法保护好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生命安全，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sup>②</sup>

日军进攻香港伊始，中共中央紧急向南方局和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发出电报，电文如下：

恩来、廖（廖承志）、潘（潘汉年）、刘少文：

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此事

<sup>①</sup> 周恩来对日本南进战略的认识与香港秘密大营救 [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5 (7).

<sup>②</sup> 李向峰. 抗日战争中的秘密大营救 [J]. 党的生活 (黑龙江), 2016 (1).

请酌办。

书记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sup>①</sup>

周恩来高度重视这项营救任务，多次向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人员廖承志、潘汉年发去电报。9日，周恩来致电廖承志：

廖、潘、刘并书记处：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请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

（二）请立即派熊子民往桂林告梅龚彬、胡西民，并转在柳州左洪涛，以便招待他们。

（三）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如戈宝权、张企程等）可来重庆。戏剧界朋友可要夏衍组织一旅行剧团专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

（四）极少数的朋友也可去马来西亚，但这要看港的交通条件，恐不可能。上海、马尼拉已不可能。

……

（七）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分别负责开支，并经过你们三人会议决定动用。

（八）承志如欲与港英政府见面，并得令保证与他们一同撤退，可留港到最后再走。海南岛事应该与他们立即确定，如港政府派军护送人物及军火至海南岛，则可送一批人去，并进行破坏日机场及仓库交通线。

<sup>①</sup>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南方局党史资料：第3册[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74.

（九）孙、廖两夫人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望派人帮助她（他）们离港。

周恩来<sup>①</sup>

12月20日，日军在港岛鲗鱼涌北角登陆的时候，周恩来又发一份紧急电报，询问“香港文化人士如何安置，朋友是否已撤出”等问题。<sup>②</sup>

12月下旬日军占领香港前，周恩来又对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做出了更为明确、具体营救“香港文化人”的九点指示。<sup>③</sup>

从上述几次电文的急迫与重视程度，可见中共中央始终心系香港局势，对其发展趋势具有清晰的判断，对香港未来短期内的困境也有清晰预测，并做出明确具体的部署。电文中明确了大营救的具体路线部署、负责人员安排、不同界别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具体区分部署安排、经费使用、后续举措，以及参与支援英军抗战等十分细致的举措部署，对大营救工作给予高瞻远瞩又清晰具体的指引，奠定了大营救的实施方案制定的重要基础。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次行动部署及时周密，各方联动，并取得重大胜利，其中周恩来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

---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三[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71.

② 周恩来年谱（1898—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34—535.

③ 周恩来书信选集[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210—211.

## 第二节

# 各级党组织勇挑重担

## 一 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迅速响应

### （一）中共中央精神的迅速传达落实

在收到中共中央以及后续周恩来的指示，要求立即组织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情报人员向南洋和东江撤退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率先勇于承担起大营救的特殊而艰巨的任务。

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的廖承志及时联络，传达中央指示，并尝试召集各方人员准备谋划部署。

首先是迅速召集时任粤南省委书记的梁广、东江游击队负责人尹林平和各相关方面人员，包括杨康华、潘汉年、张文彬、饶彰风、连贯、刘少文、李少石等，召开紧急会议<sup>①</sup>，传达党中央和周

<sup>①</sup> 关于此次会议的具体时间，大多认为是在1941年12月9日，即日军进攻香港第二日。然而，也有学者据史料考证，认为在这一时间点集中召开传达中央精神的会议不尽符合党地下工作的组织原则及惯例。黄施民在广州召开的关于“抢救文化人”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谈到会议具体地点：“当时我和连贯、小潘到洛克道130号香港市委的一个联络点，好像就是那一次传达中央关于抢救的指示，是刘少文或是连贯传达的”，也未明确具体时间，只知道在连贯离开香港前。就目前查找到的史料，未能确证这一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形式，然而，党中央急电以后，应是有一个传达中央精神的集体商议过程，且应是在廖承志等撤离到港岛之前。遂在此仍对这一部署过程进行叙述。参见：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M]，中共惠阳地委党史研究室，1984。

恩来关于抢救文化界精英人士的指示精神并部署开展营救工作。<sup>①</sup>廖承志在会上强调日军将对文化人士下毒手，扼杀进步文化，乃是想从精神上控制和奴役中国人。为了粉碎敌人的侵略企图，必须抢在敌人尚未建立严密管制前，把滞留香港的这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党的干部及其家属都逐一找到并安全转移到大后方。会上，廖承志与刘少文、李少石以及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研究制定了营救工作的具体办法并做出了明确的部署安排，迅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营救在港爱国人士的战略指示精神。会议一致决定：不论困难和危险多大，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完成任务。廖承志“当机立断，决定派人和东江游击队联系，要曾生同志尽快派一支别动队到九龙来协助疏散的工作”。<sup>②</sup>先设法与困在香港的这批人士取得联系，帮助他们火速转移，秘密护送到党领导的港九游击队基地，再转往广东的惠东宝抗日根据地，最后护送他们去大后方，商讨撤往韶关、老隆等地区的交通路线问题。会议决定：整个抢救工作由廖承志统一指挥；刘少文、梁广、潘柱（又名潘静安）等留港，担负具体的香港方面的联络营救工作；东江游击队负责人尹林平及其领导的东江游击队，负责从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人员护送和接待工作；老隆至韶关的安全护送工作由后东特委负责；到达韶关以后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粤北省委负责安排。廖承志、连贯、乔冠华迅速经东江游击区前往惠州、老隆、韶关等地，布置地下交通线和联络站点，做好后期的疏散工作，连贯负责与部队、前东和后东特委以及韶关党组织的联系工作，乔冠华留韶关，

① 李军晓.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述略 [J]. 抗日战争研究, 1997 (3).

② 夏衍. 夏衍全集 [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 245.

主持文化人向内地疏散。<sup>①</sup>其余问题等待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进一步指示。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尹林平等成为组织大营救的核心领导集体。<sup>②</sup>

会议也初步商定转移具体实施路线，大致分为两个方向线路：一条是由香港偷渡过九龙，到东江游击区，再由东江地区游击队和地下党组织护送到大后方，或到苏北解放区；另一条是经长洲岛，偷渡伶仃洋到澳门，然后经广州湾或中山、台山至桂林。<sup>③</sup>

## （二）港九组织交通线的迅速贯通

任务布置妥当后，相关人员立即行动起来。然而局势发展迅速，无疑给还未完全确定的营救方案部署增加了谋划困难，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因应局势变化不断迅速做出部署调整安排。最先面临的困难即是九龙与香港岛的联系一度中断问题。

九龙于12月12日失守，廖承志立即指派乔冠华、叶以群联络并将部分住在九龙的爱国文化人士转移至港岛，进行了妥善安置。12月25日，香港沦陷。日军立即封锁了香港岛和九龙间的交通，早前转移到香港岛的大部分文化界人士和抗日民主人士，以及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南委、中共粤南省委、中共香港文化工委、中共香港市委等中共组织主要领导大多被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

<sup>①</sup>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大事年表 [M] // 广东文史资料：第40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25.

<sup>②</sup> 《白石龙大营救始末》一书中认为，为统一行动，便于沟通协调，统筹协调，此时成立了一个大营救的领导机构：“港九疏散委员会”。然而，书中仅有一份1942年2月27日张文彬、尹林平给中共中央电报中出现了“港疏散委员会”称谓为证，并未给出确切史料出处。在此记录。参见：余俊杰，刘中国. 白石龙大营救始末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142.

<sup>③</sup> 杨汉卿.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统战工作 [J]. 广东党史，2005（6）.

则被隔离在九龙。<sup>①</sup>港九两地间党的联系完全中断。12月下旬至香港沦陷前，廖承志得到了周恩来更为明确的具体营救香港文化人的“九点指示”。在这种背景下，香港岛、九龙两地都急于联系上对方，迫切需要迅速重新打通香港岛与九龙的交通。<sup>②</sup>

日军封锁港九间的海面以后，连贯和“廖承志、乔冠华在停泊于铜锣湾避风塘的一条大船上”，一面躲避，一面研究重新建立港岛与九龙交通线联系的办法。<sup>③</sup>12月27日，连贯派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人员潘柱联系廖安祥，要他“设法过九龙半岛和林平联系，商讨抢救在港民主人士及廖承志、何香凝、柳亚子等”。29日早上，廖安祥“乘车到七号差馆前的均益货仓旁乘小艇过海。登上九龙后，在佐敦道找到林平，会商了抢救在港文化界人士脱险之事”。经过商量，尹林平决定指派李健行带廖安祥一道“赶快回香港。但是海面已被日军封锁，交通断绝”，经过一番周折，“第三天（约31日）才在红磡找到一艘敬记船厂的电船”，过海中途又为日军追回，“直到晚上六时左右”，“才碰到驶过的小艇”，同意送他们过海，终于才在元旦前夕抵达港岛。李健行与廖安祥抵港后，“当晚即把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三人送到铜锣湾避风塘刘水富的艇上安顿下来。”次日一早（约1942年1月1日），又找来小艇，三人化装成商人，在李健行保护下乘小艇“过海”到达九龙

① 《尹林平》专集编委会. 尹林平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136.

② 游海华. 抗战时期香港秘密大营救若干问题考辨 [J]. 党的文献，2020（4）.

③ 《连贯同志纪念文集》编写组. 贤者不朽：连贯同志纪念文集 [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292-293.

红磡，终于与尹林平会面。<sup>①</sup>港九间党的组织交通线联系重新被打通。<sup>②</sup>

当时，尹林平在向李健行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抢救文化人的电报指示时，强调指出只有把“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等抢救出来”，才能找到失联的几百名文化人，并要求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打通九龙至香港的渡海交通线”。可见，对抢救爱国人士的部署规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谋划部署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一过程本身就存在着许多曲折与艰辛，而当中也可以看到在港共产党人的响应迅速，勇担使命。

### （三）部署方案的迅速制定

从前述营救前的情势已经看到，大营救将要面临的困难之多，形势之复杂可见一斑，这需要在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的基础上，依据具体情势制定详细周密的具体营救计划。首先是营救的契机和具体实施的时间问题。香港沦陷后，日寇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港岛供暖燃料需求问题，以及其他物资短缺问题等，在清查人口的基础上，准备遣散香港居民，将香港当时一百六十万人口减至六十万。<sup>③</sup>八路军驻港办事处遂决定依托日军遣返难民这一契机，以之作为掩护，实施大营救。

<sup>①</sup> 据在广州召开的关于“抢救文化人”专题座谈会的发言纪要，廖、连、乔三位同志由李健行掩护至避风塘安顿下来，最后小艇离开的确切时间，与其他著作记载均有所不同，其记述确认为1月2日，三位同志最后乘小艇到达九龙。参见：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M]. 1984：41.

<sup>②</sup>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M]. 1984：109-112.

<sup>③</sup>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M]. 1984：32-33.

此前所述，为重新打通港九间交通线，李健行受尹林平指派，秘密到达港岛会见了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他同时也带来了日军决定于近期内遣散香港岛居民的情报消息，“这是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可混在这批‘难民’的人流中，撤到内地去”。大家都认为这是把爱国人士撤出香港敌占区的好机会。廖承志等当即决定立即抓住机会撤出香港。<sup>①</sup>连贯知晓后也认为，李健行“带来了一个消息，使我们做出了立即撤出香港的决定”。

于是，元旦刚过，如前述，廖承志、乔冠华、连贯在李健行等香港地下党同志的安排下，转到了铜锣湾避风塘的一艘驳船上。在这里，他们同张文彬会面，“共同研究和详细制定了如何分批救出陷落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计划”。<sup>②</sup>此后，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在李健行保护下乘小艇到达九龙红磡，再在旺角与尹林平会面。当天，他们以一起打麻将作为掩护召开商谈会议，进一步研究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负责从九龙抢救人员并护送到游击区，以及沿途人员的接应转送、安全保障、食宿等详细的营救计划问题。接着又在李健行的护送下，廖承志等一行人混在难民队伍里，从旺角通过启德机场附近的几个日军检查岗哨，到达西贡。在这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短枪队接替李健行，护送廖承志等坐船通过大鹏湾，在沙鱼涌登陆，辗转撤离到游击队惠阳大队部所在地惠阳县田头山石桥坑。尹林平和张文彬也先后到达这里，与廖承志等一起在石桥坑的一个庙里开会，再次详细研究了从宝安游击区、惠阳游击区通往惠州的安全护行工作，并将营救文化人的情况

<sup>①</sup>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M]，1984：65.

<sup>②</sup> 廖承志文集、传记、编辑办公室编. 廖承志文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45.

和计划，拟好电报稿，由尹林平和张文彬带到路西东江游击队的队部，通过那里的电台向中央报告。<sup>①</sup>撤退临行前，廖承志向留在香港的负责同志交代了寻找联络爱国人士的重要任务。

廖承志在启程北上韶关的时候，沿途向前东特委、惠阳县委、后东特委等党组织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安排接应工作。又把连贯留在老隆，负责惠州、老隆、兴梅一线的转送、接待工作。乔冠华留在韶关，主持文化人向外地疏散。廖承志自己则准备前往重庆，亲自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香港沦陷后的工作。<sup>②</sup>

营救滞留香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大行动的具体营救计划，是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尹林平等人，在迅速响应落实党中央号召，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多次会议、多方磋商才商量成熟并确定下来的。<sup>③</sup>

## 二 东江游击队的积极配合

1940年7月，尹林平任中共东江前线特委（以下简称“东江特委”）书记，兼任东江游击总队第三、第五大队政治委员。尹林平在领导全省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充分利用合法的形式在东莞、增城、惠阳、南海、顺德、中山、从化等县，建立了广东地方党组织掌握的民众抗日武装，即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在东江、粤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使人民群众增

<sup>①</sup> 《连贯同志纪念文集》编写组. 贤者不朽：连贯同志纪念文集 [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292-293.

<sup>②</sup>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 [M]，1984：20.

<sup>③</sup> 游海华. 抗战时期香港秘密大营救若干问题考辨 [J]. 党的文献，2020（4）.

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抗日游击队得到了空前的壮大，<sup>①</sup>这也为大营救一路的安全护送奠定了深厚的组织基础，力量准备。

香港沦陷前半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游击队”）为了解决部队的军需给养，一方面派何启明等进入香港建立交通联络站，另一方面又派李健行和苏伟民等到香港建立东利运输公司，向在香港做内地生意的客商承运货物回内地，并为部队收取运货保护费和税款。为了遏止日军对这条物资运输路线的封锁、破坏、骚扰，并将其转变为我军所控制和利用，游击队派黄冠芳、卓绍基、彭亚景等带领武工队，武装护送客商货物的运输。他们活动的地区包括大鹏湾的沙鱼涌、土洋、茜坑、三家村、溪涌、上下洞和盐田等地，后来逐步伸展到九龙新界地区的沙头角、大埔和西贡等地。前期款项和物资运输线路的打通，为实施营救的经费、物质保障做了充实的准备。<sup>②</sup>

然而，东江游击队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接受党中央下达的抢救任务的。香港之战爆发前夕，东江游击队正处于极端困难时期。1940年的“小东征”使部队受到重大损失，曾生、王作尧两部只剩下几十支枪一百余人。1941年9月，曾生部队在东莞受到国民党的“围剿”，主力被迫转移至宝安与王作尧部会合。这样，部队的力量薄弱了，地盘也缩小到有限的范围。东江游击队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迎难而上，迅速反应，最后出色完成抢救任务。<sup>③</sup>

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接到党中央关于令他开辟交通线路及负责沿途护送和接待事宜的指示后，旋即由香港潜回九龙，并立即组织

① 官丽珍. 尹林平：曾获毛泽东赞赏的人 [J]. 红广角, 2013 (12).

② 李健行. 关于抢救香港敌占区文化界人士的回忆 [M],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 1984: 75页.

③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 [M], 1984: 41.

所属东江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展开营救香港撤退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组织工作。他就是本着团结力量共同抗日的追求与目标，积极执行党中央关于营救爱国人士的重大战略部署，正如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尹素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这些被营救的都是文化界精英、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战士，如果被抓，将是中国的一大损失。所以当东江纵队知道日本要进攻香港时，就按上级指示第一时间进行营救。”<sup>①</sup>

东江游击队主要负责撤离路线的“东线”，从九龙往惠州再至粤北韶关。为了确保途中安全，在广东省委东江前线特别委员会书记尹林平的领导下，秘密打通了九龙至惠宝游击区的交通线。尹林平指派曾参加“洪门”并在这一地区有影响的曾鸿文等人，深入新界、元朗等地区进行抗日活动，很快发展了数十人的游击队，据此，建立并打通了从九龙青山道经九华径到荃湾，越过大帽山到元朗十八乡，经过赤尾，进入宝安游击区的交通线，即通常所说的九龙进入惠州游击区的“东线”陆路线。

继而，进入西贡半岛活动的短枪队一部与在九龙市区工作的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打通了从九龙市区到西贡，然后乘船渡大鹏湾，在沙鱼涌、淡水等地登陆，进入惠阳地区的交通线，即通常所说的九龙通往惠州游击区的“东线”水路线。

大批文化人从白石龙经惠阳坪山、周田，然后通过惠州。惠州是的东江重镇，是东江政治、经济的中心，水陆交通方便，是通往内地的必经之地。当时，惠州的情况很复杂，敌伪分子插手其间。国民党顽固派估计香港沦陷后，大批进步分子必然要经东江回内地，便调遣特务，加强东江一带的侦察活动，在惠州、河源、老隆

<sup>①</sup> 中国小康网记者麦婉华. 百年党史华南篇 [EB/OL].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_forward\\_13675599](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_forward_13675599), 2021.07.21.

等地的酒楼、旅店布满特务，并以防日本特务混入内地为名，在这些地方设立“港九难侨登记处”，一面限令自港九回来的人都要亲自前往审查登记，领取证件；一面又增派特务，加强水路关卡的检查。这些给营救行动增加了很多困难。

为了做好营救工作的前期准备，疏通营救路线上的各方面关系，东江游击队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大量的工作。

自1940年顽固派围攻惠东宝游击队以来，中共在惠州的力量比较薄弱。而为了接应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卢伟如以“香港业昌公司”经理的身份，与惠州区委书记蓝造、陈永等冒险进入惠州建立接待站。连贯亦在这时派廖安祥来惠州开设源吉行。游击队从香港运来一批批煤油、棉布、汽车轮胎等热门货物，供给他们。一时，商人、国民党军政官员趋之若鹜，卢伟如、廖安祥就在与这些人周旋中，建立各方关系，站稳了脚跟。<sup>①</sup>这发展和巩固了惠州的组织力量，也为营救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其间，“第三党”人开设的东和行也得到指示，积极配合游击队行动，体现了大营救行动是一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方力量合力而实现的胜利。

再有，东江特委在坪山、淡水到惠州沿途设立了几个交通站、接待站；又为了不致暴露爱国人士真实面目，避开国民党的阻碍迫害，地下党同志通过一些商行，用钱从“惠龙师管区司令部”买到几百张难民证，在文化人离开游击区时，发给他们，为沿线通行，以及后来在国统区行动提供方便。<sup>②</sup>

---

①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M]，1984：28-29.

②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M]，1984：28.

### 第三节

## 周密翔实的营救方案

在中共中央的战略领导下，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迅速决策引领下，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与香港党组织通力合作，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经过多方联系、沟通与协商，再结合此前党在香港、东江等地区的组织力量、武装力量基础，以及此前的准备部署工作开展情况，最终研究商定了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具体方案。

### 确定营救线路

依据形势的变化及面临的具体情况，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最终确定了大营救方案，其大体可以概括为“东、西”两线方向，“三水路一陆路”的具体撤离路线，而东江地区沿线，特别是南粤古驿道成为大营救撤离转运的主干线。

#### （一）“东线”开辟及其准备

通常所说的大营救路线的“东线”，应是指九龙至惠州，到韶关，最后转送大后方的，往东江游击区方向的营救线路。其又包括大部分人员转移的陆路，以及少部分人员转移的水路。

经海上走水路，相对要便捷些，但要全部人员从海上撤走是不可能的，因为交通工具不够，而且日军对海上的封锁很严。于是，大多数人是从“东线”的陆路撤退，他们必须与难民一起走陆路，即从九龙越过新界到宝安，过白石龙再前往东江游击区。走这条路线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一是此前党在东江地区的游击队抗日力量得到较大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得以保障人员的安全。二是党在香港的游击队力量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并已打通两条交通线。在日军进攻港九时，东江游击队即已派两支武工队进入新界、九龙开辟新区。一支是高杨、曾鸿文率领，活动于元朗、荃湾一带，一支由黄冠芳、刘黑仔、刘春祥率领，活动于九龙城以东和西贡、沙头角一带，开辟了两条通往宝安游击区的陆路交通线。被营救爱国人士离开九龙市区以后，过了荃湾，即有党的游击队活动，他们得以在党的武装力量的保护下，安全到达游击区。<sup>①</sup>同时，东江游击队还抽调谢愚照、麦容、赵林、沈剑光、王彪等，队伍中最能干的、有经验的交通员带路，在险恶地段也有武装护送。<sup>②</sup>

没有暴露身份的文化工作者，借日军遣返“难民”的契机，乔装打扮成商人或难民，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陆续撤离。他们沿着沙田、粉岭、大埔，通过布吉的敌伪据点后，在铁路边上的木古村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再往东江游击区转移。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香港市委及东江游击队对沿线交通接待站的部署落实细致。先是爱国人士从香港岛到九龙的撤退线路安排。

<sup>①</sup>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 [M]，1984：23.

<sup>②</sup>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 [M]，1984：26、54.

爱国人士从港岛到九龙时，选择红磡几处僻静的小码头作为登岸点，交通员将接应并带领他们穿过市区到达联络点。然后，根据各人乔装后的身份，分别护送至事前准备好的各秘密接待站，这些接待站分布在九龙市区的上海街、花园街、佐敦道、窝打老道、通菜街、福华街等地方，有漂亮的洋房，有普通住宅，也有停课了的学校校舍，还有歇业的商店等，都佯装掩护作为交通点。<sup>①</sup>由刘少文领导港岛的抢救工作，潘柱协助。九龙方面的抢救工作则由尹林平领导，从九龙到宝安沿途的警戒、经费、食宿问题，由尹林平、王作尧部署，由何鼎华具体主持，以东利运输公司经理身份作为掩护的李健行协助。主要分两段：一是由香港撤出到九龙并经西贡交通线至游击区的，由李健行负责护送和安排；一是由九龙经青山道、荃湾至元朗撤出的交通线，由何鼎华负责护送和安排。每批撤出港岛的人员人数、名单、离开港岛前的集合地点和撤出时间，均由潘柱确定后，由李健行负责派交通员去香港联系，接收关系。<sup>②</sup>九龙方面的工作起着联结的重要作用，既和港岛刘少文接头，又和东江游击队以及沿途交通站、接待站联系，而何、李两人紧紧依靠党组织，在与爱国人士的通力合作下，克服重重困难，周密地落实好了接、转、送工作。刘少文指挥地下工作者紧张地做好从东线撤走的准备，包括改装用的各式衣服，寻找地方做临时集中点，用重金租用船只作为到九龙的渡海工具等。<sup>③</sup>

从九龙出发的线路安排虽较为曲折，然而每一环节都打通并做

①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M]，1984：25.

②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M]，1984：81.

③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M]，1984：23.

了周密部署。具体行进路线是：从九龙油麻地、旺角等各交通站向西北出发，过荔枝角道、青山道，到达荃湾交通站。稍作休息后继续出发，经上塘，登上大帽山。大帽山在日军进攻九龙后成为“三不管”地区，有土匪占据。由在当地较有影响力并长期与地方武装势力打交道的曾鸿文负责打通这里的交通线。翻过大帽山，经过锦田，到达新界元朗十八乡，留宿元朗。从元朗出发，到勒马洲，通过深圳河附近的敌占区，到宝安县，再往前走三十里缓冲地带，过梅林坳，即到达东江游击区的前哨阵地白石龙。在深圳河穿越敌占区时，为了保证安全，动用上步、赤尾、皇岗三个地下交通站，多数人员从皇岗交通站经过。

白石龙是从九龙撤出后的一个重要转接点，整个大营救的领导机构就设在白石龙。<sup>①</sup>但白石龙不大，面临较大的安置压力，包括解决诸多人员的吃住和安全问题等，特别是由于东江游击队的活动范围不大，收入不多，加上海外支援已经断绝，面临的经费压力较大。部队需要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开拓税收，节约开支。

离开白石龙，越过广九铁路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到达惠阳县的坪山、周田，再经此到达惠州，在这里就是已到达惠阳游击区。游击队将通过各战线的同志打通关系，准备好“难民证”，再度将爱国人士乔装成难民，以便在国统区行动便利。在坪山、淡水到惠州沿途都设立交通站、接待站。

从惠州出发再往东北的老隆，主要安排走水路，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疏散办法：不受国民党当局注意的尚未暴露的人员，公开乘客轮转移；已经暴露的被国民党伪军注意或要缉捕的

---

<sup>①</sup>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 [M]，1984：54.

人员，则化装通过内线乘国民党机关运私货的船走，这些船沿途可以避开搜查；再有的即由地下党同志租船，游击队同志亲自护送。被营救人员到达老隆，由连贯等负责安排接应。

经过老隆后，有的人经兴宁、梅县、大埔等地转接前往闽西南，有的暂时隐蔽下来，有的再辗转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多数人员则从老隆经韶关，乘火车经衡阳前往桂林。

老隆与韶关的交通站，通过此前统战工作的开展，利用当地商行作掩护来完成接待和转送任务。例如依托国民党中的左派人士李章达、赵一肩、张文、许崇清等人的协助，保障被营救人员通过时的安全。又如依托老隆的义孚行、侨兴行办事处，韶关的侨兴行和香港汽车材料行等，这些与共产党地下党联系密切的并且在地方有一定影响的商行，作为掩护。他们为疏散人员提供住宿方便，还有交通工具，如侨兴行，其在广东、广西、湖南等地都有办事处或商号，于是利用关系，使人员以商行身份作掩护，躲过敌人搜查。<sup>①</sup>

## （二）“西线”的开辟及其准备

日军刚占领香港不久，一个名叫和久田幸助的日本文化特务，在香港各个电影院打出幻灯，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五人到半岛酒店（沦陷初期日军司令部所在地）会面。这些文化人士在香港时间长，接触面广，容易被人认出来，不能由陆路往东江撤退，廖承志建议，最好走水路乘船直达澳门。于是，有了大营救中“西线”营救路线的开辟谋划。

廖承志、刘少文、梁广等领导人认为，一部分在香港时间长、接触面广的文化人，主要是电影界、戏剧界的人士，如果走陆路去

<sup>①</sup>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 [M]，1984：30.

白石龙游击区，容易被敌人认出来，决定通过党组织掌握的香港大中华酒店，安排他们乘坐走私船只，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到澳门，然后由澳门的中共秘密联络站帮助他们经广州湾（今湛江）或江门、台山到桂林去。

“西线”路线主要为水路，具体路线安排为：通过香港大中华酒店这个党的秘密据点及其周密安排，联系走私船只，陆续分批撤走。从九龙下船，往西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到澳门。

在澳门，通过建立的秘密关系，在党的秘密联络站——柯麟开办的镜湖医院的协助下，找到了通往四邑的木船。部分人员从这里乘船出发，经三灶岛，到达台山、石岐或者江门，然后沿西江而上经肇庆、梧州、柳州，最后到达桂林。另外部分人员，如千家驹等，则从澳门乘船到广州湾（今湛江），经钦州、灵山、柳州到桂林。

从这条路线走的有华嘉、孙晓恩、范长江、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金仲华、金山、王莹、郁风、谢和庚、张云乔、千家驹等几十人。<sup>①</sup>

作为“西线”香港方面重要交通联络点的香港大中华酒店，是中国共产党前期即已打通的地下交通联络点，为“西线”的开辟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香港大中华酒店位于港岛上环干诺道中，由爱国华侨陈孔图创办。陈孔图之弟陈小秋，原是中央苏区的交通员，1938年调到八路军广州办事处工作，协助夏衍、郭沫若在广州办《救亡日报》。日军侵占广州前，陈小秋随救亡日报转迁桂林，公开身份是救亡日报社营业部经理，在党内接受李克农的直接领导

<sup>①</sup>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 [M]，1984：21.

（单线）。皖南事变后陈小秋又受命组织桂林的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到香港大中华酒店后，陈小秋找到兄长陈孔图帮忙，不久又担任酒店经理。陈小秋以此身份和酒店的便利，设立秘密联络站，协助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做了大量工作，从内地来港的文化人士和去南洋的进步青年，大都通过大中华酒店中转。港战爆发后，许多从九龙撤到香港的党内外人士住在此处。其中经西线撤退的文化人、民主人士，也多以此为集中点。

廖承志在离开香港之前，把陈小秋的组织关系转给了刘少文和肖桂昌，以便陈小秋留港协助刘少文开展营救工作。陈小秋开展营救工作还有他的有利条件，一是与陈公博有关系。陈小秋的父亲当年花钱供陈公博读书，陈公博尊称陈小秋之父为“契爷”。此时陈公博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长、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通过陈公博，陈小秋在日本的办事机构做日语“通译”，同时搞到一张日本人发的“特别通行证”，这为他自由出入，找人找船、转移文化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二是陈小秋与省港直通货轮有联系。日军攻陷港九后，封锁了海上的交通，但香港与省城广州之间，仍有一艘大货轮可以自由往来。这艘船是专门运送蔬菜到香港的，日本人在广州有个专门负责采购装船的办事机构“蔬菜组合”，到达香港后就由大中华酒店接货。大营救过程中，陈小秋利用这艘货轮，送出了一些文化人士。

肖桂昌于1940年冬从延安到香港，负责南委的秘密交通、情报、电台和机要等工作。香港沦陷前，肖桂昌请曾留学日本的蔡伯华夫妇，在七姐妹（北角的小地名）成立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陈小秋也在那里兼职教日语。日军从九龙攻击香港时，从北角登陆，肖桂昌、蔡伯华夫妇都跑到大中华酒店来。香港码头离大中华酒店很近，有位原在大中华酒店做事的工头，与蔡伯华一起搞了个“街

渡”，专事港岛—九龙一线走私送人送货，从中获利。<sup>①</sup>由西线撤退的文化人，大多是通过地下党联系的“街渡”，首批范长江等、之后的夏衍等一批批人，走的正是这条线。

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统战工作的开展，为“西线”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保障和组织准备。澳门位于香港的西部，隔伶仃洋与香港相望，相距仅约60公里。澳门是连接广东与海外的门户，地理位置特殊，抗战时期，虽然日军渗透到了澳门，但澳门明面上仍是葡萄牙统治，保持了形式上的“中立”。“西线”对从香港撤退的文化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线路之一。早在日本侵略香港战役爆发时，周恩来就在给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的电报中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请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sup>②</sup>港九疏散委员会提前派遣李少石赴澳门，与澳门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柯麟医生取得了联系。

澳门有坚强有力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成为西线撤退路线的重要中转站。早在大革命时期，澳门就有了党组织的活动。抗战时，为应对日军侵占广州后的形势，中共广东省委于1938年10月24日在香港成立东南特委，其中澳门工委由东南特委负责。1940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分为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其中粤南省委设在香港，澳门党组织由粤南省委负责。在开展澳门的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方面，柯麟起了突出的作用。

柯麟（1900—1991），原名辉萼，广东海丰县人，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著名医学教育家。他于1924年加入共青团，

---

① 陈小秋. 在大中华酒店的日子里 [M] // 刘中国, 余俊杰. 白石龙大营救文献.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5: 165.

② 余俊杰, 刘中国. 白石龙大营救始末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5: 162.

不久转为中共党员，成为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地区学运领袖。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工作，1935年起在澳门工作，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柯麟在事业上奋发进取，由一个普通开业医生，成长为澳门镜湖医院院长，将原来普通的镜湖医院，办成了澳门规模最大、管理最好、医疗水平最高的著名医院，他本人则以当地一代名医身份跻身澳门上层社会。他以行医为掩护，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sup>①</sup>柯麟的弟弟柯正平（1911—2005），于1936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澳门共产党组织机构的创建人之一。在这次大营救活动中，柯正平也是组织者和主要干部之一。

### （三）“特殊线路”的开辟及其准备

除“东线”“西线”外，部分特殊人员如需要特别照顾安排的柳亚子、容易暴露的何香凝等，在撤退线路上做了特殊安排。有从九龙出发往东，西贡下船，经沙鱼涌，走海路往东江游击区撤退的，也有部分往西北方向转移的。一般将此特殊安排称之为“特殊线路”。

“特殊线路”水路，多从港岛营救出来在九龙各交通站集中。从九龙城出发，先由李健行带领，从市区经旺角、太子道，过启德机场出市郊，再从茶果岭、坑口到西贡企岭下，由黄冠芳、刘黑仔的部队接应，再具体由江水的手枪队从市郊一路护送到西贡，交给陈志贤的护航队。

随即进入海上航路，海上护送经大鹏湾到达沙鱼涌、大小梅沙。上岸后，有的送到葵涌、惠阳坪山等地，有的则送到上洞，由

---

<sup>①</sup> 杨永等. 海丰风情录 [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186.

惠阳大队派人接应、护送。这部分人员又分别经淡水、茶园、周田等地集中到惠州。

这条路线，有一段路程是坐船，因船少，只能照顾一些老弱的人。尽管有时可能遇到日军或海匪的袭击，但是，由于沿途东江游击队的前期部署和营救时的保护，大大增加了安全保障，使营救都总能化险为夷。<sup>①</sup>

另外还有科学家、科普作家高士其，于1939年在党组织安排下到港就医，因瘫痪不能随队撤退，也是派专人黄秋耘护送他前往韶关，并是在十多个回内地的青年学生协助下，从香港坐船到广州，再至清远，从三水县和芦苞之间的无人区穿过，终到达韶关。穿越近四里路的无人区时，黄秋耘等共产党人为照顾高士其，历经艰辛，背着他走了过来。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想尽办法争取做到不漏一人地进行营救的部署。

## 寻找联络并确定被营救人员

### （一）联络并隐蔽爱国人士

日军攻打香港前以至日军侵入九龙前的一段时间内，廖承志陆续地会见和分头传达中共中央指示，或委托党内同志通知和安排，迅速对香港文化人隐蔽和联络工作进行了布置。<sup>②</sup>

在周恩来给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首封指示电报中，点名称营救的第一人就是宋庆龄。廖承志即在第一时间找到了宋庆龄，劝说并保

<sup>①</sup>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M]，1984：26.

<sup>②</sup> 游海华. 抗战时期香港秘密大营救若干问题考辨[J]. 党的文献，2020（4）.

护她离开住处，在启德机场被日军攻占前几个小时，搭乘最后一班飞机飞离香港，前往重庆。

香港《华商报》和邹韬奋创办的《大众生活》分别于1941年12月12日和12月6日停刊。18日下午，廖承志在香港告罗士打大酒店“分批分组地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并“决定了撤退时的小分队负责人、行前联系地点以及港九沦陷后的应注意事项，并分发了隐蔽和撤离时必须的经费”。<sup>①</sup>

早在日军进攻九龙之时，廖承志已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指派乔冠华、叶以群到九龙，把找到的文化人都先送到香港岛，为他们寻找住处隐蔽起来。与此同时，通知了原住港岛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都立即搬家，隐蔽起来。除了规定单线联系的人外，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等候撤退香港的通知。<sup>②</sup>夏衍、胡绳、司徒慧敏等为共产党员，积极参与联络部署，并依托《华商报》建立的关系圈发布通知。邹韬奋、戈宝权等文化人士经常向《华商报》投稿。这些爱国文化人士在香港沦陷前已形成了一个文化社交圈，为稍后联络更多文化人进行具体撤退做了准备。《华商报》“坚持出报三、四天”，“到了最后不得不停止出报时”，夏衍在编辑部全体人员的会上正式宣布了廖承志的指示和对人员疏散的具体安排：每个人都要搬家换个住处，每个人先发两个月生活费，除了各人规定的单线联系以外，新的住处不许告诉任何人，然后等待通知撤离香港。<sup>③</sup>

<sup>①</sup> 吕传彬. 香港沦陷前后中共秘密营救驻港进步人士始末 [J]. 历史足音, 2013 (6).

<sup>②</sup> 《连贯同志纪念文集》编写组. 贤者不朽：连贯同志纪念文集 [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291.

<sup>③</sup>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 [M], 1984: 138.

在隐蔽爱国人士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共产党员的细致与耐心，敢冒风险，勇挑重担，比如发挥重要作用的夏衍。

夏衍是1941年5月成立的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5人小组成员之一。皖南事变前后，在中共中央的指示安排下，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相继撤退到香港。为了加强对香港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建立中共对外宣传工作的基础，周恩来批准成立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由5人小组领导，隶属于中共中央南方局，5人小组成员分别是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sup>①</sup>香港沦陷前，夏衍受党组织委派，接受负责联络香港文化人的重要任务。当时，地下党员陈小秋已经以酒店经理的身份作掩护，在香港大中华酒店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系点。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旅居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的进步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经过香港时，不少人都在大中华酒店落脚，由陈小秋负责接待，以及掩护革命党员的任务。九龙战事发生后，许多党内外人士住进了大中华酒店。夏衍在接到任务后，与陈小秋密切合作，开展联络与寻找、集合文化人的工作，逐渐联络并集中起多位须营救的爱国人士，隐蔽起来。

后来在营救行动具体实施中，夏衍又成为所联系的香港文化人撤离的组织者。夏衍及其联系的文化人大部分是从通常所说的“西线”离港，从香港坐船经长洲岛偷渡到澳门，然后转广州湾或梧州到内地。<sup>②</sup>据八路军据驻港办事处干事潘柱回忆：夏衍当时是利用大中华酒店的关系，帮助联系一部分文化人到酒店集中然后安排疏散工作，他曾问过夏衍自己怎么办，夏衍回答：“我什么时候离开

<sup>①</sup>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上册[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343.

<sup>②</sup> 游海华. 抗战时期香港秘密大营救若干问题续考[J].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1(3).

香港还没定，根据情况再说。”在执行撤离任务时，以夏衍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 （二）寻找并确定人员名单

确定并联络寻找到被营救人员，是整个大营救行动的关键核心一环。

一是确定撤退的共产党员。在营救爱国人士的同时，部分共产党员也须同时撤退，以保存有生力量，为此，在港党组织做了细致的部署安排。首先将党员分为红线、蓝线、灰线三条线：红线是第一线的，先行撤退；蓝线是随时准备撤退的；灰线是准备留下的。例如，负责此项工作的黄施民，负责工人运动，由于工人干部撤退最多，原是准备带工人撤退的，但组织考虑到他的身份还未暴露，决定令他留在香港坚持工作。<sup>①</sup>

二是联络并确定人员名单。联络并寻找到全部滞留港岛人员的重要任务交由留在香港的同志负责。在往惠阳游击区撤退临行前，廖承志把营救对象名单交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干事潘柱，因为潘柱“从小在香港长大，熟悉香港的路”，所以，要他“留下来协助刘少文同志完成营救任务”<sup>②</sup>。此后，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市委职工部负责人黄施民以及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干事刘少文、潘柱等人承担起寻找、联络爱国人士的历史重任。后期主要落实的是潘柱。

联络和寻找人员的具体办法主要是依托前期建立的地下组织关系网，通过各层组织关系逐个联系、寻找。接受任务后，潘柱便找

<sup>①</sup> 黄施民. 我参与抢救文化人的回忆 [M]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 1984：68.

<sup>②</sup> 黄秋耘，夏衍，等. 秘密大营救 [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29-30.

到徐伯昕和张友渔两人，先通过他们已建立的联系，将部分文化人集中起来逐个安排撤离。稍后，潘柱与刘少文取得联系，并在他领导下深入开展工作，同时负责与梁广和东江游击队联系。这期间，潘柱与九龙方面地下党员建立联系，包括何鼎华、李健行等，联络并寻找、集中九龙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例如，千家驹及其夫人，即是潘柱与李健行共同动员撤离的，当中，还克服困难，帮助千家驹夫人进行人工流产方才成功脱险，足见当中的艰险。至刘少文撤离后，潘柱的联系面更广，包括廖承志、刘少文、东江游击队的关系等，加之他原来就是各种机关的联系人，开展联络工作就更便捷也更迅速。

经过多番曲折，最终确定营救人员名单。据不完全统计，最后被营救出来的人员800左右，主要包括：

国民党左派元老何香凝、柳亚子、陈汝棠；救国会的刘清扬；第三党的李伯球；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妇女工作者沈兹九、韩幽桐；香港著名爱国人士邓文田、邓文钊等。文化界人士中有对我国革命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邹韬奋，有理论界的沈志远、张友渔、胡绳、张铁生、张明养、千家驹，有新闻出版界的范长江、金仲华、杨刚、乔冠华、徐伯昕、梁若尘，有文学界的茅盾、夏衍、胡风、周钢鸣、戈宝权、叶以群，电影、戏剧界的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王莹、章泯、宋之的、于伶、许幸之、赵树泰、李枫、蓝马、凤子、蝴蝶，有音乐界的盛家伦，有美术界的郁风、叶浅予、特伟、胡考，有教育界的成庆生、叶方等等。此外，国民党的官员和眷属，如吴铁城、刘璟和余汉谋夫人等，也被营救出来。困留在香港的重要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界人士全部安然脱险。<sup>①</sup>

<sup>①</sup>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 [M]，1984：138.

上述名单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与根本原则，也因此极大地充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巩固和发展了统一战线。被营救人员中包括部分外国人员，东江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先后帮助近百名国际友人脱离虎口。香港沦陷，英国官员、英军官兵和英、印、荷、比等国侨民，除了一些银行和市政人员暂时留用外，全部被扣押入日军集中营，他们之中包括赖特上校、京中校、祁德尊少校、谭臣警察司等军政人员，也有渣甸公司的波吉生、波利斯屈特夫人芬恩维克和摩利逊等外国侨民等。当中一些人从集中营逃出来。因语言不通，对地理环境不熟悉，加之外国人外形特征等原因，十分容易暴露，他们寸步难行。中国共产党本着维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原则，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尽全力营救他们脱险。东江游击队派出何启明、黄作梅、谭干、林展等人专门负责抢救国际友人工作。<sup>①</sup>从集中营出来后，多数人由游击队用船渡过大鹏湾，再转送惠州、韶关，然后前往大后方。

### 三 克服重重困难的营救准备

茅盾在他的《脱险杂记》中细致描绘了当年那段艰辛的“逃亡路”，其中可以窥见大营救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及共产党人历经的艰辛：

“1942年1月9日，茅盾夫妇等人被游击队带到皇后大道东的临时集中点，扮成难民模样，通过日军检查站，在夜幕掩护下登上停

<sup>①</sup>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M]，1984：32.

靠在避风塘的驳船，与邹韬奋等人会合。10日凌晨，他们分乘3艘小艇迅速冲向九龙，并在油麻地佐敦休息。11日和12日，他们经荃湾，到元朗十八乡的适庐歇息一晚，再渡过深圳河。13日，他们一行抵达宝安游击区的游击队临时指挥所驻地白石龙，并见到林平等游击队领导。”<sup>①</sup>

这场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秘密大行动，在策划与实施过程中，都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形势复杂的诸多困难。

一是营救路线上面临着复杂的周边形势，被搜捕的危险，以及各种交通线上的“堵点”等诸多困难。香港沦陷后，当时社会治安十分混乱，特别是在偏僻的山区，常有土匪占山为王，猖獗一时。从香港到白石龙有一百多里路，沿途有日军的封锁线，又有土匪的山头，必须派出足够的警戒人员才能确保安全，而对于当时实际面临困境的游击队而言，进入九龙的武装队伍很少，加大了营救困难。为此，不得不借助有正义感和民族感的“绿林好汉”，而这又需要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些都给营救和护送工作带来很大麻烦。<sup>②</sup>

再如在东线水路，要闯过启德机场日军的牛池湾岗哨，路经日伪和土匪盘踞的西贡村，夜渡有敌军炮艇巡逻和海盗猖獗的大鹏湾；在东线陆路，沿途布满了敌伪检查站，并要翻越土匪出没的大帽山。当时，东江游击队势单力薄，夹在广州和香港两个已经沦陷城市间的狭小地带，没有回旋余地。因此穿过被封锁的深圳河后，只有偷越被日军占领的广九铁路，才能到达目的地惠州。而惠州既是东江地区公署所在地，又是惠阳县政府所在地，虽然有水路发达

<sup>①</sup> 茅盾. 脱险杂记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0.

<sup>②</sup>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 (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 第3辑 [M], 1984: 54.

的优势，却有国民党六十五军一个师的兵力驻守。该师师长张光琼也得到了近期有一批文化人士要从香港经惠阳地区进入内地的情报，便在所有进出惠州的水口、路口加设检查站，还专门设了一个港九难侨登记处，要求每一个从香港过来的人都必须去登记。为了打通这一关口，中共惠阳县委决定在惠州城建立秘密交通站，并把任务交给年仅22岁的县委组织部部长兼青年部部长、武装部部长卢伟如去执行。<sup>①</sup>惠阳县委想了许多办法，后研究决定，由卢伟如以从香港来惠州做买卖的商人身份，从香港贩货作为掩护，把货物囤在东和行（老板李士杰、梁思中、叶子良都是“第三党”人士），并租用东湖旅店房间作为被营救人员住宿点。<sup>②</sup>

二是大营救行动经费匮乏的困难。如前述，游击队当时面临自身发展的极大困难，援助又断绝，那么，在部队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800左右爱国人士沿途不挨饿？有人病倒怎么办？食宿、医疗等问题都需要周密细致地考虑。游击队为了克服困难，做了非常明确细致的分工：由刘少文负责布置组织被营救人员，潘柱、李健行、何鼎华等执行；王作尧负责布置九龙到白石龙沿途的警戒，设法筹款，解决吃饭问题。其中，筹款问题最为急迫且“最伤脑筋”。战乱期间，行商减少，部队的经费主要来源为各税站，收入大大减少。而由于战乱，路线上的梅林坳这个交通要地，不但没了税款收入，还要救济每天路过的成千上万难民，又增加了经费负担。为增加经费来源，王作尧发动同志向附近的商人、地主借粮借款，并把税站收税的地区和范围扩大，同时，让港九地区活动的

<sup>①</sup> 李向峰. 抗日战争中的秘密大营救 [J]. 党的生活（黑龙江），2016（1）.

<sup>②</sup> 卢伟. 一九四二年在惠州护送文化人的经过 [M].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 1984：67.

部队也承担起筹集物资、借粮借款的任务，帮助解决九龙新界地区交通线的食宿供应。但这样也只能勉强维持。为了节约粮食出来给爱国人士们，战士们每天只能吃粥和番薯、野菜，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sup>①</sup>

三是须营救人员自身的困难。这批知名人士，或因在香港逗留时间长，容易暴露身份，或因年老体弱，不适宜跋山涉水，不但要周密安排护送路线，更要考虑护送过程中的细节。

---

<sup>①</sup> 王作尧. 紧急抢救 [M].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 (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 第3辑. 1984: 54.

在中共中央的决策领导下，广东党组织与在港共产党人及东江游击队迅速落实响应，经过前期周密详尽的谋划部署，确定了营救路线方案和人员安排。准备妥当，从1942年1月开始，各方力量竭尽全力，团结奋斗，终克服一切困难，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大行动终取得全面胜利。各条营救线路各方力量合力展开行动的紧张、惊险、机智与细致，共同构成了一幅虽没有硝烟却惊险艰辛的波澜画卷。



## 第一节

### 迂回曲折的东线

“东线”是指往东江游击区方向去的营救线路，主要包括大部分人员转移的经新界、宝安白石龙等地的陆路，以及少部分人转移的经西贡、沙鱼涌等地的水路。

东线颇为曲折，需要翻山越岭，克服重重阻碍，如要经过启德机场日军在牛池湾的岗哨、日伪和土匪盘踞的西贡村，大鹏湾则有日伪炮艇和海盗。到达惠州前关口驻扎有国民党六十五军一个师，师长张光琼得到情报后在惠州的水、陆口加强检查，设立港九难侨登记处进行搜查等。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香港党组织与东江游击队团结奋斗，想尽一切办法，随机应变，保障了护送线路的安全与顺畅。

#### 穿越火线撤离港岛

因日军攻占香港岛后旋即封锁了港岛与九龙的交通，而大批爱国人士由于此前九龙战事时已紧急撤离隐蔽到港岛，这时即被困于港岛，所以，整个大营救行动计划的首要一步，就是将滞留受困于港岛的爱国人士先抢救撤回九龙。

如前述营救方案部署，由刘少文、尹林平分别负责香港和九龙的抢救工作。香港方面，潘柱协助刘少文的工作，何鼎华、李健行在九龙协助尹林平。香港的海上交通联络站设在铜锣湾避风塘，利用香港东利运输公司停泊在那里的两条渔船作掩护建立起来，负责护送经过的被营救人员和物资，保障香港岛与九龙两岸之间的交通线。具体工作由李锦荣按照潘柱、李健行的指示执行。

1942年1月8日早上，按照部署，大营救行动开始。

从港岛出发，在潘柱、李锦荣等人的秘密护送下，邹韬奋、叶以群、戈宝权、茅盾夫妇、胡绳夫妇等文化人先来到香港铜锣湾，登上一艘事先准备好的小艇，再送上两条大驳船。当时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先行撤退，正是在此船上与张文彬会面并初步研究营救方案，船桅上画着东江游击队的海上交通站标志“大眼鸡”。9日凌晨，邹韬奋等一行人开始登上一艘有篷的钓艇，按预先计划渡“海”，并选择红磡附近僻静小码头登陆。依照这样的办法，此后李锦荣等共产党人不断地往返于港九之间，接力把困留在香港的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一批又一批地护送到九龙。

九龙方面，在何鼎华、李健行和何启明等同志的精心组织下，前期设立的秘密交通联络点和护送工作运转顺利。大营救行动正式开始以后，几乎每天都有被营救人员在营救力量的护送下从港岛脱险出来到达九龙。到达联络点后，负责带路的交通联络员谢愚照、赵林、麦容等人给予细心周到的照顾，精心为他们准备了乔装用的衣物等物品，并反复向他们说明路上的注意事项。考虑到一些文化人不习惯长途跋涉，李健行还安排了一些党员工人扮作同行的难民，帮助他们挑运行李。在遇到崎岖山路时，由这些“难友”负责帮助那些体弱的“难友”背负行李或直接背着行走。这些特殊的照

顾，文化界的朋友是未曾想到的。<sup>①</sup>众人都先在九龙秘密联络点住宿，稍作停顿，次日早上6时宵禁解除之后，由游击队的交通员带路，夹杂在疏散返乡的人流中，或是秘密潜往西贡，继续出发前往东江游击区。

## 翻山越岭陆路撤退

大部分人员撤退的线路是往东江游击区方向的“东线”陆路，可谓翻山越岭，虽是较为曲折，但相较更容易隐蔽。

### （一）九龙到白石龙

“东线”的陆路，从九龙出发，先是往荃湾方向去到达白石龙的一段。为了保护文化人士的安全，游击队特别加强了九龙往白石龙这一段的护送力量，活跃在新界的游击队分为四段沿途警戒：九龙市区到荃湾一线，由黄高阳的短枪队负责；荃湾至元朗十八乡一带，由林冲带领一个排负责；元朗大帽山至落马洲一线，由曾鸿文、钟清的短枪队负责；过了深圳河之后，直至白石龙村，则由游击队大队部派警卫班分驻几个点警戒。

在九龙住宿后，10日清晨上述第一批人员，后又集中沈志远、胡风、宋之的和夫人、廖沫沙、张铁生、叶以群等大约四五十人，继续出发。由何鼎华、李健行指派的交通员带队，这些文化人分别从九龙油麻地、旺角几个联络点向西北出发，过荔枝角道、青山道，通过日军设在主要干道的哨岗，到达荃湾一个小庄园的联络点稍事休息。

<sup>①</sup> 杨奇. 惊天壮举：虎穴抢救文化精英与秘密护送民主名流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休息后，经上塘，准备翻过大帽山入锦田，从而到达新界元朗。大帽山作为撤离路线上的必经之地，也是历来匪患严重的地方。山中盘踞着以黄慕容和肖天来两人为首的两股土匪，各有100多人，<sup>①</sup>他们经常在山中活动。为了打通大帽山通道，保护文化人安全顺利越过此山，此前游击队已令长期与土匪打交道，并在当地很有威望的曾鸿文依托个人关系，通过“召开联谊会”“迫虎离山”“先礼后兵”等方式，与肖天来、黄慕容等土匪谈判交涉，打通了这里的交通线。在转移的路上依然遇到土匪武装的零散势力干扰，都被短枪队一一化解。历经周折，这批文化人终抵达元朗十八乡，留宿附近的欧屋村交通站。据戈宝权回忆：“我们幸好得到一个名叫‘曾大哥’的人来迎接。他穿着便装，手里拿着一把系着红绸子的盒子炮，为我们开路。一路上，我们还碰到两个年轻的拦路抢劫的‘烂仔’，被‘曾大哥’缴了械。”<sup>②</sup>

11日早上，队伍继续向路线上的重要据点白石龙进发。经过勒马洲，队伍来到芦苇丛生的深圳河，护送的短枪队原先准备了三艘小艇作为摆渡的工具，但河面不宽，河水很浅，大家干脆涉水而过。过深圳河后，会到达一个敌占区，这也是这条路线上的一个关键难点。依照之前的部署安排，借用日军遣散“难民”的契机，由短枪队安排好一位乡长手持“维持会”的“难民”通行签证，骗过日军的岗哨检查。

通过日军岗哨后，是前往白石龙的最后一段：梅林坳。白石龙村南横亘着梅林坳、圣人大座和唐朗山，连绵四十多里，犹如一道

---

<sup>①</sup> 郑顺宏. 香港“曾大哥”的抗战往事 [EB/OL]. 文史博览. 读览天下, [https://www.dooland.com/magazine/article\\_1063803.html](https://www.dooland.com/magazine/article_1063803.html), 2020.11.19.

<sup>②</sup> 郑顺宏. 香港“曾大哥”的抗战往事 [EB/OL]. 文史博览. 读览天下, [https://www.dooland.com/magazine/article\\_1063803.html](https://www.dooland.com/magazine/article_1063803.html), 2020.11.19.

屏障。山南是敌占区，山坳上设有日军哨所，坳下有一条横贯宝安深圳线的公路，沿路村镇大都驻有日军。队伍要穿过深圳河附近的敌占区到达白石龙，必须翻越梅林坳。在廖沫沙的记忆里，他们这批文化人到达这里时，已经是当天的黄昏时分。虽然要翻越高峻的梅林坳并要面对随时可能遇到的敌人，但是大家听说快到游击队指挥部驻地，就都忍住疲劳，终于翻过了梅林坳。这一路，护送的共产党人始终给予爱国人士细致的陪护，文化人士切实感受到了党领导下的整个行动的用心，切实感受到了安全。

在白石龙，东江游击队领导人曾生、王作尧、梁鸿钧、杨康华、谭天度等早已在此恭候他们的到来，得知他们到达，便立即前往村前迎接。到达后，部分人员被安置在白石龙教堂里，邹韬奋、茅盾等十多位著名记者、作家、理论家则安置住在沙梨园临时指挥部。后来，他们又被重新安置在更隐蔽的，由龙华乡政府副乡长刘鸣周带领村民赶工搭建的，以茅草做屋顶，用松树做梁柱，用竹片做“竹床”，用禾秆编成垫褥的“茅寮”。茅寮里是通铺，没有桌椅，没有多余的活动空间，连吃饭也只能在“茅寮”外面的空地上，很是艰苦，但也非常隐蔽。到达白石龙当晚，游击队领导人为首批文化人安排了欢迎宴会。会上，茅盾、邹韬奋等纷纷感慨一路的艰辛，并表达了对沿路护送的游击队员的感激。

此后几天，凤子带领的演剧队，戏剧家于伶、章泯、许幸之以及刘清扬、张友渔、徐伯昕、黎澍、杨刚、周钢鸣、丁聪、特伟等数十人也陆续安全抵达。如此，白石龙村面临较大的安置压力，其地方本来就小，住宿不够位置，加上白石龙也是抗日游击队指挥部所在地，10公里外即是日军警戒线，过分集中居住在村子里，很有可能暴露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因此，游击队又组织人员在阳台山的蕉窝、深坑、泥坑等处，搭起了一批茅寮作为接待场所，

缓解白石龙村的压力，保障安全。然而，由白石龙村转移到蕉窝、深坑、泥坑等处却成为游击队负责护送的队员的“死任务”，因为这一小段的护送十分危险。例如，深坑是白石龙附近阳台山和宝安龙华圩之间的一个山窝，易守难攻，比较容易隐蔽。为避开国民党军队的耳目，只能在晚上7点天黑之后才进行秘密转移。决定安排转移至深坑安置的文化人大约有20人，包括茅盾、邹韬奋、戈宝权等。这些文化人都来自城里，基本没在晚上走过山路，游击队员给每个人提前发了一根竹棍，让他们借力。邹韬奋因为眼睛不好，走得跌跌撞撞，格外费劲。<sup>①</sup>

白石龙的条件较为艰苦，游击队可谓克服重重困难，尽力给予被营救人员细致周到的照顾。按照前述原定部署，被营救的爱国人士在白石龙只是暂住一段时间，等廖承志与连贯等领导安排组织好后续路线后，再前往惠州、老隆继转韶关前往抗日根据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原定计划有所推迟，后决定分批送走爱国人士，大部分人在白石龙深山茅寮住了较长时间。日军经常在附近“扫荡”，国民党和日伪军也经常在此搜捕。加上外援基本断绝，当时游击队的生活条件本来就非常艰苦，战士们每天伙食供应标准仅有生油五钱、菜金一角。也因此，本就困难的游击区，因突然面临大量人员的吃住安置问题，压力更大了。张文彬回到游击区指挥部不久，就给中共中央南方局发了两封电报，说明“游击区地小粮缺、物价飞涨，又无钱”，并向中央申请设法送大批款（共需百万）到韶梅，“并送十万元到惠阳来”，以使文化人继续转苏北的后续经费有所保障。即使条件如此艰苦，游击队仍想尽办法，宁愿苦了自

---

<sup>①</sup> 北京日报，1942年省港大营救：抢救茅盾夏衍等诸多名人 [EB/OL]. <http://book.sina.com.cn/cul/c/2012-11-20/1441366752.shtml>, 2012.11.10.

己去“勒紧裤腰带”，也坚持为爱国人士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给他们的伙食标准就翻了一番，生油一两、菜金两角。戈宝权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们每天还是可以吃到粗糙的白米饭、干炸小鱼或者虾酱之类的东西，除此，还常把煮好的“番薯泡糖水”（红糖煮的番薯汤），“用水桶挑来送给我们吃”<sup>①</sup>，甚至还提供烧好的热水，给这些爱国人士沐浴。

## （二）白石龙到惠州

### 1. 精心谋划，分批转移

白石龙战略位置特殊，处在日、伪、顽军三方面围困之中，爱国人士不能在此停留太长，否则容易暴露，面临危险。因此，游击队研究之后，决定等惠州方面稍准备停当，便开始从白石龙出发，往惠州方向的下一段转移工作。

依照部署，离开白石龙，会越过广九铁路封锁线，才能到达惠阳。这段路线的沿途护送分工是，尹林平负责在广九铁路以东坪山地区，布置中共惠阳县委、惠阳前线工委等组织迅速建立秘密接待站及安排沿线护送等工作。根据尹林平的部署，整个惠阳县委和惠阳前线工委及各个部队都动员起来，在惠阳前线工委和短枪队队部所在地的田心村，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中心接待站，由短枪队队长高健负责。队伍在这个接待站安置后，又由惠阳短枪队护送到淡水以西的茶园村，经此再转送惠州。在惠州，则由惠阳县委组织部部长兼武装部部长卢伟如以“香港业昌公司”大老板的身份作掩护，进行接待安置工作。

<sup>①</sup> 1942年省港大营救：抢救茅盾夏衍等诸多名人 [EB/OL]. <http://book.sina.com.cn/cul/c/2012-11-20/1441366752.shtml>, 2012.11.20.

从白石龙再行出发前，张文彬和曾生等研究了全部脱险人员的行止问题，并根据人员的不同情况，重点考虑有无容易暴露的危险，对人员的分批撤离最后做出了详细安排，并电告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具体人员撤离安排如下：

#### 东江来电

文化界人士经过东江及留东江工作人名单文彬报恩来：

（一）文化界经过此间的人，及留此工作的人，全部名单如下：第一批（2月半出发）茅盾夫妇、沫沙、以群、胡仲持、胡风夫妇、宋之的夫妇、张友渔夫妇、沙蒙、葛一虹。第二批（2月底出发）黄洛峰、许幸之、张宗祜、姚建伯（均在港业余联谊会工作，交通银行职员）。第三批（所发路费多数只够到老隆，2月20日出发）徐伯昕、胡耐秋、程浩、浩飞、丁洁如、曹吾、杨永祥（生活书店）、吉家甫（新知书店）、卢家儒、特伟、丁聪、李贻、蒋文燕、童常（新安旅行团）、张英、郭毅（均新文字学会）、赵树泰（大观电公司协理）、钟英（不明）。第四批（所发路费勉强可到韶关，2月底出发）舒强、凤子、兰馥心、奚蒙、金万华、王青安、戴浩、虞静子、金湫、林蜚、贺路、沈剑（均剧团）、李殊伦（电影工作者）、黄远志（中国社）、邝远芳（桂新华分馆）、黄宝珣（韬公亲戚）。第五批（路费均发到桂林，2月23日出发）杨刚、吴在东戈茅（芳）夫妇、考、肖敏颂、曹国智、叶籁士、袁水拍、刘清扬、段国秀、高汾、戴英朗（苏北来）、胡廷钰（以上到桂林）。恽逸群毛奚夫妇（以上至沪）。

（二）剧团早已出发，章泯意见想先赶沪，理由是在港时决定今后放弃剧团工作，俟准备工作相当完成，就即去苏北，因苏北比延安更需要人去，在苏北工作相当时期后再转延安，如何望即复。

(三) 韬奋对前定办法, 详加考虑后托询往内地是否已无可能, 是否可以往桂暂避再看形势, 如已不可能如原议转往延安, 家属可否设法由渝转延, 如可则孩子暂不入校, 在桂或渝候去延, 望即复。

(四) 萧敏颂、曹国智去桂, 可由文化供应社宋玉彬(由丁操震掩护到)(此数不明)。(五) 胡绳、吴全衡、于令夫妇拟经桂直接去沪。不清楚时望速电告。

1942年1月<sup>①</sup>

依据上述安排, 第一批离开白石龙的有茅盾、孔德沚夫妇、胡风、胡仲持、叶以群、廖沫沙等十多人, 邹韬奋也想跟他们一起走, 但考虑到国民党顽固派对他十分仇视, 且通令各地特务机关加紧侦察他的行踪, “一经发现, 就地惩办”, 为此, 连贯在征求其同意后, 派专人护送他夫人和儿女到桂林郊外隐居, 而他本人则到梅县山区的江头村暂住, 待有机会再转移到大后方。

茅盾一行由郑伟灵带领的独立小队护送, 从白石龙出发绕过布吉的敌伪据点, 跨过广九铁路, 穿越横(岗)龙(岗)公路, 抵达惠阳碧岭村(现属深圳龙岗区), 稍事休息后继续前行, 之后抵达田心村, 高健队长负责接待他们。原计划分批接续护送文化人士到惠州, 由于局势的变化, 日军为了掠夺物资, 已占领了惠州和博罗县城, 所以茅盾一行到达惠宝边境后, 只好滞留在田心一带隐蔽。稍后到达田心村的还有沈志远、戈宝权、张友渔、韩幽桐夫妇等人。

春节前后, 占领惠州、博罗的日军撤走了, 游击队立即组织文

<sup>①</sup> 张文彬. 1942年1月张文彬致党中央的两份电报. 深圳文史(第六辑)[EB/OL]. 政协深圳委员会网站, [http://www1.szzx.gov.cn/content/2013-04/24/content\\_8987040.htm](http://www1.szzx.gov.cn/content/2013-04/24/content_8987040.htm), 2013.04.24.

化界人士再次途经惠州，向后方转移。

## 2. 惠州的隐蔽和疏散

惠州方面，在人员从白石龙出发前，就积极认真做好部署准备。为了做好在惠州方面接待文化界人士的工作，如前述，游击队指派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以“香港业昌公司”的总经理“罗老板”身份作掩护，和惠阳县梁化区委书记陈永一起乔装成香港大商行的“少东家”，在惠州建立秘密联络站，以便接应即将到来的文化人。卢伟如和陈永遵照指示，在惠州经过多番考察，最后决定包租下当时城里最豪华的东湖旅店二楼作为接应点。在他们的楼上，即住着一八七师师长张光琼。卢伟如后来回忆，他们把联络站设在东湖旅店，是经过一番观察和了解的结果，他们发现张光琼性喜女色，把这里搞成了一个“安乐窝”，但又怕被人知道，于是天天布置人在门口站岗，这样一来，城里的特务、暗探反而从来不敢进来搜查。这也为接应文化人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

“对于党的地下工作来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sup>①</sup>

此前先期撤退到惠州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察看了卢伟如的准备情况，提前做了几点安排：文化人到达惠州后可以和卢伟如等人一起住在东湖旅店。但是茅盾这样的著名人士要在东和行隐蔽起来，以免被人发现。卢伟如的香港业昌公司只是一个招牌，一旦有人去香港查证，便会迅速暴露。因此，廖承志指示曾经在香港开设过东利运输公司的廖安祥留在惠州同时开办一个新商行“源吉行”，对外以商行大东家“罗老板”身份为掩护。在第一批人员到达惠州前，廖安祥也已依照廖承志的指示到达并开办源吉行，秘

<sup>①</sup> 1942年省港大营救：抢救茅盾夏衍等诸多名人 [EB/OL]. <http://book.sina.com.cn/cul/c/2012-11-20/1441366752.shtml>, 2012.11.20.

密协助卢伟如等开展工作。对于东湖旅店同时住着张光琼的危险问题，连贯指示要求大家说话、行动都要小心，不要引起他人的怀疑，为了安全起见，廖承志还定下两条纪律：一、不许上街；二、把笔记本收起来统一保管。

1942年除夕晚，茅盾、廖沫沙、韩幽桐、胡风、张友渔等20多名文化人士终被秘密接到惠州，他们都打扮成从香港逃难来的有钱人，安置在东湖旅店和东和行。第二天大年初一，茅盾夫妇为了感谢营救人员，还亲自下厨为大家烹饪了他们家乡浙江口味的“风味鸡”，几十名文化名人及部分参与营救的人士，就这样吃上了团圆饭。

在惠州安置后，每次多则几十人，少则几个人，“罗老板”接续从惠州送走了上百名“熟人”。张光琼万万没有想到，当他们在东湖旅店顶楼宴饮作乐的时候，卢伟如、廖安祥等人以接济避难亲友等名义，已经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批批文化名人的陆续转移工作。

### （三）惠州到老隆

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后东特委）此前在龙川县老隆镇做了大量前期的部署准备。老隆水陆交通方便，可达河源、惠州、东莞、广州等地，陆路有汽车能抵广州、韶关、梅州等地，是广东东北部的交通枢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龙川地区抗日民众组织十分活跃，后东特委机关就设在老隆。另外，龙川县作为中央苏区县之一，具有深厚的革命生长土壤和浓郁的人文情怀，革命组织力量发展较为坚实，得以为大营救提供力量保障。由于老隆交通便利、群众基础好等有利条件，经过研究，组织决定将老隆作为惠州再往后方转移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

1942年1月下旬，后东特委接到了廖承志传达的党中央的指

示，便在连贯的主持下建立营救中转站。在整个营救过程中，后东特委积极组织龙川人民，为从香港撤离回来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做好掩护工作。自1942年春节直至同年9月，前后历时半年时间，后东特委及龙川党组织顺利在国民党中央特务的勘察搜捕下，在老隆到韶关路线上设置了4个交通站，将香港爱国人士毫发无损地护送到韶关或梅州等地，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的任务。

在老隆的安置点则设在面江而建的福建会馆、“义孚行”和“侨兴行”。如前述，这些商行是前期党组织通过统战工作的开展，先期打通关系建立起来的营救行动沿途的接待据点。特别是“侨兴行”，不仅在粤、桂、湘等省均设有办事处或商号，还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为营救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而福建会馆则是连贯坐镇指挥秘密营救的指挥所。

原定计划是被营救人员每到一地，应尽快设法送走，然而茅盾等人到达惠州的当天恰逢年节大年三十，接连几天都没有车船开出，只好等到春节后再走。至正月初三，他们才再从惠州出发，前往东北方向的老隆。

惠州至老隆这一段，将近200公里路程，主要走东江水路。茅盾一行人出发时，冬季逆流而上，恰逢东江的枯水期，所以耗时比较长，直到1942年元宵（3月1日），接续几批约300余人，穿过重重封锁线，终抵达老隆。他们准备在此稍作停留后，再分别以难民身份乘坐“侨兴行”的汽车前往韶关。

#### （四）经韶关转移到大后方

##### 1. 大部人员的分头转移

经过老隆后，大多数人员安排经韶关，再行乘火车经衡阳往桂林。于是，韶关成为粤北的重要中转点。韶关以韶关“侨兴行”为

联络接待点。该行也是大约在一年前，通过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为了游击队筹集资金和物资而设立的，经理是陈炳传（又名陈启昌），董事长是温康兰，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温康兰早年在德国读书时，就认识乔冠华。主持日常业务的邱克辉则是一个民主人士，也是靠近共产党的。

途经韶关转移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据不完全统计，已知的人员名单有：邹韬奋、胡绳夫妇、茅盾夫妇、廖沫沙、柳亚子父女、何香凝、经普椿（廖承志夫人）、舒强、凤子、虞静子夫妇、黎澍、胡耐秋、宋之的夫妇、恽逸群、盛家伦、徐伯昕、丁聪、黄宝珣、叶以群、胡仲持、张友渔夫妇、沈志远夫妇、戈宝权、黄文俞兄弟、刘清扬、胡风夫妇、高士其、萧敏颂夫妇、许幸之、葛一虹、沙蒙、于伶夫妇等。这些被营救人士，以及这场大营救的实施，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在韶关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 2. 特别安排

由于安全考虑及形势变化，少数人员从老隆出发，经兴宁、梅县、大埔等地转移至闽西，有的暂时隐蔽，后续再行辗转至苏北抗日根据地。这充分体现出了各地党组织随机应变的处置能力，以及前期各地的积极响应准备，对大营救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充实后续保障。

### 1) 邹韬奋的脱险<sup>①</sup>

1942年4月，在地下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邹韬奋化名李尚清，以香港某商行股东的身份，从香港撤到老隆，在老隆秘密联络站“义孚行”住下，准备继续转移。因邹韬奋敢于抨击国民

<sup>①</sup> 资料来源：本部分由中共韶关市委党史研究室刘溶、黄乐整理。

党反动派的黑暗，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其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知道邹韬奋从香港回到了内地，密令各地特务机关，严密侦察其行踪，沿途各关卡都设防搜捕。面对新的险情，中共中央、南方局迅速决定改变原定将邹韬奋从韶关转送到桂林与他的妻子儿女团聚的计划，就近安排他到梅县江头村中共党员、韶关“侨兴行”经理陈炳传家中隐蔽一段时间，待风声过后再伺机转移。

邹韬奋在梅县江头村隐蔽了近半年，至1942年9月间才行撤退。邹韬奋到达梅县后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沿途没能查出邹韬奋的行踪，专门指派认识邹韬奋的特务头子刘百闵（刘麻子）前来广东坐镇指挥，特别对兴宁、梅县一带加强了侦察，扬言务必将邹韬奋捕获，国民党当局韶关的报纸“时人行踪”栏也登了搜捕通告。情况非常危险，邹韬奋不能在梅县继续隐蔽下去，党组织指示尽快将邹韬奋送出梅县，经上海转移到苏北新四军军部。再则，广东党组织在1942年5月后面临较大危险和困难，5月间发生“粤北省委事件”，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相继在韶关被捕，中共南方工委书记张文彬也在大埔县不幸被捕，负责老隆联络站的连贯奉命撤回东江游击队。秘密大营救行动受到极大影响，但是剩余少数文化界人士的转移营救工作仍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结合这些情况，党组织指示老隆、韶关一线的护送转移任务交由乔冠华负责。而乔冠华则指派胡一声具体负责邹韬奋的转移，原生活书店（邹韬奋主办的书店）的干部冯舒之参加护送。

胡一声接受任务后，和冯舒之立即从韶关赶回梅县，把党的决定和有关情况当面告诉邹韬奋。邹韬奋表示：“我没有什么意见，坚决服从党的安排。”随后，胡一声、冯舒之找来老隆联络站另外两个护送人员郑展、陈炳传一起商讨护送路线。胡一声等人考虑邹

邹韬奋体质虚弱，平时又不习惯步行，决定从畚坑西行，经由龙川、连平到达韶关，由韶关乘火车到衡阳和株洲之间的淞口，然后改乘轮船前往武汉，再沿长江东去上海。这条路虽然沿途国民党和日伪军的关卡很多，要经过多次检查，风险较大，但有舟车代步，交通方便，时间可以快些，只要组织得好，完全是可以安全到达的。并商定邹韬奋还是化名李尚清，并趁着当时有病在身，扮成患病要回上海休养的香港商人，冯舒之充当陪伴邹韬奋的伙计，郑展装作与邹韬奋萍水相逢的同路人，在旁边暗中保护。9月25日，刚过了中秋节，邹韬奋在胡一声、郑展、冯舒之的护送下，先在梅江乘小船到兴宁，再改乘“侨兴行”的“香港汽车材料行”货车往韶关。经韶关去往湖南淞口，乘坐火车，为保证安全，精准计算时间以便接应。邹韬奋经淞口，到长沙，往武汉，到上海，最终于12月底被安全护送到了苏北解放区。邹韬奋是最后一个被营救转移的文化界人士。

## 2) 胡绳参与协助及成功脱险

被营救的人员当中，有不少同时参与了大营救行动的实施，例如胡绳。1942年3月中旬，第一批的胡绳夫妇与茅盾、邹韬奋、于伶夫妇、戈宝权、盛家伦等人从香港安全撤离到老隆，再辗转到达韶关。而当时广东省委机关就在韶关。1938年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省委北迁韶关。1940年7月省委机关辗转迁到始兴红围，省委书记张文彬也随同机关迁到红围。考虑到革命需要，南委副书记张文彬挽留胡绳和黎澍在东江游击队司令部工作，协助东江游击队开展对国民党地方部队的统战和宣传工作，帮助东江游击队摆脱两面受敌的不利地位。胡绳夫妇和黎澍同意，并暂时留在了游击区，参与到了抗战工作以及大营救工作中。

## 第二节

# 惊涛骇浪的西线

“西线”营救线路是指西行经澳门，再转移至大后方的营救线路。这条线路主要为水路，经台山、江门，沿西江北上，最后到达桂林，或是经广州湾、钦州北上，到达桂林。

### 隐蔽渡行撤至澳门

考虑到安全问题，党中央决定将部分较为著名的，在香港时间较长，社会接触面较广的知名人士，经澳门走水路撤退。

#### （一）范长江一行首批撤离

第一批从西线撤离香港岛的，是范长江、陆浮、沈谱、梁漱溟、陈此生一行。

范长江在《华商报》停刊（1941年12月12日）后，一直和助手陆浮忙于报社职工等人员的善后安排，并协助抢救文化人脱险工作，然后才安排自己的妻子沈谱。沈谱是沈钧儒之女，当时仓促住进贫民区一名“关系户”的家中，不敢暴露身份，被当成是寄人篱下的难民，后来沈、范两人化了装，在贫民区一家小茶楼中重逢。

本来已有船票可以先行撤退，为了已经暴露需要迅速撤离的邹韬奋的安全，沈、范二人让邹韬奋先走，自己滞留了下来。<sup>①</sup>

1942年1月9日，机会终于来了。范长江知道第二天“有一条直放澳门的舢板船”，遂与梁漱溟、陆浮商定，抓住这个机会撤离。梁漱溟是周恩来要求重点营救的对象之一，也是日本特务黑名单上的重点抓捕人物，需要谨慎安排。梁漱溟原想经西江走桂林的，此时得知相熟的范长江夫妇、陆浮同他一起走，便同意一道撤离。<sup>②</sup>于是，范长江等人在“街渡”小帆船预订了5个人的位子，预付了船费每人港币60元，并约定见面地点，提醒大家要改换装束，少带行李。<sup>③</sup>

1月10日拂晓，范长江、沈谱在护送党员的带领下，走了两小时弯弯曲曲的道路，来到香港仔，隐藏在码头附近。梁漱溟等人也乔装成工人或小商贩，自携小件行李，随着引路人，由中环步行到香港仔。一行五人准备秘密“偷渡”澳门。他们所乘的小船，宽约一丈，长约三丈二尺，有三挂帆，船行全赖风帆之力。小船由香港仔驶出，那一天早晚有风，但不十分顺风，遇到风不顺，或无风时，船便不动，很是艰难。途中又时遇有敌机盘旋而过，又偶见有敌艇驶来，幸亏算是平安，于夜晚约10时，终登陆澳门。<sup>④</sup>

---

① 可之. 人生有真爱快乐在贞一：访沈钧儒之女沈谱 [M] //侯介夫，党德信. 大陆生活纪实.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225.

② 李慧. 1942香港大抢救：部分文化爱国人士踪迹寻找始末 [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4）.

③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梁漱溟全集：第6卷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330.

④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梁漱溟全集：第6卷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331.

## （二）夏衍带队撤离

作为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5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夏衍，也是联系和组织香港文化人从西线撤离的主要负责人。撤退过程中，他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为大营救行动做出重要贡献。

由于时间有所拖延，形势变化迅速，原定向北经东江游击队根据地转向大后方的撤退路线，即“东线”，已经变得不安全。征得廖承志同意，夏衍决定向西走水路，先偷渡伶仃洋到澳门，再从澳门转移去桂林。

### 1. 联络并确定具体人员及日期

路线定下来，夏衍便让郁风秘密地通知了有关爱国人士。然后，便是确定出发时间。关于夏衍一行出发的日期和人数，当事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郁风的说法是，“日军侵略香港的一个半月以后”，他被通知和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等十六人一路，乘渔船经澳门出发。<sup>①</sup>日军侵略香港的战争爆发于1941年12月8日，一个半月后，即是1942年1月下旬；郁风提到的一行人数是16人，具体是：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金仲华、金山、王莹、谢和赓、郑安娜、郁风等。

司徒慧敏的说法是，“蔡楚生的夫人陈曼云（党内的同志）来通知我，要我带夏衍、金仲华、金山、王莹等十六位同志于一月五日（一九四二年）离开香港”，“我们十六人是分批走的，最早走的有我、夏衍、金山、王莹、郁风、谢和赓、金仲华和张云乔。我

<sup>①</sup> 郁风. 他能使人快乐 [M] //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第3辑 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 惠州：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1984：138.

们在长洲停了一天，第二天凌晨坐船去澳门”。<sup>①</sup>

夏衍的说法是：1942年1月8日，“约好了七点钟在西环的一个最冷僻的码头集合……二十一个人和三四十件行李”。<sup>②</sup>夏衍提到的一行人数是21人，具体人名则没有说。夏衍在另一篇回忆录中（《香港沦陷前后》），说是1942年1月9日黎明离开香港的。<sup>③</sup>

张云乔的说法是：“1941年12月28日”，他依时到达干诺道大中华旅店。“次日（29日）黎明”，“我和夏公两人，带着小包袱，跟随着联系人，沿着骑楼下的人行道，直奔西环皇后大道西”。<sup>④</sup>张云乔提到的一行没有说人数，具体人员有夏衍、张云乔、金山、王莹、司徒慧敏、谢和赓、金仲华、邬帼英、黄启汉的夫人、尹真等，其中有广西方面的人，表明这一行被营救的人员，除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外，还有国民党方面的人员。

以上4个当事人的说法中，夏衍的说法应更接近事实，因距事件发生时间近，记述详细。夏衍的《香港沦陷前后》发表于1942年2月11—12日重庆《新华日报》，《走险记》发表于1942年3月《野草》第6期。而郁风、司徒慧敏、张云乔的回忆录都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和2000年，难免有误差。但夏衍的说法也有一天的差别（《走险记》作1月8日，《香港沦陷前后》作1月9日）。夏衍

① 司徒慧敏. 一九四二年从香港撤出的经过 [M] //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 第3辑 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 惠州：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1984：141-142.

② 夏衍. 走险记 [M] // 桂林分会. 二十九人自选集. 中华文艺界协会，1946：338.

③ 夏衍. 香港沦陷前后 [M] // 袁鹰，姜德明. 夏衍全集：文学. 上.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224.

④ 张云乔. 旧梦拾零 [M]. 中国烟草博物馆，2004：82.

还提到“和前后到澳门两批朋友会合”，应是早于他并于1月10日到达澳门的范长江等5人，即夏衍一行应迟于1月10日前到达。夏衍说“在澳门，我们耽搁了10天……20日傍晚再踏上征途（往都斛）”。<sup>①</sup>从回忆录中提到的20日往前倒推10天，即是1月11日，在范长江一行到达澳门的第二日。由于夏衍一行途中在长洲岛过了一夜，因此可以推出，他们离开香港的日期应是1月10日。夏衍所记的1月8日或9日，司徒慧敏所记的1月5日，张云乔所记的12月29日，可能是将离开原住地前往集中的日期误记为离港日期。郁风所记的1月下旬，可能是将离开澳门的日期误记为离港日期。此外，《谢和赓传》则记载他们是1942年1月29日离开香港西环的，<sup>②</sup>书中有关此行人数则引用了夏衍的说法是“二十一个人和三四十件行李”，而日期则作“1月29日”，很可能是1月9日的误写。

## 2. 峰回路转的撤离历程

1942年1月10日清晨，夏衍、金山、司徒慧敏、蔡楚生、王莹、郁风、金仲华、张云乔、谢和赓、郑安娜、邬帼英等，以及国民党广西等方面的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中校黄启汉的夫人、广西日报社长黎蒙的夫人尹真），一行共21人，在西环的码头香港仔集合。<sup>③</sup>夏衍留着两撇胡子，乔装成一个港澳地带的小商贩，起了化名，叫“黄坤”。由于事先准备好的船只被日军截去，他们只好挤上了一条长不满三丈、阔不满三尺的小船。

① 夏衍. 走险记 [M] // 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编. 二十九人自选集. 中华文艺界协会, 广西远方书店 (刊印). 1946, 338.

② 姚蓝, 邓群. 谢和赓传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8: 156.

③ 夏衍. 香港沦陷前后 [J]. 反侵略通讯周刊, 1942 (27). 又见: 夏衍. 走险记 [M] // 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编. 二十九人自选集. 中华文艺界协会, 广西远方书店 (刊印). 1946, 338.

从港岛出发，要经过周公岛，是此行的第一关，这里有日本巡逻站的盘查。夏衍机智沉着地应对，用日语与日本人交涉，加之事先的乔装，躲过了日军的搜捕。<sup>①</sup>行经一日至下午时分，夏衍一行终于到达长洲岛，停泊长洲岛港湾，没有上岸，在船上坐宿了一夜。

长洲岛位于香港西南，当时约有2万人，多为渔民。从1936年起，这里就有了中共地下党的活动。香港沦陷时，英国势力撤回香港岛，日军也无暇顾及长洲。岛上富商刘汉池组织自卫队，中共地下党派黄文章等几十人参加，使自卫队实际上被中国共产党控制。<sup>②</sup>

夏衍所带队伍在长洲岛过了一夜，次日5时再出发。船过内伶仃洋，顺利抵达澳门（1月11日）。船停泊在内港海边的石岸码头，夏衍、司徒慧敏、张云乔等上岸，到板樟堂街附近找到了前述秘密据点：柯麟开办的镜湖医院。<sup>③</sup>

### （三）华嘉、萨空了、端木蕻良等人的撤离

华嘉是《华商报》记者，他在《香港之战》和《香港脱险记》中回忆说是1942年1月11日偷渡澳门的。他在离开香港前，从胡仲持等人那里打听到，香港的党组织已同东江游击队接上头，正在筹划分期分批地抢救文化人离港。他们也即开始做好撤离的准备。他又到大中华酒店联系上蔡冷枫，策划经澳门走岐关路到石岐，经江

① 夏衍. 走险记 [M] // 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编. 二十九人自选集. 中华文艺界协会, 广西远方书店 (刊印). 1946: 338.

② 张子燮. 李少石、廖梦醒长洲脱险的经过 [M] //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 第3辑 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 惠州: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1984: 113.

③ 张云乔. 旧梦拾零 [M]. 中国烟草博物馆, 2004: 86.

门返回内地。<sup>①</sup>

1月11日，华嘉与谢加因（《光明报》记者）等人离开香港岛。他们经西营盘到西环尾，转到码头，坐船到了长洲岛。华嘉等人到长洲岛后，住在一家鱼栏的货栈里，招待他们的是长洲岛治安维持会一位委员的儿子，而维持会所属的自卫队，有地下党组织。华嘉等人在货栈里等了3天，打听到日本人有可能禁止港内渔船出海，或者还会限制香港难民来到长洲，遂赶紧坐一艘三桅渔船撤离港岛。途中也惊险地躲过日本人的检查，<sup>②</sup>在路环等了约一个小时，然后乘第一班小火轮到达澳门。

萨空了则在送走梁漱溟等人后，因担忧妻儿走“东线”撤退艰难支，留下他们又恐难以维持生计，便也决定走澳门回内地。<sup>③</sup>萨空了历经艰辛买到了“宜阳丸”号的4张船票，于1月25日早上到永安码头，全家5口人乘船离开港岛奔赴澳门。<sup>④</sup>

另外，著名作家萧红因病重难于离港。战事吃紧，端木蕻良和骆宾基送萧红入医院，但未能挽回其生命，萧红在1942年1月22日病卒。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在安葬萧红后，于1942年1月底，在王福时等人的帮助下，离开港岛，前赴澳门。<sup>⑤</sup>

#### （四）李少石、廖梦醒的撤离

李少石是南方局派驻香港的工作人员，为了打通营救文化人的

① 华嘉. 香港脱险记 [M] //何小林, 郭际. 胜利大营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9: 322.

② 华嘉. 香港脱险记 [M] //何小林, 郭际. 胜利大营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9: 326.

③ 萨法. 萨空了 [M].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7: 104.

④ 萨空了. 香港沦陷日记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200-201.

⑤ 任丽群. 萧红传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20: 279.

西线通道，香港党组织提前派遣李少石到澳门，与澳门的地下党负责人柯麟医生取得了联系，后又回到香港，继续进行营救工作。李少石的妻子廖梦醒，是何香凝的女儿，当时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日军占领香港启德机场之前6小时，宋庆龄乘最后一班航机飞往重庆，而廖梦醒则留下来处理善后工作。香港沦陷后，他们一直在港岛隐蔽下来。

1942年2月底，潘柱把李廖夫妇带到长洲岛，要中共地下党员陈亮明把他们安全地送往澳门。由于当时日军刚刚封锁了长洲岛附近海面，又不顺风，他们只好在长洲暂时住下。在地下党控制的长洲岛自卫队的掩护下，陈亮明将他们安置在一个香烛厂的老板家里，18天后，等到顺潮顺风的机会，才由陈亮明兄弟二人护送，乘坐地下党组织派出的渔民（梁惠章的兄长）的小船，送到澳门去。<sup>①</sup>他们很快就与澳门镜湖医院地下党员柯麟医生取得联系。

在澳门，廖梦醒不幸害了一场大病，直至5月间，才与女儿李涓，连同叶挺将军的夫人李秀文一起，在梅文鼎陪同下，化装成商人家属，坐船到台山城，辗转抵达重庆。李少石则留在澳门，奔走于港澳两地，继续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sup>②</sup>

## 从澳门多线疏散转移大后方

此时的澳门，虽然政权属于葡萄牙，葡萄牙是中立国，日本军队没有占领澳门，但实际已经全在日军控制之下，由澳门出发往

<sup>①</sup> 张子燮. 李少石、廖梦醒长洲脱险的经过 [M] //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 第3辑 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 惠州：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1984：113-114.

<sup>②</sup> 杨奇. 惊天壮举：虎穴抢救文化精英与秘密护送民主名流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65.

广州湾（今湛江）的大船已被日军封锁，直接去广州湾的计划无法落实。从澳门回内地主要有两条路：一条路线是走海路，坐船到台山、赤溪等地再回内地，但日军已控制了大船，只有渔船或用风帆的小货船往来，而且海上多盗匪，危险重重。另一条则是陆路北行，经石岐到内地，但出发前要在澳门缴交相片、办理手续，领取通行证、良民证等，石岐等地沿路要经过日军的多处检查才能通过。由于澳门生活用品缺乏，也同香港一样，实行疏散居民的政策，除了商贩来往，每天都有不少香港和澳门的难民，从这里回到沦陷区去，从这里走，虽危险，但也有所掩护。因此，从澳门通往石岐的岐关路，开辟成了主要的营救交通线。

### （一）经三灶岛，沿西江水路北行的脱险

由澳门撤退时的其中一条路，即是沿西江水路北行，雇走私小艇到北水，再转台山的都斛，上岸后进台山县城转陆路。这条路比较快捷，但情况更复杂，离开澳门时，要偷越日军在海上的外围防线；经过三灶岛，又有日军驻守的船坞码头；在南北水，各种势力交错，有汪精卫的“南支那海军陆战队”，有活跃于港澳—台山等地的走私团伙，还有各种派别的海匪、强盗、散兵游勇，专营打家劫船的“捞家”等。即使困难重重，但在党组织的前期坚实准备、精心谋划基础上，沿途的实时应变，仍然得以保证爱国人士成功脱险。

#### 1. 范长江、梁漱溟一行的撤离

范长江、梁漱溟等人首先到达澳门，入住旅馆。随后，范长江经金仲华引荐，联系上了镜湖医院的柯麟，<sup>①</sup>并与澳门的地下党

<sup>①</sup> 范苏苏，王大龙. 范长江与青记 [M]. 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8：652-653.

组织接上头。柯麟大夫热情接待了范长江夫妇等人。<sup>①</sup>范长江、梁漱溟等人因旅馆耳目太多，且不好久居，得到定居澳门的朋友冯祝万的帮忙，移居到一间空房内居住。这时澳门社会已出现战时恐慌，粮食来源不足，米、盐、油、糖皆由政府公卖，无居民证不能买，范长江等人只能靠冯祝万送来食物。<sup>②</sup>冯祝万是广东鹤山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9年策动各派别联合反蒋，并营救遭蒋介石囚禁于南京汤山的李济深，1931年任广州国民政府上将参谋团主任，1932年任行政院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1936年两广事变后迁居澳门。1938年参与成立复兴俱乐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8年，冯祝万同李济深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冯祝万作为国民党内的民主人士，参与了大营救行动，显示了拯救民族危亡和重视文化及文化人的民族感情和文化自觉。

在路线选择上，范长江、梁漱溟等人都不愿缴相片办手续和接受沿路检查，经与当地党组织商量之后，决定走水路，从澳门乘小船过海到台山县的都斛，转台城后走陆路去内地。<sup>③</sup>

确定了路线后，范长江等人通过柯麟的关系，找到三灶岛的抗日海盗吴发仔<sup>④</sup>。吴发仔原是中山县第七区（三灶区）社训队副队长，曾在1938年4月11日率34人夜袭定家湾村，一举杀死10多名日

① 方蒙. 范长江传 [M]. 北京: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9: 300.

②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梁漱溟全集: 第6卷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331-332.

③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梁漱溟全集: 第6卷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331-332. 又见: 马勇. 中国圣雄 梁漱溟传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 266.

④ 范长江在自述中作“武发仔”，应为“吴发仔”。

军，震动中山及广东各地。<sup>①</sup>这时吴发仔控制了三灶岛、横琴岛、大小榄一带，这里常有走私船从澳门去台山，可以闯过日军的封锁线。走私船运送的是内地所需货物，如汽油、棉纱等，从澳门包运到都斛，由吴发仔收护运费。澳门距台山县都斛镇东濠口仅48海里，但这一水路的走私生意，每个月只有阴历二十五至初五的10天内能运作，因这10天里没有月光，在漆黑的夜间才能避免被日军发现。范长江等人于吴发仔约好，搭乘他运棉纱的船偷渡到都斛。这种船由4个水手划船，1人撑舵。由于船很小，宽不及1人身长，每条船只能搭1名偷渡客，坐在棉纱中间。<sup>②</sup>

范长江等人事先准备好了假的身份证和伪县长介绍信。1月17日下午，吴发仔派人引范长江、梁漱溟等人乘渡船到路环，晚饭后大家下船。这天是阴历十二月初一，没有月亮，范长江一行5人偷偷地乘小船驶向大海。<sup>③</sup>出海不久，遭遇大风浪，遂在途中的石头小岛暂避。海浪平稳下来后，继续行进。又突然遭遇缉私船，躲避已来不及，范长江掏出化名身份证，居然转危为安。范长江一行化险为夷，终于到达台山县都斛镇的东濠口会合。<sup>④</sup>

范长江等一行人是分批分船出发的，而陆浮搭乘的船迟迟不到，大家为他悬心不已。<sup>⑤</sup>在镇上遇到棉纱货主，了解到其他船只

---

① 何志毅. 精彩作家文丛：第2辑. 珠海风物 [M]. 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5：170.

②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梁漱溟全集：第6卷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332-334.

③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梁漱溟全集：第6卷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333.

④ 方蒙. 范长江传 [M]. 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301.

⑤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梁漱溟全集：第6卷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334. 又见：马勇. 中国圣雄 梁漱溟传 [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267-268.

包括陆浮搭乘的船都被劫。范长江、梁漱溟等人函托吴发仔，请求设法营救陆浮。陆浮搭的船被赤溪的海盗扣去，勒令旅客每人交港币1000元保护费才可放人。陆浮会不少当地方言，又熟悉江湖人物心理，沉着应对，终于与范长江等会合。

范长江、梁漱溟等人在都斛住宿一夜，次日坐警察所代雇的单车和轿子赴台县城。<sup>①</sup> 1月20日，梁漱溟一行在台县城受到热烈欢迎。县长陈灿章是梁漱溟的朋友刘裁甫的学生，县政府粮政科长陈炳贤等是梁漱溟在广州一中的学生的同学。当地的新闻记者和县党部书记长等人都来看望梁，并将梁报道为文化界从香港脱险到内地最早的一人。21日，梁漱溟发电报给重庆国民参政会，电文是：“重庆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蒋、张、左暨王秘书长钧鉴：顷已从香港脱险返国，请代披露报端，告慰各方知好。梁漱溟叩。”

21日下午，范长江、梁漱溟一行5人出发赴三埠。三埠属开平县，因有三个埠头——长沙、荻海、新昌而得名，此时是广东第一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驻地。专员李磊夫是梁漱溟的朋友，他和一些军政长官、银行经理等宴请梁漱溟等，并派兵护送他们去肇庆。此后，他们途经开平、田村、新桥、肇庆、梧州、桂平、贵县、宾阳、柳州等地，于2月5日成功脱险到达桂林。<sup>②</sup>

## 2. 夏衍一行的脱险

如前述，1月11日，夏衍一行抵达澳门。

<sup>①</sup>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梁漱溟全集：第6卷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334-335. 又见：范苏苏，王大龙. 范长江与青记 [M]. 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8：652-653.

<sup>②</sup>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 梁漱溟全集：第6卷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335-340. 又见：马勇. 中国圣雄 梁漱溟传 [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268-270.

夏衍和张云乔一同上岸，联系上柯麟。柯麟亲自到海边，安排大家到东亚旅社住下。柯麟告诫各人员要注意隐蔽，减少走动，注意安全。柯麟通过秘密电台，向重庆的周恩来报告了夏衍一行到达澳门的人员名单和情况，同时转达了周恩来对大家脱险的慰问，并要早日回到桂林或重庆的嘱咐。<sup>①</sup>

夏衍一行从澳门往后方的撤离，经过再三权衡后，也决定走都斛水路。为此，他们花了约一星期的时间去打探路线、联络交涉“捞家”等。这一批人中，司徒慧敏是开平县人，而经营澳门—南北水—都斛一线走私扒艇的“捞家”（海盗）是台山帮。台山与开平同属四邑方言区，司徒慧敏即借托同乡之谊，打通关系，与在南北水一带颇有势力的“捞家”谈妥，雇到2条快艇，每艇可坐20人以上。为筹措准备经费，张云乔设法通过购买纯金，分批兑换成小面额现金的办法，准备好小额钞票，便于流通使用。<sup>②</sup>

准备妥当，择定1月19日下午5时到海边码头下艇出发。<sup>③</sup>是日，夏衍等人按约定时间上船。夏衍和张云乔所坐的那条船上了20人，其中共产党方面的10人（包括司徒慧敏、蔡楚生、郁风、王莹、郑安娜等），民主人士和国民党方面的也是10人。每条小艇有船夫舵工约10人，驶得快捷如飞。离开澳门后，突然遇到日军的探照灯光，幸亏舵工和船长镇定自如，立即掉转船头，向相反方向疾驶。小艇又重新回到澳门港。这次，船长说改变方向，迂回绕道

① 张云乔. 旧梦拾零 [M]. 中国烟草博物馆, 2004: 86. 又见: 陈坚, 陈奇佳. 夏衍传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5: 323.

② 张云乔. 旧梦拾零 [M]. 中国烟草博物馆, 2004: 87-88.

③ 夏衍. 走险记 [M] // 袁鹰, 姜德明. 夏衍全集: 文学. 上.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 229-230. 又见: 陈坚, 陈奇佳. 夏衍传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5: 323. 又见: 张云乔. 旧梦拾零 [M]. 中国烟草博物馆, 2004: 88.

而行。小艇再次出发，顺利通过横琴岛，之后绕过三灶岛，天亮时到达南北水。遇到汪记伪军“南支那海军陆战队”来检查，船长送上“白纸包”（里面是从澳门买回来的鸦片烟），全船就获免检放行。<sup>①</sup>

在南北水中的北水上岸后，船主头人（一位老者）招待夏衍等人到他家，安排食宿。大家在南北水停宿一晚。次日（1月20日），再次乘坐两条小艇出发，其中一条艇是武装保镖“战艇”，头尾架有机枪各一挺，中间划艇健儿约10名，都配有驳壳短枪，作为护送的“防船”。夏衍等客人乘另一长形小艇，约8名划手，船夫不带武器。两条小艇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约下午4时后，已可看见远处的赤溪的山了，“防船”作别返回。夏衍等人的小艇则被珠江游击队的帆船迎接，终于到达都斛镇。<sup>②</sup>

在都斛留宿后，向台山县城出发。都斛至台山县城约40公里，有公路相通。夏衍一行人，男士步行，女士则坐专门拉客的单车尾，大家约定在台山华侨旅行社集合住宿。近百里长途，十几个人走走停停，拉成长线，夏衍走在队伍前面。这一段历程，在脱险到桂林后，蔡楚生将夏衍率领众人逃难的情形画成了一幅《黄坤逃难图》（“黄坤”是夏衍此次逃难的化名）。田汉在上面题了一首五古，欧阳予倩也在画侧写了一首七绝。<sup>③</sup>

夏衍一行人分批到达台山县城后，由台山搭船到开平县三埠镇，再在三埠的长沙乘船到达苍城，队伍集合后，水陆兼程，终到达肇庆。肇庆有广东省政府设置的“香港归国同胞接待站”，热

① 张云乔. 旧梦拾零 [M]. 中国烟草博物馆, 2004: 88-94.

② 张云乔. 旧梦拾零 [M]. 中国烟草博物馆, 2004: 94-98. 又见: 陈坚, 陈奇佳. 夏衍传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5: 323.

③ 陈坚, 陈奇佳. 夏衍传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5: 324. 又见: 张云乔. 旧梦拾零 [M]. 中国烟草博物馆, 2004: 106-107.

情地招待了他们，并允许免费乘搭政府包雇的“花尾拖渡”前往广西梧州。此后，他们坐船到梧州、石龙（广西），直到柳州。在柳州，谢和赓接受了特别的任务，直接去了重庆，金山、王莹也作别离开。其余众人随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于2月5日抵达桂林。<sup>①</sup>

夏衍一行人，虽然颠沛流离，有些狼狈，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力量的部署保护下，终化险为夷。党中央对他们一行的撤退十分重视，据司徒慧敏的回忆，大概到台山的时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给李济深，说党的代表夏衍带了一批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回来，途经台山这一带地方，请沿途予以保护”。<sup>②</sup>

夏衍这一批共同从澳门撤离到桂林的人物有：郁风、张云乔、郑安娜、谢和赓、司徒慧敏、金仲华、蔡楚生、金山、朱树兰、王莹。其中，原本计划随行的蔡楚生的夫人陈曼云，是潘汉年手下的女干将，后来没有再随同他们一起撤离，而是奉命潜伏下来，直到整个大营救结束，才离开香港。<sup>③</sup>

## （二）经石岐路的陆路撤离

稍后到达澳门的华嘉等人决定走陆路，须经过日军搜查岗哨，以“难民”身份为掩护，经中山石岐返回后方。柯麟已安排石岐、江门一带的接应人员。<sup>④</sup>

华嘉一行9人，事先办理走岐关路的手续，经过多番周折，耗

① 张云乔. 旧梦拾零 [M]. 中国烟草博物馆, 2004: 100-104.

② 陈坚, 陈奇佳. 夏衍传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5: 323.

③ 余俊杰, 刘中国. 白石龙大营救始末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5: 163-164. 又见: 司徒新梅. 电影《明月几时有》背后的历史故事: 父亲司徒慧敏回忆抗战时的香港大撤离 [N]. 北京青年报, 2017-7-12 (B6).

④ 华嘉. 香港脱险记 [M] // 何小林, 郭际. 胜利大营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9: 327-328.

时3天，领到了通行证。<sup>①</sup>1月18日清晨，华嘉、谢加因一行9人离开澳门，踏上岐关路。岐关路是从澳门的关闸到中山县城石岐的公路。他们过了关闸，再过日军的检查站，到了属于中山县的拱北。一路忍受着单车夫的“宰客”，却也由单车夫来应付路上各种“联防队”的检查，并在单车夫的提醒下办了“良民证”，终于进得石岐，安置在原定的一家大旅馆。<sup>②</sup>翌日，华嘉一行9人分开去排队买船票，之后到码头，挤上小火轮拖带的驳船，前往江门。到了江门，接受地下党组织安排，出北街，走白石乡的“封锁线”到周郡，抄直路到棠下。接头人员说这是一条开放的“封锁线”，还没出过什么大事，但一定要找到当地人带路。1月20日下午，在当地棠下乡商人带领下，华嘉一行9人从江门经北街到白石乡，一路有惊无险，从白石到了棠下，受到“归侨招待所”的热情招待。后从白石乡到达60里外的肇庆。至1月底，华嘉一行9人终于到达桂林，2月初，又与经都斛水路的夏衍等人会合。<sup>③</sup>

从澳门经岐关路到石岐，再转江门撤离到内地的，还有萨空了等人。<sup>④</sup>此外，画家叶浅予、作家徐迟、摄影家罗寄梅等文化人及其家属，也是从香港坐船到澳门，再借助“难民”身份，从澳门经岐关路到石岐，再转江门撤离到内地。<sup>⑤</sup>

---

① 华嘉. 香港脱险记 [M] // 何小林, 郭际. 胜利大营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9: 328.

② 华嘉. 香港脱险记 [M] // 何小林, 郭际. 胜利大营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9: 330.

③ 华嘉. 香港脱险记 [M] // 何小林, 郭际. 胜利大营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9: 331-334.

④ 萨云. 我的父亲萨空了 [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4: 370.

⑤ 叶浅予. 香港历险记: 我在抗日期间的一段经历 [M] // 《人物》编辑部. 风过流年 文化名人忆往昔.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68-76.

还有端木蕻良等人，也于2月取道西江，经肇庆、开平等地，撤退到坪石，并在中共地下党员王坪等接应下，于3月抵达桂林。<sup>①</sup>

### （三）经广州湾的撤离

#### 1. 千家驹及其夫人的曲折转移

千家驹在香港沦陷时身在九龙，知道日军准备向内地疏散港九难民的消息后，也焦急等待日军解禁海面封锁，以便随难民疏散到内地。1942年初，千家驹在报纸上看到了更坏的消息，汪精卫派四个大汉奸来香港，其中一个叫陈君慧的是在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老同事，知道他的政治态度。他考虑尽快逃离香港，但此时妻子梨音已有身孕三四月，行动不便，且缺乏路费。正在紧急关头，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刘少文得知了这一情况，立即派潘柱和李健行去帮助他解决困难。

潘柱设法联系上正在“小摊上买东西”乔装打扮的千家驹，说明来历后，千家驹表示想离开香港但缺乏资金，并且还有70岁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第二天，潘柱即又设法给他“送来了四百元港币”。对于共产党的相助，千家驹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对党组织的援助，我心里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sup>②</sup>

在潘柱帮助下，千家驹设法请来了日本医生，为妻子偷偷堕

<sup>①</sup> 王德金，徐霞. 永远的怀念——纪念端木洪良一百周年专辑 [M]. 铁岭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政协昌图县委员会出版，2012：285.

<sup>②</sup> 李慧. 1942香港大抢救：部分文化爱国人士踪迹寻找始末 [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4）. 又见：千家驹. 忆抗战生活片断 [C]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第98辑 [M].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8. 又见：千家驹. 党中央的无私营救，转引自：张国华. 我们的共和国丛书 奠基卷 浴血抗日 [M].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3：199-200.

胎。<sup>①</sup>三日后，千家驹携家眷老少7口人，在香港党组织的安排下，由九龙尖沙咀码头乘坐运煤货轮作掩护离开香港，船上遇到杨东蓊。途中一度迷航，后到达广州湾（今湛江），全家已是断粮断水，幸得友人李振院接应，并安排食宿。在李振院全程全力张罗、负担、护送下，千家驹一家再由广州湾出发，一路通过长途汽车、山兜子、步行，经陆川、玉林、贵县、来宾、柳州、上湘桂路，终于回到广西桂林。<sup>②</sup>

## 2. 不愿当亡国奴的学者、艺人从香港流亡广州湾

香港沦陷后，有一批当红的香港电影艺人无法及时脱险。日军的“电影报到部”头目把关文清、吴楚帆、黄曼梨、白燕、卢敦、谢益之等召集到九龙半岛饭店，威逼利诱，要他们拍摄日本人策划的《香港攻略战》，宣扬日本法西斯攻占香港的所谓“武功”和“仁政”，表达其所谓“中日亲善、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圈”等美化侵略的主旨。这些香港艺人当场以沉默表示拒绝。后于除夕之夜（1942年2月14日）暗中结伴，搭乘“白银丸”轮船撤退到广州湾（今湛江）。<sup>③</sup>

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古文字研究家陈寅恪，被誉为一代宗师和“教授中的教授”，也是从香港走海路，经广州湾脱险的。日军侵占香港时，陈寅恪正执教于香港大学。香港沦陷后，陈寅恪

① 潘柱. 回忆香港的抢救工作 [M] //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 第3辑 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 惠州: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1984: 59

② 王文政. 千家驹年谱 [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4: 75.

③ 余俊杰, 刘中国. 白石龙大营救始末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5: 176. 又见: 梁政海. 广州湾时期赤坎市简况 [C] // 政协湛江区委员会. 赤坎文史: 第2辑 [M]. 2010: 59.

一家生活陷入贫病交加的困苦，但他保持民族气节，拒绝与侵略香港的日军合作。中共方面也关注到陈寅恪的情况，事先曾派乔冠华来联系他。乔冠华是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后来又由陈寅恪介绍到德国留学。乔与陈商量秘密转移之事，但陈的妻子心脏病时好时犯，而且陈的小女儿当时正患百日咳，昼夜尖咳不断，夜间行动随时有可能暴露目标。因此，营救陈寅恪的行动只能推迟。后来，陈寅恪一家搬迁到贫民窟，乔冠华离开香港后，中共方面找不到他了。<sup>①</sup>此时，国民党方面也开展了营救陈寅恪的行动，在民主人士朱家骅、傅斯年等的督促下，1942年5月5日，得到国民党驻港澳情报机构帮助的陈寅恪，带领全家逃离香港，混进逃难的人群，坐上开往广州湾的轮船。途中船行至澳门，短暂靠岸，陈寅恪弃船登岸，与事前约定的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周尚见面，收到路费和生活费后，又赶回到船上。<sup>②</sup>

陈寅恪在广州湾的西营（今霞山）住了一段时间。这期间，乔冠华与陈寅恪重新取得了联系。乔冠华与广州湾的中共地下组织联系后，安排陈寅恪一家以法国洋行的业务员身份作为掩护，穿越法军、日军的关卡和封锁线，于6月撤离前往内地。<sup>③</sup>陈寅恪辗转到达桂林，后到广西大学任教。<sup>④</sup>

另外还有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因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演戏，本人受到严密监视，暂时难以撤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冒险将他15岁的四子葆琛、13岁的五子葆珍护送撤离到广州湾，后转到

① 李洪涛. 大师的密码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9: 290-291.

② 屈小强, 李拜天. 陈寅恪 [M].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20: 49-50. 又见: 徐卫红. 陈寅恪画传 [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7: 159-160.

③ 李洪涛. 大师的密码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9: 293.

④ 骆国和. 湛江珍闻 [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112-113.

内地的贵州。

1942年从香港逃亡到广州湾的，还有香港著名表演艺术家、粤剧泰斗马师曾。他与欧阳俭、罗丽娟、红线女、梁冠南、马师球、甘燕明等逃难到广州湾的演艺界名人一道，组成抗战剧团，在赤坎、霞山一带演出。另外还有谭兰卿、张瑛、大口何、何芙莲、郭湘文、小金钟、梅绮、广州妹、伍丽嫦、邓竹筠、陈有后、岑玉登、鲍洛夫、李亨、梁福和、蒋微、林清、欧爱、廖少德、陈展鹏、湘文非、梁醒波、郎筠玉、张雪峰、梁雁崧、赵连碧、少浪萍、吕文玉郎、上海妹、半日安、李清、容小意、客玉意、吴回、李辰风等一大批粤港粤剧名伶及演艺界知名人士以及众多演艺人员。后来，他们组成剧团，在广州湾等地演出，对广州湾（湛江）的文艺起到了促进作用。<sup>①</sup>

---

<sup>①</sup> 梁政海. 南天琐记 [M]. 香港: 南方人民出版社, 2008: 435-436.

### 第三节

## 惊心动魄的特殊路线

根据党中央、南方局的紧急指示，面对日军海陆封锁和交通工具奇缺的严重情况，营救方案中，除了东线、西线两条主要线路外，还有少数有特殊情况的人员，则安排从其他路线脱险，多称之为“特殊路线”。特殊路线也多往东江游击区方向去。如著名民主人士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由于积极参与抗日，而被日军列入了“黑名单”，由于何香凝的名气比较大，再加上年老体弱，组织上决定派专人专船护送她走水路撤离。再如柳亚子，著名的诗人和民主活动家，经常与何香凝在一起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也是国民党左派元老，鉴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缉捕威胁，以及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也是走的特殊路线，派专人进行护送。一同撤离的，还有何香凝的儿媳妇经普椿和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周恩来也倍加关注，专电囑南委书记方方，指定专人负责接待和护送，确保安全，从水路用船护送。

另有少数文化人也走这条交通线。如民主人士李伯球、陈汝棠、邓文田、邓文钊等，就是由李健行带路，交给黄冠芳的短枪队，在企岭坐船，渡过大鹏湾，在沙鱼涌上岸，送到葵涌、惠阳坪山等地，再转往惠州。

高士其则是水陆兼程，往西北方向，从港岛出发，经广州、清远、三水到达后方。

## 何香凝、柳亚子的有惊无险

### （一）避险港岛

1941年12月10日，日军正进攻九龙，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兼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廖承志匆匆赶到九龙何香凝寓所，告知已雇好了一条船，要何香凝和经普椿母女<sup>①</sup>立即随他一齐急渡赴港岛。当时过海轮渡断航，是用重金（每人索价十元）雇到的一条小船。时间紧迫，任何东西都来不及携带，连熟睡小孙女廖蕻的鞋袜也顾不上穿，抱起就走，空手逃离了九龙。

由于当时香港的形势十分紧张，暂时没有办法将何香凝转移出去。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她们到香港岛后，先在西摩道保卫中国同盟办事处暂住，后因该处也不安全，便转移至中环鸭蛋街蔡廷锴的空宅中居住。何香凝等暂时在蔡廷锴家大宅子安顿下来。

到25日，英军驻港当局宣布投降。香港沦陷后，日军及汉奸、特务猖獗，到处搜查抗日的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将领。在日军紧密的搜查下，负责港岛方面联络组织工作的刘少文意识到，蔡宅也已不安全，躲过一时的搜查后，何香凝一行便又移居到对面的李济深家的木楼上（当时李济深全家早已离去）。这段时间何香凝在战乱中辗转迁徙，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敢和镇定。

<sup>①</sup> 1938年1月，廖承志由延安经汉口到香港，与经普椿结婚。9月15日，廖承志之长女廖蕻出生于香港跑马地摩利臣山道。见廖梦醒编：《何香凝大事纪年》，未刊稿。

## （二）香港经九龙脱险

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机要部门的工作人员潘柱在接到廖承志下达的联络爱国人士并准备撤退的任务后，经过一番周折，利用香港党组织留下的各级关系，首先找到了柳亚子和他的女儿柳无垢，接着又在罗便臣道找到了何香凝、经普椿一家。<sup>①</sup>经研究，决定将何香凝与柳亚子一行一起营救出来。

日军占领港岛后，遣散港岛居民，趁着这个机会，交通员谢一超决定让何香凝一行乔装成难民，以掩护躲过日军的检查站。在刘少文指挥下，紧张地开始偷渡的准备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后，1942年1月15日，行动开始。为了隐藏身份，负责护送的谢一超等人打扮成渔民，何香凝经过化装，身穿广东劳动妇女惯着的唐装蓝衫，偕经普椿母女身穿广东便装、毡帽戴在眉边，柳亚子则扔掉了脸颊上的近视眼镜和手杖，头上戴了一个大毡帽。两鬓长髯的柳亚子偕其女柳无垢一起。护送父女俩的徐文烈回忆当时的情景，东江游击队的同志负责引路，徐文烈扶柳老（亚子），柳无垢扶着何香凝，相隔一定距离，防止被特务、汉奸全部发现。沿电车轨道到西营盘底海边的路很长，二位老人步行相当困难。<sup>②</sup>从中得见当时的惊险情状。他们一行人顺利通过了日军的检查站，转移到了铜锣湾避风塘的船上，准备乘船离港。

出于航线安全的考虑，何香凝等人乘坐的轮船途中又临时改变了原先的航线，因此一度失去消息。负责营救方案实施的刘少文甚是担忧，不停地给马宫港的地下党组织发电报，要求他们快速打探消息。刘少文同时派人迅速前往长洲岛了解情况。于是，长洲岛

<sup>①</sup> 廖梦醒编：《何香凝大事纪年》，未刊稿。

<sup>②</sup> 廖梦醒编：《何香凝大事纪年》，未刊稿。

的陈亮明也立即发动长洲岛的所有地下党员出海寻找。恰逢东江游击队手枪队中队长江水带着队员曾连在坑口一带执行任务，发现了何香凝一行。江水为何香凝一行雇用钓艇，一番周折后，抵达西贡。<sup>①</sup>

当时西贡很乱，垃圾堆积如山，到处都有饿殍。虽然那时西贡还没有日本兵驻扎，但汉奸、特务却是常来常往，所以不能作过多停留，旋即准备从西贡下船，往大鹏湾、大小梅沙方向撤离。<sup>②</sup>

当时，东江游击队在大鹏半岛东西两侧成立了两支海上游击队，并在大亚湾和大鹏湾开展了海上游击战3年多，俘敌船43艘，击毁、击沉敌机帆船和大木船10多艘，曾直入大亚湾敌军巢穴，歼灭伪军海军陆战队一个大队，生擒伪大队长，扰乱日军海上运输线，控制南海数百里海岸线，有力地配合东江陆上游击队打击敌人，具备一定的武装力量保障，得以给予一路的安全护送。

### （三）西贡经海丰撤离

1942年1月16日，在共产党员谢一超的护送下，何香凝、柳亚子一行转乘中共地下组织准备的船只，从西贡出发，经大鹏湾、沙鱼涌、大小梅沙，前往东江游击区。<sup>③</sup>

他们乘坐的船是机帆船改装成的帆篷船，借风力行驶。可是出海之后，偏偏海面不是无风便是逆风，原本两天的行程，竟在海面上漂流了七个昼夜还未到达目的地。这时，船上的饮水和粮食都已

<sup>①</sup> 黄秋耘，夏衍，廖沫沙，等. 秘密大营救 [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60-61.

<sup>②</sup> 黄秋耘，夏衍，廖沫沙，等. 秘密大营救 [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60-61.

<sup>③</sup> 徐文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柳亚子香港脱险记 [N]. 团结报，1983-06-18.

告罄，所有人都为水尽粮绝而焦虑。此时正好遇上东江游击队的巡逻队。游击队得知船上有廖仲恺夫人，立刻向上级报告。他们除写信表示敬意外，还送来了鸡、肉、熟食和奶粉，指明是“送给穿蓝衫的老太太的”，此外，还给船上其他的人送来了淡水和几百斤番薯。困难解决了，海上风也起了，船便驶向东江的海丰。<sup>①</sup>1月下旬，他们在海上足足航行了八天八夜后，终于到达海丰县属的马宫港口，收帆入港。

何香凝等一行从马宫到海丰汕尾上岸。何香凝凭自己的影响向驻守在当地的国民党海丰驻军邓龙启提出保护要求。邓龙启碍于何香凝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不敢怠慢，便安排她住在邓龙启的公馆<sup>②</sup>。经普椿则不便公开身份，就由谢一超的爱人出面联系，住在海丰城东门头“春利旅店”（即现在的红城酒楼）。谢一超则化装成何老太太的义子，经常出入于春利旅店，作为何老太太婆媳的联系人。

何香凝到达海丰县城后，不顾旅途疲劳，在海丰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形成了广泛影响。她还常主动找当地驻军官兵聊天，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阐明国共合作才能取得抗战胜利的道理，晓以大义，激发抗敌热情，官兵们受到很大鼓舞。

这引起邓龙启的不满。他既要保护好何香凝的人身安全，又担心何香凝的演讲会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就在这时，曾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的罗翼群来到了海丰县城，他是同盟会员之一，且一直是孙中山政治主张的坚定追随者，在黄埔军校时期，他是廖仲恺最为得力的助手。邓龙启即催促

<sup>①</sup> 廖梦醒. 我的母亲何香凝 [M]. 香港：朝阳出版社，1973：62-63.

<sup>②</sup> 也有一说住在杨成兴家。

罗翼群赶快把何香凝带走。按照原定的计划，党组织准备护送何香凝从海丰出发，经过广东兴宁、韶关，最终到达八路军大后方的根据地。现下情况有变，谢一超向海丰县地下党组织说明情况后，决定支持罗翼群同行，并安排谢一超跟随何香凝等人一起出发，前往韶关，并通知了沿路的中共地下交通站。

#### （四）从海丰到韶关

何香凝在海丰逗留十多天，便又转徙流离，到达兴宁县。

当时，经普椿怀孕，即将分娩，由友人香翰屏介绍其入兴宁医院待产，并于5月2日顺利生产。<sup>①</sup>

何香凝抵兴宁后，曾将行止电告在韶关（曲江）的李章达。李章达复函邀请何香凝赴韶关。因经普椿生产后不宜远行，何香凝便一个人乘罗翼群的便车到达韶关。

在韶关，她安顿在廖仲恺的十九妹婿区觉孟的家里，住处名叫“湘衍园”。不久后，同柳亚子在此会合。<sup>②</sup>

#### （五）柳亚子老隆脱险

柳亚子父女与何香凝一道到达的马宫（又称“马鬃”）靠岸。马宫是个小地方，不大为汉奸、特务所注目，又是港澳同胞之乡，比较安全。

柳亚子父女上岸后，由地下党安排，扮成姓黄的大商人，到马宫与红草地交界处的“新村杨”，住在交通员谢一超安排的港商、汕尾籍爱国侨胞杨胜昌的大院。但由于柳亚子父女是江苏人，不会

① 廖梦醒. 何香凝大事纪年, 未刊稿。

② 柳亚子, 湘衍园呈廖夫人 [M] // 王晶焄, 王学庄, 孙彩霞. 柳亚子选集: 下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866.

说广东方言，容易暴露，不能在该村久留，很快即又转移。柳亚子父女在此住了十来天，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料，柳亚子为杨胜昌大院题写了两副对联，分别是“由来正位须参易，看到宜家在诵诗”“绣户香风暖，春庭晓景长”，并作了七言律诗一首《新村题壁借某公韵》。<sup>①</sup>

至2月初，东江党组织决定，再由谢一超护送柳亚子父女转移到联安下许村居住。到下许村没住几天，春节就临近了，这里又离县城较近，来往的人多而且杂乱，地下党又决定由城南路支部负责人郑耀护送，将柳亚子父女转移到偏僻的公平日中圩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交钟娘永（地下党员，当时任国民党乡长）负责掩护。柳亚子父女在日中圩住了一个多月，得到钟娘永热情招待和精心照顾，他十分感动，写下了“将近难忘日中墟”“况瘁钟郎情谊重”的诗句。

2月底至3月初，共产党员袁复接到海丰地下党负责人蓝奋才、卓学佐的指示，要求筹足旅费，和谢一超一起护送柳亚子父女到老隆。约2月，蓝奋才、谢一超、袁复偕同柳亚子父女一行五人，从海丰公平日中圩出发。考虑到沿途多是崎岖羊肠小道，柳亚子父女步行困难，钟娘永特制了两台椅轿，并派了三名乡丁护送。柳亚子父女坐轿，其余三人步行。第一天到达陆丰新田，住在米町岗小旅店。第二天打发了三个乡丁返回海丰日中圩，一行人兼程赶路，这一段路比较好走，顺利到达河婆圩（今揭西县城）。

从河婆圩经黄岗七斜径，翻过几座大山，到达安流，一路人烟稀少，山路崎岖，将近有90华里。从安流到五华改走水路，叶振成帮忙雇到了木帆船，一行人在木帆船上食宿。由于到五华这一段水

<sup>①</sup> 诗从，——汕尾何香凝旧居情况介绍，摘自旧居情况介绍手册。

路水浅，又是逆流，船行得很慢，有时要停船铲沙开道，三天后才抵达五华县城。

到五华后，袁复和谢一超偕柳亚子父女搭乘汽车前往老隆。蓝奋才由于曾以染衣匠的身份在这一带公开活动过，不便与之同行，遂独自步行走小路去老隆。3月10日后，四人到老隆镇后，住进谷行街的一家小旅店，为预防不测，袁复与谢一超同住一房，柳亚子父女则另住一处，大家彼此佯装不认识。不久，蓝奋才派人同袁复一行取得联系，告知粤北省委被破坏，地下组织已撤退，不能交接，要暂时住下来，等候联络。到了第四天，蓝奋才派人通知，决定把柳亚子父女护送到兴宁，交给兴宁地下党。

袁复和谢一超再启程护送柳亚子父女乘车赴兴宁。兴宁是粤北的一个交通要道，社会治安比较复杂。到达兴宁车站后，为慎重起见，谢一超派袁复先进城去找东江盐业运输行的黎约伦（地下党员）联系。袁复找到东江盐业运输行后，见到了黎约伦和蓝奋才。经商量决定将柳亚子父女安置在旅店集中的兴田路的“安东尼”旅店。在兴宁安顿好后，谢一超设法用银行交通站电台，与已到达韶关的何香凝取得了联系。

几天后，柳亚子父女被兴宁地下党的同志接往石马乡。在临行的前夜，柳亚子叫袁复买来三张宣纸和笔墨。第二天，袁复和黎约伦同去向柳亚子告别，柳亚子将事先写好的三副对联送给袁复和谢一超、蓝奋才，以表示他的感激之情。<sup>①</sup>

柳亚子父女在石马乡张华林、陈宛聪夫妇家隐居十日后，连贯专程来石马乡把他们接到老隆，在老隆住有月余，又将他们父女安

---

<sup>①</sup> 黄秋耘，夏衍，廖沫沙，等. 秘密大营救 [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228-233.

全护送到韶关，与先期到达的何香凝会合。

何香凝、柳亚子会合后，在党组织护送下随即北上衡阳，转车赴桂林。直到这时，从香港营救出来的水陆交通特殊路线脱险的爱国民主人士，算是真正安全了。

## 高士其的艰险脱困

### （一）港岛到广州

最后一个撤离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大概是著名的科学家和儿童文学作家高士其。他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实验室做实验时，不慎被一种脑炎过滤性病毒侵入脑中，从此他的健康就受到很大的损害，不仅行动困难，连吃饭和穿衣也需要别人料理。高士其于1939年在党组织安排下到香港就医，因战事也受困于港岛。因自身行动非常不便，要从香港撤退到东江游击区，存在较大困难。

1942年4月，在香港中共地下组织部署下，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情报工作人员黄秋耘在接到党组织要求其护送高士其脱险的任务后，立即进行了形势分析和相应安排。黄秋耘等认为，执行这样的任务，人数不能太多，容易暴露，但又不能太少，难以照顾，于是与十多个回国准备前往粤北升学的爱国青年取得联系，请求同行并协助。他们并不知道高士其的真实姓名和身份。

高士其的撤退线路是计划从香港坐船到广州，再至清远，经三水等地前往韶关。

行动开始后，高士其从港岛出发乘船。由于高士其挨了一段时间饿，非常消瘦，加之胡子又长，相貌与往常有很大不同，因而通

过岗哨时，没有被日军识破。

到达广州后，原计划将高士其安置在西濠旅店。结果店主见到高士其的病状，不愿接待，黄秋耘只好另雇了一辆人力车，载高士其到处找旅店投宿。后二人来到博济医院，恰好门诊部有一位女医生认识高士其，在她的帮助下，高士其在医院安顿下来。两三天后，黄秋耘就把高士其接出医院，一起启程北上。

## （二）广州北上韶关

更大的困难还在后头。广州至清远一段，在三水和芦苞之间，有一段长约四里路的“无人区”。在“无人区”，一是土匪经常拦路抢劫，旅客们总要成群结队、提心吊胆地跑步冲过去。二是路十分难走。高士其自己不能走路，黄秋耘等为照顾他，轮流背着他走，历经艰辛，终穿越“无人区”，到达清远县城，再从清远出发北上，到达韶关。<sup>①</sup>

到韶关后，黄秋耘很快就跟乔冠华联系上。乔冠华嘱咐黄秋耘，让高士其住在韶关河西循道医院（即今粤北医院）。黄秋耘协助买了两张从韶关到桂林的二等车票，火车把高士其送到桂林，安顿在医院里。然后黄秋耘通过文化供应社的邵荃麟去找张友渔，请他照顾高士其的生活。张友渔当时是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著名的学者，上层社会关系很多，较能保障安全。由此营救高士其的任务总算顺利完成了。

营救爱国人士的大行动，得到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持。晚年的黄秋耘回忆说：组织上要他护送高士其离港，如果不是有十几个

---

<sup>①</sup> 黄秋耘. 太平洋的风暴 [C] //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 第3辑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 惠州：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1984：131-132.

回国升学的青年学生帮助，靠他一个人是无法将半身不遂的高士其安全护送回内地的。<sup>①</sup>

在广东、香港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以及各界的团结合作、奋力营救下，从1942年1月到11月，经过将近一年的奋战，近800名爱国人士及其家属安全撤离，无一伤亡。省港大营救取得全面胜利。

---

<sup>①</sup> 关于“抢救文化人”专题座谈会纪要（广州）[M]//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第3辑. 惠州：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1984：29.



## 第四章

# 伟大创举：省港大营救的重大历史意义

省港大营救保护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破了日本人抓捕我国文化名人的幻想，极大地增强了国内的抗战士气，巩固和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护了中国文化血脉，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



## 第一节

# 巩固和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省港大营救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展的对被困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的一次营救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团结知识分子同心抗日的生动实践，大大地巩固和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一 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界统一战线中的政治威信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省港大营救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高举团结抗日旗帜，以博大胸襟、果敢气魄和战略眼光，粉碎日本侵略者“以华制华”、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保护中华民族文化血脉而做出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抗日游击队以及革命群众不惜代价、不计牺牲，历尽千辛万苦营救文化人，团结知识分子，最终取得了胜利。

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这次大营救深得民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界人士和全国人民心中的政治威信，他们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面对文化人士遭到日军四处搜捕的危险关头，党中央决定以最快速度（抢在日军实施逮捕之前）做好抢救工

作，并立即将他们护送到东江、西江等游击区，然后转往大后方。为此，党组织对营救工作做了周密部署，从确定营救对象并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到确定分路、分段、分区撤退，都进行了周密的安排，营救路线沿途均设立秘密接待站，沿途党组织和游击队做了详细分工，指定专人负责，确保万无一失。这一切，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发动群众，以周密的部署、无畏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促成的。所有这些安排，使文化人士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所在，也使他们非常感动，正如著名作家茅盾在其《脱险杂记》当中写道，这次省港大营救组织得非常周密，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营救。当年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夏衍曾表示，大营救记录了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实，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

中国共产党勇挑重担，力主营救滞留香港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深受广大知识分子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使广大文化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经历了精神上的洗礼，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了更充分的认识，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核心的政治地位更加巩固和提升。

## 汇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大的力量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是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战争，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阶层的广泛拥护，改变了抗战初期抗日力量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的状况，结

成了抵抗外侮、共赴国难的坚强纽带，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生动局面。广东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正是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主张，开展对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大营救。

省港大营救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运用的结果。广东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革命群众不仅全力投入这场旷世的大营救，而且还运用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智慧，积极争取中间力量，调动一切可用的社会资源参与了营救。例如在老隆段，当时有两家在龙川有颇高的声望地位的商行——义孚行和侨兴行，为疏散护送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特别是位于老隆镇沿东江畔河唇街的侨兴行，其在粤、桂、湘等省均有办事处或商号，并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乘坐侨兴行的车，沿途过关穿卡都较为顺利。更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中共后东特委在老隆水贝村成立后，在老隆区政府、学校、电话局、税务局都安插了中共地下党员。地下党员黄用舒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利用自己担任国民党老隆区区长兼电话所长的身份，建立电台侦察敌情，并在水贝莲塘乡建立了“外白内红”的革命政权。转移文化名人号角吹响后，黄用舒以自己系国民党黄强中将堂弟的身份，动用地方士绅关系网，协助连贯落实安排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食宿落脚处，疏通军警关系。营救行动也得到了地方百姓的掩护和支持。老隆镇水贝村党支部书记黄玉燕回忆起祖父黄居来生前常和他讲起的往事：黄居来年轻时因为力气大，撑船是一把好手，被发展为地下交通员，负责送情报。老隆组织转移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之时，黄居来多次撑着渡船将转移对象送到东江对岸的水贝村藏匿。黄玉燕说：“有一天夜里遇到军警巡查，我爷爷不顾敌人鸣枪警告，黑暗中被一颗流弹打中了左小腿，但他仍坚持

将人安全送到对岸。爷爷活到101岁去世，遗体火化后骨灰中还发现了那块弹片。”<sup>①</sup>正是因为有千万个像黄居来这样的革命群众投入了这场大营救，才有了近800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及其家属安全撤离，无一伤亡的结果。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深得文化界人士的认同和拥护，党领导的文化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省港大营救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力。除了把近800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及其家属安全护送撤离外，东江抗日游击队还营救出了一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其家属，如国民党驻香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南京市市长马俊超的夫人、原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的家属等。与营救行动同时进行的还护送了大批港澳青年学生、技术工人、医护人员，经过游击区转到大后方韶关、桂林和重庆等地去继续求学和工作，其中几百人加入抗日游击队。同时，还护送了近万名港九同胞与侨商、侨眷脱离沦陷的香港，经过游击区安全地回到了内地，<sup>②</sup>对汇聚全民抗战力量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三 彰显了广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突出贡献

省港大营救是广东党史的重大事件，也是全国抗战史上的重大事件。广东承担此次大营救任务，既具有全国性的意义，也具有

---

<sup>①</sup> 河源市政协、龙川县政协办：揭秘“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妙设枢纽 雁过无痕 [EB/OL]. (2019-10-31). [http://www.gdsw.gov.cn/wsgdsdjy/content/post\\_22461.html](http://www.gdsw.gov.cn/wsgdsdjy/content/post_22461.html).

<sup>②</sup> 余俊杰，刘中国. 白石龙书影人影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

广东特色。它体现了广东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和稳固厚实的群众基础。广东这块红色的土地，早在党成立初期就深深地烙上了光荣的印记。广东地区参与革命早，革命基础牢固，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广东便成立了党小组，国共合作时期广东城乡的共产党员发展迅猛，壮大了队伍；广东党组织经历了海陆丰农民运动、广州起义、抗日游击等重要革命斗争锻炼，建立了一支卓越的革命精英队伍。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省港大营救的主力军东江抗日游击队，他们在党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积极打击日伪军，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和扫荡，部队经历种种严峻考验，克服重重困难，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壮大。在大营救前中后各个时期，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十分重视团结争取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支持抗日，发挥和体现了广东是著名侨乡，华侨众多的特色。据统计，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从1938年到1939年先后组织了总人数达500多人的12个回乡服务团，主要是回东江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来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东江游击队，后来也成为东江纵队的骨干。这是大营救取得最后胜利的强大群众基础。许多港澳同胞和华侨动员自己的子女回乡回国参加抗日，据不完全统计，有1500人参加东江游击队。后来，随着东江纵队的发展壮大及其英勇抗日事迹的传播，大批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离开学校，加入东江纵队抗日行列。仅从粤北地区来的就有600多人，其中中山大学200多人。参加东江纵队的大多数是工农子弟，但也有不少比较富裕家庭的子弟，放弃优越生活，投奔到艰苦的游击队参加抗日。东江纵队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素有港澳和华侨子弟多、知识分子多、妇女多、小战士多的特点，在共产党领导和教育下，团结一致，英勇作战，在斗争中成长，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总之，在省港大营救乃至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广东各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北江地区、东江地区、西江地区、潮汕地区以及南路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均得到了蓬勃发展，为取得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 || 第二节 ||

# 保护了中华民族文化血脉

中国共产党本着高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伟大的远见和胸怀，做出了周密部署，开展秘密大营救，使几百文化人得到了安全的护送，回到内地大后方，既躲避了日军的搜查逮捕、逃离了日军的魔掌，也免遭了国民党的追杀迫害，极大地保护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这批受到保护的文化精英人士，在后来的中国革命、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 保护文化精英逃离日本侵略者的魔掌

日本侵略者为了企图早日建立其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派遣了大量的特务到香港，秘密侦察内地人士的行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这个战时的“世外桃源”，随着日军炮火骤至已不复存在。聚集于此的数百内地文人、学者、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成为日军搜捕的主要目标。这些文化界人士十分爱国，在日军进攻香港之初，他们就一再呼吁港英当局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抵抗日本侵略者。这种鲜明的立场，使他们被日本法西斯和汉奸走狗视为眼中钉。正因为如此，日军在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海面和港九陆路通道，禁止任

何非日军船只、车辆和人员出入。为了禁止文化人逃离香港，他们把所有的船上的机器全部拆除，并在街头张贴布告，限令目标中的人士限期到日军司令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对于屈服者，将送往内地的沦陷区，为营造“大东亚共荣圈”服务，对于那些不屈者，等待他们的只有集中营和死亡。为了搜捕文化人士，日军还威胁强迫香港居民，供出游击队和文化人的去向，不然就用煤油放火烧屋，手段极其恶劣。

在港知名文化人士中，有相当部分人是因揭露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受到政治迫害，他们本来是为逃避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才搬迁到当时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但是，日军的入侵再次让他们陷入了困境。这批文化名人到港时间都不长，大多无本地亲朋，社会关系单一，加之又是社会名人，很容易在街市中暴露身份。面对生死存亡，他们只好东躲西藏，或者不停地更换住处，要想自行逃离虎口，简直比登天还难。

如前所述，当时有一批当红的香港艺人如关文清、吴楚帆、黄曼梨、白燕、卢敦、谢益之等因无法及时脱险，被日军的“电影报道部”头目召集到九龙半岛饭店，威逼利诱他们拍摄日本人策划的《香港攻略战》，宣扬日本法西斯攻占香港的所谓“武功”和“仁政”，表达“中日亲善、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同圈”等美化侵略的意图。面对日军的利诱，他们以沉默表示拒绝，表现出中国文化人的风骨。这批爱国文化精英如遭不测，将是中华民族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后来在党组织的部署安排下，上述这批艺人于除夕之夜乘船往广州湾（现湛江），当他们逃离香港到达广州湾后，登台表演抗日救亡剧，继续宣传抗日，深受当地群众的好评。就这样，在党组织精心部署下，在游击队战士的秘密护送下，包括上述艺人在内的几百名滞留香港的文化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通过不同

路线，顺利逃离日军魔掌。

## 保护文化精英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杀迫害

当文化人士面临日军四处搜捕的危险之际，全国各界呼吁国民党政府对这些文化人士施以营救。迫于社会多方呼吁和压力，国民党当局在香港彻底沦陷前才仓促派出飞机，并且信誓旦旦要将文化精英接回内地。然而，当众多记者蜂拥前往重庆机场准备迎接归来的文化人士时，却发现飞机带回的多是国民党的“皇亲国戚”以及他们的保姆、侍从，甚至还有多条家犬。一时间群情鼎沸，“人不如狗”等讽刺文章竞相刊载于报刊。<sup>①</sup>此后，国民党再无实质有效的营救行动。

国民党不仅没有施力营救，反而对爱国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名人恨之入骨，派特务监视和追杀迫害他们。柳亚子就是国民党当局下令“就地格杀”的人物之一。在香港，柳亚子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士一方面要躲避日军的搜捕，另一方面还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杀。为安全起见，周恩来指示一定要营救柳亚子安全撤离香港，专门安排了一条特殊路线，让柳亚子与何香凝一道坐船经过八天八夜安全到达汕尾，一路上得到了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很好的保护。负责老隆段交通线的连贯等营救人员经柳亚子本人同意后，秘密护送其到兴宁乡下一中共地下党员家里暂住，隐蔽一段时间后，才由连贯亲自接回老隆，然后护送到韶关再转移至桂林。柳亚子后来撰文《两抵老隆》，并作诗赠与护送他的患难战友，表达

---

<sup>①</sup> 李柯勇：国家相册。800多人神秘“蒸发”！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 [EB/OL]. 贵州网络广播电视台. <https://www.gzstv.com/a/ze609a2b30124bef89ad58785319ab56>, 2022.10.02.17:35.

感激之情，诗云：“复壁殷勤藏老拙，柳车辛苦送长征。须髯如戟头颅贱，涉水登山愧友生。”<sup>①</sup>

著名记者、出版家邹韬奋既是日军公开点名搜捕的重点对象，也是国民党特务搜捕的重点对象，国民党特务在沿途各关卡均挂有邹的相片。在东江抗日游击队队员的护送下，邹韬奋避开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杀，安全抵达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撤离香港抵达老隆后，鉴于国民党特务的追杀，连贯连夜找到邹韬奋，讲明眼下不宜贸然去桂林，劝他暂留广东隐蔽，邹韬奋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于是，连贯让其女儿连结与潮梅特委交通员郑展以表兄妹相称，护送邹韬奋秘密来到梅县江头村的侨兴行经理陈炳传老家隐蔽，一住就是五个月。国民党当局探知邹在梅县山村，又派特务前去搜捕。地方党组织获悉后，立即组织转移。后来，邹韬奋在胡一声、郑展等人的护送下返回老隆，再经后东特委缜密筹划，秘密护送到韶关，最后安全转送往苏北抗日根据地。<sup>②</sup>

### 三 保护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大营救保护了中国的文化血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日寇屠刀下抢救出来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士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在被营救的人当中，有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有的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文化部正副部长、

<sup>①</sup> 河源市政协、龙川县政协办：揭秘“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妙设枢纽 雁过无痕 [EB/OL]. (2019-10-31). [http://www.gdsw.gov.cn/wsgdsdjy/content/post\\_22461.html](http://www.gdsw.gov.cn/wsgdsdjy/content/post_22461.html).

<sup>②</sup> 同上。

外交部部长、文化部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他们都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宋庆龄，1938年6月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药救济和战灾儿童福利工作。她通过各种途径向外国人士和华侨宣传抗日运动和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实况，揭露国民党制造的围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并且向许多国家募集医疗器械、药品、现款及其他物资，运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她还广泛团结国际友人，先后介绍斯诺、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去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香港沦陷前，廖承志找到宋庆龄并保护她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宋庆龄离开不久，启德机场就遭到日军攻占。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宋庆龄在上海创建中国福利会。当蒋介石在美国政府援助下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时，宋庆龄在1946年7月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反人民性质，要求美国人民制止其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当局。为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她继续募集大批医疗器械、药品及其他物资支援解放区。她以大无畏的精神揭露国民党政权的残暴和腐败，驳斥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诽谤。宋庆龄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她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1950年11月在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当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1952年10月，她率领中国代表

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她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957年她随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动。在长期的国际活动中，她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增进各国人民友好，进行了不懈的工作，受到中外各界人士的崇敬，被国际上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sup>①</sup>

廖承志，香港沦陷后，主要领导和负责了秘密大营救行动。他涉险由九龙到香港到茶园村、周田村、东湖旅店等先行实地踏勘，主持制定了周密详细的营救方案，确保大营救安全成功，获得党中央通电表扬。他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达三年半之久，后因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严正交涉才出狱。1946年7月他担任新华社社长，由于当时新华社集党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三大中央宣传机构于一体，因此主持和领导延安新华广播工作，在战争时期确保党中央的声音传遍全中国、全世界，成为中国红色广播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在他的领导下，新华社在各地建立总分社、地方分社，走出国门建立分社，培养了一批无产阶级新闻人才，使新华社真正成为全国性的通讯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等，长期领导外事、侨务和统战工作，受命发布《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在海峡两岸引起极大反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岸友好进程，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乔冠华，秘密大营救中他作为重要领导者之一，与廖承志、连贯、曾生等在东江游击区先行踏勘线路，曾在田心村、茶园村住

---

<sup>①</sup> 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 宋庆龄生平简介 [EB/OL]. (2013-01-21). [http://www.chinatoday.com.cn/ctchinese/zhuanti/2013-01/21/content\\_513606.htm](http://www.chinatoday.com.cn/ctchinese/zhuanti/2013-01/21/content_513606.htm).

宿，并长驻韶关妥善转移大批文化名人到大后方。到重庆后在南方局外事组工作，担任《群众》周刊副主编、《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并开辟“国际述评”栏目。重庆谈判期间，他与夫人龚澎多次陪同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和文化界人士。担任中共代表团研究处处长，创办英文报刊《新华周刊》并任主编，这是中共第一本英文宣传刊物。1946年在港创办中共第一个正式的英文外宣刊物《中国文摘》双周刊，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外传播的主要窗口。筹办新华社香港分社并担任首任社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国家外宣和外交领域的重要岗位担任领导工作。先后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兼《人民中国》首任总编辑，外交部副部长、部长等。多次随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精彩足迹。

萨空了，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筹办《人民画报》和《连环画报》《民族团结》杂志，到领命筹办《人民政协报》并任党组书记兼总编辑直至离休，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主编，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新闻事业，也是新中国民族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主持创办并担任秘书长的《光明日报》已成为在中国文化新闻界乃至全社会享有盛誉的中央级权威媒体。

夏衍，在秘密大营救中与梁漱溟等由澳门转移至重庆，任《新华日报》编委，他的时评和乔冠华的国际评论成为《新华日报》上读者瞩目的亮点。抗战胜利前夕代《新华日报》总编辑。毛泽东抵达重庆谈判的消息就是周恩来亲自要求他到场采访并执笔撰写的。1945年9月赴上海恢复《救亡日报》（后改名《建国日报》）。1946年10月再赴香港任香港工委委员，参与《华商报》复刊，后接替章汉夫任香港工委书记，组织和护送大批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上海解放后负责接管新闻、文化机构。新中国成立后

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和外事工作。

戈宝权，抗战胜利后受命赴上海筹划《新华日报》和《群众》出版，在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任编委，在“周公馆”参加中外记者招待会，从事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中共赴苏代表团任翻译，新华社驻苏记者，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政务和文化参赞，成为新中国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外交官。后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学术委员等，成为著名的翻译家、研究专家、鲁迅研究专家。译介包括高尔基、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大量苏俄文学作品，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赞扬。获普希金文学奖、“俄中友谊”“中俄友谊”纪念奖章，多位中央领导为他题词“文化和友谊的使者”等。曾与他同在东江游击区生活的邹家华题词“人民友谊的使者”。设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奖授青年。

杨奇，在香港沦陷后参与了秘密大营救工作，1948年在潘汉年、夏衍等指挥下，参与秘密护送著名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建共和国的重大行动。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筹建出版《南方日报》并任副社长、总编辑，1957年与黄文俞等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份大型晚报《羊城晚报》并长期担任总编辑。《肇庆日报》（肇庆市委机关报，今《西江日报》）创办者。1974年起任广东省出版局局长、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改革开放后重返香港历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宣传部长，《大公报》社长至离休。广东省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获得者，“当代岭南文化名人五十家”。主编《香港概论》再版六次大受好评。他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见证重大历史壮举——虎穴抢救文化精英·秘密护送民主名流》为秘密大营救等事件留下了真实、完整、详尽的历史记录。

黄作梅，香港沦陷后参与秘密大营救活动，担任国际工作小组组长，在营救盟军人员、与盟军互通情报等方面取得突出业绩。

曾任东江纵队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在《华商报》发表《拯救美国飞行员》和《东江纵队营救国际友人统计》记载其事，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1946年10月周恩来安排乔冠华、龚澎夫妇前往香港，筹办英文版《中国文摘》，黄作梅任发行人，同时协助乔冠华筹建新华社香港分社（乔任社长）。1947年赴伦敦并负责筹建新华社伦敦分社，担任第一任社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香港工作小组”组长，负责全面工作并主管外事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

杨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政务委员会秘书、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主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为国际宣传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孟秋江，抗战胜利后参与创办《周刊》和《文萃》、上海《文汇报》复刊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进步日报》经理、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等。1962年调任香港《文汇报》担任社长。

恽逸群，秘密大营救中由香港到东江游击区，与茅盾、于伶等同行，曾在田心、茶园村驻留。抗战胜利后担任苏北《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兼总编辑等。上海解放后创办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时报》并任社长、总编辑，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等。

金仲华，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新闻日报》社长、总编辑，创办和主编新中国第一份英文报《上海新闻》；中国新闻社首任社长、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社社长、中国记协副主席、上海市国际问题研究所首任所长，多次代表中国新闻界参加国际记协会议等。金仲华因精通英语长期协助宋庆龄工作，宋庆龄赞扬他是“我们忠实坚定的同志和同事，国际知名记者和国际问题评论家”。

黎澍，秘密大营救中经惠阳辗转北上，曾住茶园村。在游击

区期间根据张文彬要求与胡绳等开展对国民党地方部队的统战工作并帮助办报，参加游击队政治部的宣传和文教工作，后任成都《华西晚报》主笔、上海《文萃》周刊主编，香港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和《华商报》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宣部、新闻总署、中央政治研究室任主任、报纸处处长、组长等。先后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晚年有《香港脱险和东江游击区的经历》记述这段难忘的经历。

高汾，秘密大营救中曾与邹韬奋、恽逸群等同行。高汾先后在赣州《正气日报》、上海《大公报》担任记者、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大公报》记者、编辑，《经济日报》及其前身《中国财贸报》记者。她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邓颖超、爱伦堡、聂鲁达等领袖、英雄人物和国际文化名人，著有报道政协开幕的《开幕盛典》、记录开国大典的《震撼世界的一日》等新闻名篇。

.....

### || 第三节 ||

## 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

为了保护香港、保护在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免遭日军的侵略和蹂躏，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广东、香港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争取港英政府的支持和合作，保护一切抗日国际力量，对于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争取港英政府支持共同建立反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游击队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并及时与港英政府联系，加强合作共同抗击日军入侵香港。从1941年秋日军南调的时候开始，东江抗日游击队已洞察其奸，并立即通过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通知香港英国当局，敦促其注意日军动向。本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原则，办事处负责人向港英当局提出合作建议，双方于1941年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进行了合作谈判。如前所述，廖承志于10月25日将与英方合作的谈判内容急电党中央，并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复电，在电文中强调“同意我方与英方合作，并同意在可能条件下轰炸飞机场，条件如你所提

在港设立联络机关，彼方供给枪械、弹药、经费，帮我训练轰炸干部”。

日本海军军舰空兵和潜艇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当天，日本空军开始空袭香港。随之，美国、英国对日本正式宣战。中国政府也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一员。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严正声明：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sup>①</sup>指出：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性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战争。并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决心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大量牵制敌人，实行配合作战。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反日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有着特别重大意义。

在中央发出反日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号召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遵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紧急动员工人、市民、学生参加香港保卫战，在保卫香港的同时，对香港失陷之后的组织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做了必要的准备和安排。而与英美结成广泛的反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后来的国际友人的营救中也充分发挥了作用。

---

<sup>①</sup> 吴德文. 宝安香港大营救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

## 二 营救国际友人扩大了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影响力

日军占领香港后，建立了集中营囚禁英军战俘和政府文员及侨民。其中，把英军战俘囚禁于七姐妹、深水埗、亚皆老街等三个集中营和启德机场，把港英政府的文员、英国侨民等囚禁于赤柱集中营，把印度籍官兵囚禁于马头围集中营。对上述人员进行营救是东江游击队贯彻党中央反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营救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同时，成立国际工作小组，对上述人员展开了营救工作。

据统计，从1942年2月至4月，在东江游击队港九大队的帮助下，一批英国军警官员和士兵先后逃离了集中营，脱离了险境，被护送至游击区，最后被安全转送至大后方。这些被营救的人员包括了英军战地医院的赖特上校和英军陆军军官摩利上尉、戴维斯中尉、杜格拉斯中尉、夏斯特中尉、汤姆生中尉、比尔斯中尉、怀特中尉、祁德尊中尉，还有香港义勇军的波生吉，担任香港警司的汤姆生、波利斯特屈特夫人，英军士兵霍支斯、格尔拉夏等。此外，港九大队还营救了一批美国飞行员。这项营救工作一直持续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sup>①</sup>

游击队对英国战俘、国际友人和美国飞行员的营救行动并取得胜利是反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宽广的胸怀和担当，也使盟国对中国共产党以及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上的重要战略地位有了重

<sup>①</sup> 余俊杰，刘中国. 白石龙书影人影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

新的认识，推动了反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的抗战中，驻华的美军司令部和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部决定和东江纵队建立战略伙伴合作关系。这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集中体现在1944年7月美国《美亚杂志》刊登的《东江游击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该文写道：“这支游击队的真实力量，直到香港沦陷以后，很多中外人士大都由于他们有效战斗才能从日本军事集中营逃出来而安全到达自由中国时，才为人们所注意。”“经过游击区逃出来的一切外国人士，对于他们所看见的一切有着极深的印象，到重庆去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尽他们的最大努力去促使中央政府承认这些游击军队的。”“盟军在中国海岸的登陆队，将不仅需要有一个友好的人民，而且需要一个受过训练，并准备积极参加抗日的人民……立刻承认这些游击队的存在与潜在力量，包括派遣联络官，予以技术上的援助与军火支持，对于我们将来进攻日本的胜利，已具有头等重要了。”<sup>①</sup>

一些被营救出来的外国友人十分感慨，满怀感恩。美国空军中尉克尔，1944年2月驾机轰炸日军占领的香港机场，不幸中弹，带伤跳伞，落地后，在拼命奔跑的时候遇到了东江纵队的小交通员李石，在港九大队的努力下，成功获救。他很感慨地对游击队说：“为了抢救我们，你们一定动员了许多我们看不见的力量，我要和你们做永远的朋友。”当游击队辗转护送其踏上归途时，克尔回望曾经住过的屋子，满怀感激。他说：“他们这些人竟能如此冒险来帮我，那些中国人，是何等令人称奇和美妙啊！”克尔回去后向上级报告：共产党在香港有坚强的力量，美军应与其合作。后来，东江纵队与美军展开情报合作，由东江纵队向美军提供香港各个机场

<sup>①</sup> 余俊杰，刘中国. 白石龙书影人影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

和船坞的资料、日军防卫力量等情报。在华美军总部盛赞东江纵队联络处“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提供的情报“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的贡献”。东江纵队与盟军的合作，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赢得了国际声誉。延安《解放日报》著文赞扬东江纵队是“一支对同盟国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事业有卓著功勋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省港大营救取得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团结知识分子，以文化立国、以文化治党的现代文明政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知识分子、依靠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实践的历史课题。省港大营救既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统战实践的胜利，也创新性地推动了党的文化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深化了文化统战的内涵，丰富了文化统战的实践。研究省港大营救对文化统战理论与实践的贡献，总结其形成的对文化统战工作的一系列规律性的认识，对于开展新时代文化统战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第一节

#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界人士的团结争取工作。文化统战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在文化领域开展的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的团结争取工作，以及以正确的文化理念为引领，运用各种文化力量、借助各种文化手段开展的统战工作。文化统战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党以正确的文化理念为引领，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统战战略策略；二是党在文化领域以文化界人士为工作对象开展的统战工作；三是统战工作组织者运用文化力量和资源，以文化为手段和载体开展的凝心聚力的工作。文化统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大营救对文化统战的贡献，需要研究分析党在大营救之前对文化统战的探索。因为，省港大营救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重视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作为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同盟军的必然结果。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围绕党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党探索并逐步建立了文化界统一战线，并得到了不断扩大和发展，省港大营救之所以取得伟大的胜利，与党一直以来对文化统战工作的重视紧密相关。

##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对文化统战的探索

党是从新文化运动中走来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中，中国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党在初创时期就与文化界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联系。党在成立之初，虽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不多，但这一时期，党的创建人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在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上，做过积极的探索。

党的早期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做了初步的分析，认为知识分子与工农一样遭受压迫，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一样是革命阵营的主要力量。但是，知识分子又与一般的工农不一样，他们在中国革命中起着“先锋”或“连锁”作用。李大钊曾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在于“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知识分子地位和特点的认识不断深化，关注到了知识分子没有经济基础、政治立场动摇游离、思想自由散漫、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等弱点。如：1923年，瞿秋白在《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一文中把知识分子划为两类，指出“中国式的的环境里——那宗法社会的士绅阶级，当年或者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现在不由得他不成为社会赘疣——高等流氓，以政客为职业，以议员为职业——这是旧的知识阶级。那‘欧风美雨’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先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知识阶级。”<sup>②</sup>

<sup>①</sup> 李斌. 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 [N/OL]. 人民政协报, 2019-04-25.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9/0425/c85037-31048663.html>.

<sup>②</sup> 秋白:《向导》第18期, 1923年1月31日.

1924年11月，邓中夏发表了《我们的力量》一文。文章进一步分析了知识分子的状况，指出“知识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家庭已渐次贫困，一方面读书时固常觉得经济的压迫，又一方面毕业后亦感到社会地位的恐慌，于是也趋向于革命了。并且因其有知识之故又在为各阶级革命势力间之连锁，褒然为革命之中心人物，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便是其证。可惜他们没有经济的基础，只能附属于有经济实力的各阶级方有所成就，并且他们因经济条件之限制，使他富有浪漫、自由、无政府种种思想，亦不能集中其势力，亦是其大病。”<sup>①</sup>

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革命作用的是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中共四大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可造就的革命战士，大会号召工人和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阶级巩固自己的组织。在党的正式文件上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平列为革命的基本力量，知识分子开始被正确认定为中国革命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从而使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

毛泽东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小知识阶层具有革命性分析得更为透彻，文章讲到，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认为小资产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特别谈到在当时的环境里，小知识阶层的生活是下降的。认为他们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颇为重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因此，对这部分人要特别关注，并争取他们进入革命运动的队伍。

<sup>①</sup> 邓中夏，我们的力量，《中国工人》第二期，1924年11月。

党在早期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中得出的这些观点和认识，虽然多数没有形成共识并上升为政策，但初步显示出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框架，为以后建立文化界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 二 中国共产党文化统一战线的创建

在党的历史上，最早确立知识分子政策，开展知识分子、文化界统战工作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创建的文化界统一战线，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创建。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迫害进步文化团体和文化工作者，镇压左翼文化运动。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处于苦闷彷徨中，为了激发青年的革命热情，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传播进步思想，有力地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中国共产党决定领导和团结文化界进步人士组成文化新军。

1927年冬，一批共产党员团结创造社<sup>①</sup>和太阳社<sup>②</sup>的革命作

① 五四运动中的新文学团体。1921年6月8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赴日留学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多次在上海和日本协商，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的郁达夫寓所中，利用上海泰东图书局的一些条件，成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创作的基本倾向是反帝反封建和积极的浪漫主义。1929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其成员后来大多加入了左联。

② 太阳社是现代文学团体，1927年秋成立于上海。发起人为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杨介人等；主要成员有林伯修（杜国庠）、夏衍、洪灵菲、戴平万、刘一梦、顾仲起、楼适夷、殷夫、冯宪章、任钧、祝秀侠、迅雷、圣悦（李平心）、王艺钟、童长荣等。太阳社的主要成员大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从实际斗争中转移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有相似的斗争经历和共同的思想基础，在文学主张与创作上，也有些共同的倾向：积极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与斗争。

家，如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等，鲜明地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得到了因大革命失败而苦闷彷徨的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和响应，很快就传遍中国文坛。但是，由于倡导者们急功近利，没有认真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就一厢情愿地照搬照抄外国的理论做法，模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界限，把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又加上太阳社、后期创造社内部存在着宗派情绪，他们把“五四”新文学当作资产阶级文学而全部否定，把叶绍钧、郁达夫、鲁迅等知名作家当作批判对象。甚至在1928—1929年爆发了一场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战。党中央及时发现了问题，认识到文化界的团结十分重要，因此，决定要把上海的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共同与国内反动派做斗争。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1929年6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潘汉年为书记。文委成立后，极力推动左翼文艺界、文化界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尊重和听取鲁迅对发展进步文化运动的意见。

为加强党对左翼文艺界的领导，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停止内战，加强团结”的方针，并提出在上海筹备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经过党组织的充分酝酿、协调与筹划，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小组1929年10月中旬顺利召开讨论会。筹备小组会议由文委书记潘汉年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由潘汉年传达中央主张停止文艺界“内战”，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以及组建左联的意见。经过充分准备，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参会正式代表有40多人，包括鲁迅、夏衍、潘汉年、冯乃超、阳翰笙、冯雪峰、戴望舒、冯铿、柔石、殷

夫、王任叔、洪灵菲、姚蓬子等。<sup>①</sup>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鲁迅、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人为候补委员，并决定成立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萌芽月刊》《拓荒者》等刊物。<sup>②</sup>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对左联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sup>③</sup>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强调指出左翼艺术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

左联的成立，使文艺开始成为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随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和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文总是以左联和社联为核心的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文艺界工作者还努力和中间派合作，文化界统一战线队伍不断扩大。蔡元培、邹韬奋、陶行知、朱自清、叶圣陶、周信芳、徐悲鸿等都和左翼文化运动密切交往，活动地区由上海发展到北京、天

<sup>①</sup> 慕津锋. 从“论争”到“统一”：左联成立始末及其重要作用 [N/OL]. 文艺报, 2021-04-12.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412/c404063-32075183.html>.

<sup>②</sup>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华文出版社，2017.

<sup>③</sup> 宋欢迎. “左联”时期鲁迅的编刊活动研究 [J]. 中国编辑, 2021 (1).

津、武汉、广州等地，形成了一支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浩浩荡荡的革命文化大军<sup>①</sup>。

左联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在组织上，左联接受文委的领导。左联在国民党政府残酷压迫下顽强战斗了6个年头，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军事上的反“围剿”斗争。左联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革命文艺大军，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人民文艺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人才。左联为建设人民大众的革命文艺做出了卓越贡献。1936年初，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行解散。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6年，但是它以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统战史上的丰碑。

### 三 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大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提出建立团结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文化界统一战线得到了系统化、制度化、理论化的大发展。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于10月1日全文发表。由于文件注明日期为1935年8月1日，所以一般通称为《八一宣言》。该文件向全国各界、各阶层、各党派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指出：“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

<sup>①</sup>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华文出版社，2017.

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sup>①</sup>《八一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抗日的党派和团体、爱国侨胞、被压迫民族的兄弟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的范围。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指出：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他们过去是否是国民党员或在国民党政政府工作，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不问他们的出身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苏维埃给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sup>②</sup>知识分子与其他爱国阶层一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边区延安，党把知识分子问题看作关系革命成败的大事，及时做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

---

① 《八一宣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新转变 [EB/OL].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5-08-01.17:55). [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1058352/c0b87tZ-1SCjmuHhlnddfeg2O\\_Yysax3unsicS-x0aqCBaiamx1nwtWn5IDd2R4vhZmZuJ3I8jXv5jOivIt3x95FXEqDUxJmWR5jL0qsufSb\\_gljK9inNA](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1058352/c0b87tZ-1SCjmuHhlnddfeg2O_Yysax3unsicS-x0aqCBaiamx1nwtWn5IDd2R4vhZmZuJ3I8jXv5jOivIt3x95FXEqDUxJmWR5jL0qsufSb_gljK9inNA).

② 张锋. 锻造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简述抗战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J].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 (1087).

件之一”。<sup>①</sup>1939年12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呼吁“抢夺”知识分子：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了就没有了。<sup>②</sup>按照“发展党员、选拔干部”的思路，大胆培养和使用知识分子，关心和优待知识分子。一批干部学校先后创办起来，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培训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民族学院、卫生学校等，培养了大批干部。同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党、军队、政府、群众团体工作，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发挥了革命的先锋和桥梁的作用，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力量，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吸收入党，为党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加强党报党刊、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等舆论阵地建设，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

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了文化统战的概念，即“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sup>③</sup>为了更好地吸引知识分子，党制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政策。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下，国统区知识分子掀起一场“走向延安”的高潮。陈云说，我们党“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同各方面“抢知识分子”，最终“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据资料显示，1940年初，延安聚集了知识分子约4万人。不少知识分子克服种种困难，从国统区、大城

①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8，620.

② 1938年陈云掌管中组部：中共党员从4万猛增到50万 [EB/OL]. (2015-05-12). [news.cnr.cn/native/gd/20150512/t20150512\\_518527440\\_1.shtml](http://news.cnr.cn/native/gd/20150512/t20150512_518527440_1.shtml).

③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9.

市纷纷奔赴圣地延安，很多热血青年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sup>①</sup>

在国统区，党中央指示驻守在重庆的南方局广泛团结文化界人士，开展文化救亡和抗日宣传运动。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和策划下，南方局把大批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中华剧艺社，上演进步戏剧。当郭沫若因创作《屈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种种攻击和迫害时，周恩来挺身而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道义上给以支持，在安全上进行保护。南方局大力支持老舍主持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团结了一大批著名作家、导演和演员，培育了许多文艺新秀。面对皖南事变后的险恶环境，南方局对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把大批进步作家等文化人送到延安或者香港，成立以廖承志为首的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加强党对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香港，周恩来指示有关同志尽快将留港的文艺工作者转移到安全地带，开展了惊心动魄的省港大营救。

省港大营救是中共党史上文化战线的著名事件。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了文艺的重要作用，强调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省港大营救正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重视、关心知识分子，团结文化界人士建立和发展文化界统一战线生动写照。如果没有党一贯以来重视文化战线，就不可能有省港大营救的伟大胜利。省港大营救不仅保护了中华民族一批精英人士，而且对后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革命文化工作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以及新中国的成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sup>①</sup> 本书编写者. 中国共产党简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95.

## || 第二节 ||

# 中国共产党在大营救时期对文化统战的探索

省港大营救之所以被称为“最伟大的抢救”，是因为它不仅仅是意味着几百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虎口脱险，无一伤亡的营救结果，而且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统战思想的伟大胜利。大营救期间及其前后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做好文化人士工作做了积极探索，从战略意涵、工作范围和策略手段等方面极大地深化了党领导的文化统战思想的内涵。

### 深化了文化统战的战略意涵

省港大营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统战谋略和统战实践。省港大营救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从根本上来讲，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联合和保存文化界进步人士，充分利用知名文化人士的号召力、影响力，凝聚文化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心，汇聚文化界乃至社会的进步力量的特定工作。这一生动的文化统战实践，使党的文化统战工作有了更为深刻的战略意涵。

###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凝聚文化界人士的共同基础

统一战线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的。所谓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统一战线成员共同追求的方向和目标。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越牢固，凝聚的共识就越广泛，就越能汇聚起为共同目标奋斗的磅礴力量。没有这个基础，人心就会乱，力量就会散，就没法形成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并建立团结包含文化界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以及海外华侨在内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这个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抗日救国这一正确政治主张和道路。在抗日救国这面旗帜的召唤下，各党派、各阶层放下政治偏见，捐弃前嫌，团结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在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顺应时势变化，高举民族大义旗帜，把抗日救国确定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中共中央和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先后发表宣言，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的正确政治主张，与蒋介石奉行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蒋介石不但没有以民族大义为重，还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对共产党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人心逐步丧失。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抗日救国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从1931年提出的反蒋抗日，到1936年西安事变的逼蒋抗日到西安事变和平解

决后的联蒋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整个中华民族一切爱国力量在内的统一战线。它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以及除了汉奸、投降派以外的地主阶级和亲英美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广泛的联盟。

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把抗日救国作为重要战略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一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目标符合包括文化界在内的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深得人心，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建立文化界统一战线，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以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为最大公约数，吸引了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界人士凝聚在共产党的周围。在共产党“抗日救国”这面旗帜号召下，广大知识分子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挠，走向心中的“圣地”，与共产党建立文化界统一战线，与日本军国主义做最后的斗争。省港大营救中几百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听从党组织部署，服从游击队的营救安排，同心协力，克服种种困难，充分体现了文化界人士对共产党政治主张的认同和信任。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统一战线，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理念基础上的，只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找到文化界人士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形成汇聚文化界人士力量的共识，结成强大的统一战线。这是省港大营救对文化统战思想的巨大贡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共识，中国共产党更是顺应时势要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旗，以此吸引广大知识分子，广聚英才，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 （二）尊重照顾文化人利益是文化统战的重要原则

省港大营救是中国共产党关心照顾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一次英明决策和成功案例，它是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界群众血脉相连，不忘初心的集中体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人的高度重视、信任和关心爱护。

与同盟者结成统一战线，首要前提是信任同盟者，并给同盟者应有的政治地位。省港大营救就是基于党对文化人政治地位的正确认识之上的。皖南事变后，大批文化人从内地转移到香港，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党内存在着对这些文化人不信任的情况。为解决当时文化人到香港之后带来的矛盾和争论，做好团结、争取文化人的工作，香港党组织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在党内进行统一战线的理论教育，加强对各党派、团体以及上、中、下层的统战工作，克服统战工作中的短期行为，特别是争取大量吸收文化界的左倾分子入党，有计划地培养与领导非党文化工作干部。1941年5月7日，周恩来给廖承志发了一封电报，指示“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及党与非党干部”，要有正确的态度，强调了“三个不能”：第一，不能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他们已进步了，已经过一次考验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他们，因他们已经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从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衡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因为他们终究是做上层统战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留有一些文化人的习气和作风。周恩来强调，文化人的这种特性“虽高尔基、鲁迅也不能免的，何况他们乎”。周恩来在电报里还强调，毛主席告诫大家要“重视这支文化统战上的力量，因为他们正是群众革命精神的宣传者和颂歌者”。他指示廖承志他们“必须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眼光、态度和尺

度”<sup>①</sup>包容文化人，帮助这些文化人取得进步。并告诫做文化统战工作的干部对待文化人既不能放弃原则性要求，同时也要尊重文化人的多样性，党对文化人的信任，激发了文化人抗日救国的热情和工作主动性。邹韬奋、茅盾等在《我们对于国家的态度和主张》中这样写道：“我们无时不准备重返祖国，今虽身在海外，亦不愿自安于明哲保身，始终坚守文化岗位，追随海内外同胞之后，力争祖国之进步与光明！”<sup>②</sup>

党中央不仅在政治上信任在港文化人，充分尊重和包容他们的多样性，而且十分重视文化人的人身安全和生活。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在撤退干部的同时，“党外同情分子也应立即通知他们分批转移到南洋、香港，并助其旅费”。周恩来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党和非党干部及所联系的同情分子的撤退、疏散和隐蔽，做了慎重周密的分析研究，拟出党和非党干部部分人员撤留安排的名单，对聚集在重庆、桂林的著名文化人，具体分析了每个人的情况和处境，做出了决定：留下部分同志在重庆、桂林坚持工作，如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欧阳予倩等，他们在社会上名望很高，国民党一时还不敢轻率动手；大部分需要撤退转移的，责成文委尽快动员安排去香港、延安、苏北和南洋以及内地各县。仅1月至5月，安排离渝的达100多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十分关心这些人的安全，强调要不惜任何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区。周恩来亲自指挥，一一过问并做撤退的安排，如：指示将香港文化人接到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

① 吴德文. 宝安香港大营救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182.

② 吴德文. 宝安香港大营救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49.

后集中桂林，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可来重庆，戏剧界朋友可要夏衍组织一个旅行团，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1942年3月12日，周恩来致函郭沫若，请他约老舍一起，会面共商对到达广西的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济办法。3月17日，周恩来电示方方、张文彬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去上海的人数应减少到最低限度。邹韬奋夫人及子女可暂住桂林，我们按月送津贴，邹本人去苏北转华北。”4月9日，周恩来在听取夏衍关于香港沦陷时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离情况的汇报时，特别关注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当得悉国民党下令通缉邹韬奋后，周恩来立即电告连贯，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以后，通过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邹韬奋暂时避居于广东梅县江头村。7月，周恩来派人转告邹韬奋：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并使他能为革命继续发挥作用，建议他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还可以转赴延安。不久，邹韬奋被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6月14日，周恩来写信给柳亚子，关心他的安全和生活，希望他“重整南社旧业”。南方局除了对文化人士进行力所能及的资助外，周恩来还指示《新华日报》呼吁当局保障和改善文艺作家的生活：“提供稿费版税，要求政府予有计划的实际帮助”，同时提出“爱护文艺作家，器重文艺作家，培养和提拔文艺作家，给文艺作家以实际帮助，不仅是文艺界同仁本身应该奋斗的事，而且也是‘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不可分离的任务”。省港大营救以及整个抗战时期，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文化界人士及其他抗战朋友经济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心，一直没有间断过。正是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感动了广大文化界人士，许多中间人士由误解共产党到了解共产党，靠拢共产党，最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正如张友渔在1985年4月29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这次抢救工作，充分体现了战争年代中国共产

党同革命知识分子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

### （三）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是党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

广纳天下贤士，团结各派意见，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坚定的战略方针。保护抗日进步文化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年代的战略策略，决非权宜之计。

省港大营救根本目的就在于把陷于虎穴的文化人抢救回来，保存好中国的文脉，保护好抗日进步人士和进步文化，发挥他们在抗日战争中“人民的笔杆子”的先驱作用。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脱险以后，继续在全国各地开展抗日爱国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他们又不顾国民党的迫害，投入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经过长期合作，他们更加相信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信得过的，是可以同舟共济的朋友。夏衍在1985年回忆省港大营救时不无感慨地说，省港大营救是我们党史、军史上的一件难忘的大事。岁月流逝，年复一年，大营救已经是四十五年以前的事了，被营救出来而还活着的人，永远忘不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往事，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大营救也以生动的事实，说明了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事，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1947年，为了躲避蒋介石的迫害，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又一次聚集到香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们又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在党组织的秘密护送下，再次从香港北上，大转移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建国。全国解放后，许多当年从香港脱险出来的文化人，都担任了中央及地方各

种文化艺术部门的领导工作，继续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党中央坚持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为知识分子工作总方针，党的十六大又提出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16字方针。2017年3月4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时表示“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知识分子。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在中华民族驶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航程中，更应广聚天下英才，广纳天下贤士，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为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航程中提供强劲的文化动力和人才支撑。

## 二 开拓了文化统战工作的范围

省港大营救的深远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它延续了中国文化的血脉，而且在于它拓宽了党领导的文化统战工作的范围。党在这一时期把文化统战工作的范围从国统区大后方延伸至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澳门地区乃至海外，对推动全民抗战起到重要作用。

### （一）开拓国统区的文化统战

省港大营救与党在国统区大后方的文化统战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在国统区的文化统战工作为省港大营救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大后方的环境十分复杂，共产党在大后方无法以政权的形式与力量来实现自身的文艺主张，要想成功地实现共产党在文化抗战上的影响，推动国民党抗战，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在组织建设上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来实现对文化抗战工作的领导权。

1940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强调国统区开展抗战文化运动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明确要求：“如何在各个文化部门中（理论的，政治的，学校的，社会的，文学的，艺术的）推广和深入这个运动，希望国民党区域的党部加以切实的研究”。<sup>①</sup>为贯彻中央精神，10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南方局内部成立了专门负责文化工作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在周恩来的直接推动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也设立党的组织，周恩来明确指示：三厅上面的主要干部成立一个党小组，下面的党员另外成立一个党支部，互相不要发生联系。万一发生了问题，就不致互相影响。三厅领导干部党小组由周恩来亲自掌握。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是国统区公开的合法的政府文化机构。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党牢牢地掌握了国统区文化抗战的主阵地。

为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有党领导的文艺运动的重要思想文化舆论阵地，充分发挥喉舌作用，在周恩来领导下，先后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创立了《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新华日报》创刊时，周恩来为它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它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

<sup>①</sup> 熊爱军. 周恩来领导国统区文化抗战轶事 [J]. 世纪风采, 2015 (9).

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周恩来亲自规定《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审阅重要稿件和社论，还常一丝不苟地帮助修改稿件，连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亲自撰写社论、专论、代论和新闻。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先后为《新华日报》撰写的文章有58篇、题词11次，在《群众》周刊发表文章13篇。<sup>①</sup>

《救亡日报》和《华商报》也是在周恩来指导下创办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早在抗战初期，周恩来要夏衍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强调指出工作方式可以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还谈到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党报。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指示夏衍协助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提出要把该报办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他希望《救亡日报》能够担当起“巩固和扩大救亡阵线，动员起千千万万的群众”的责任，以独特的风格来“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周恩来还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夏衍努力贯彻周恩来这个指示，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等地出版发行《救亡日报》，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皖南事变后被迫停刊。夏衍抵达香港后，也把在大后方的文化工作经验带到了香港，办报刊继续宣传抗战文化，成为抗日先锋。

## （二）巩固香港文化界统一战线

为保护在港文化人，中共努力争取港英当局的支持与合作。

<sup>①</sup> 熊爱军. 周恩来领导国统区文化抗战轶事 [J]. 世纪风采, 2015 (9).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英国殖民管治下的香港是一个政治环境十分特殊的地方，英国与日本和中国政府都有着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当中日战争爆发后，港英当局宣称“保持中立”。这就使得中共可以利用港英当局的“中立”态度，在香港半公开地进行活动。如：成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对外以“粤华公司”名义，以经营茶叶买卖作为掩护。夏衍等人来到香港后，办事处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专责香港、澳门和南洋各地的文化工作和报刊工作。同时，由于港英当局宣称“保持中立”，即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人士在香港推动抗日新文化运动，但与港英当局之间也没有过多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日军进攻香港，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与日本之间矛盾突显，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中英两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保卫香港地区的安全，中国共产党与港英当局为防卫日军入侵香港进行了商讨。实际上，在日军进入香港之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就专程前往香港，通过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将日军即将进攻香港的情报告知港英当局，1941年12月初，港英当局终于同意与中共进行商谈，通过英国记者贝特兰向中共驻港人员提出，希望与中共代表会晤，商讨协同防卫香港地区的问题。中共方面代表廖承志、夏衍、乔冠华，与港英当局代表布政司金逊进行了会谈。中共方面明确表示，东江抗日游击队可以发动新界民众，协同英军保卫港九地区，英方应提供必要的武器弹药。金逊当即表示会立即报告港督杨慕琦，尽可能满足游击队的要求。虽然此事因为港英当局的顾虑不了了之，但是这次商谈是中共方面为了争取港英当局为防卫香港而做出的努力，彰显了中共为保护文化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利益的担当。

在党的领导下，香港文化人团结一致结成统一战线，同心协

力防卫香港。在香港沦陷前，面对日军对中国的大肆侵犯，在港文化人就集会声援中国的抗战。1939年，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支持下，举行了“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大会，数千人参加，宋庆龄、何香凝也出席集会并发表演说。但是，港英政府在日本的施压下，派人搜捕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逮捕文化人。萨空了在《香港沦陷日记》的再版前言中记录：“许多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怀着同仇敌忾的心情，志愿参加香港的防护团，准备和英军一起奋勇迎战。不少知识分子谋求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群策群力解救香港的危难。”<sup>①</sup>在日军进攻香港之初，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港文化界人士就一再呼吁港英当局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抵抗日本侵略者。

当大营救开展后，在港文化人更是空前的团结，听从安排和指挥，意志得到了淬炼，觉悟得到了提升。邹韬奋从香港被营救出来后暂住白石龙，在一次与东江游击队队员的谈话中，他自喻是跟随“文化游击队”从香港转移阵地归来，他说游击队的武器是枪，可以打日本鬼，保家卫国，文化人的武器是笔，可以不停地写，替人民的部队宣传。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并表示今后一定要把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

省港大营救就如“文化播种机”，大批文化艺术界精英聚集在东江游击区，这成为广大干部向文化人学习的难得机会。不少文化精英也把自己在游击区的短暂停留，看作是锻炼自己的机会。据杨奇的回忆，当时，部队正好开设了一个军政干部训练班（代号叫华南队），另外还为初到游击区的青年开设了一个青年训练班，于

<sup>①</sup> 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深圳市宝安区史志办. 宝安香港大营救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76.

是，就有好几个文化人被邀请到班里讲课。如：邹韬奋讲授的题目是《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胡绳讲授哲学，沈志远讲授政治经济学，黎澍讲授中国革命史，戈宝权讲授《社会主义苏联》和《苏联妇女运动》。<sup>①</sup>

省港大营救同时也是流动的“抗日宣传机”，有些文化人在宝安游击区停留期间，还直接参与了部队对外的抗日宣传等政治工作。如：胡绳、黎澍、肖敏颂等就曾经为游击队草拟了《坚持团结抗战的告示》，发表在《东江民报》上，并张贴在宝安、东莞、惠阳各个圩市中。为了争取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不打内战，他们还替尹林平、曾生等军政首长写了《告余汉谋书》，敦促他坚持抗战，与抗日游击队互不侵犯。<sup>②</sup>

省港大营救的过程也是文化人理想信念的树立过程。邹韬奋隐居梅县山区的江头村，一面调养身体，一面闭门读书，还研究了东江一带的革命历史，在学习研究中，升华了理想信念，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sup>③</sup>

### （三）文化统战向港澳和海外延伸

在紧急营救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同时，香港党组织动员了大批坚决抗日的港澳青年回内地参加曾生领导的东江游击队。他们当中一部分人随着文化界人士一起来，一部分人由交通员单独带来，使抗战文化队伍不断壮大。根据曾生后来的回忆，从1942年1月到4月，约1000人回来。他们中有工人、学生、职

<sup>①②</sup> 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深圳市宝安区史志办. 宝安香港大营救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54.

<sup>③</sup> 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深圳市宝安区史志办. 宝安香港大营救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72.

员、医生等各行各业的人。<sup>①</sup>为提高港澳青年的作战水平，培养部队干部人才，专门成立了干部训练队，训练内容有列队训练、站岗、放哨、游击战术、部队政治工作等。邀请了文化界人士给训练队做报告。训练结束后，他们中大多数被分配到各地担任文化教员，也有一部分分配到民运队、医务所、报社、税站和交通站等单位，有的派遣回香港、九龙工作。这些港澳青年有专业知识、抗战意志坚决、工作热情高昂，分配工作后，大多数很快成为各单位的骨干。此外，党组织和游击队通过营救文化人的路线，还护送了1000多名港澳青年学生经过东江游击区，转到韶关、桂林和重庆等地求学和工作。同时，还护送了近万名香港同胞、侨商、侨眷离开香港，经过游击区安全回到内地。这些都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港澳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和吸引力，团结了一批港澳青年，壮大了统一战线阵营。

在对文化人开展大营救的同时，还营救了一批国际友人。1941年12月25日英军战败投降后，驻港的英国、加拿大籍官员、印度籍警察等都做了俘虏，过着悲惨的战俘生活。为了营救国际友人，东江游击队派人潜入香港把他们营救出来。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冬日军占领香港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止，东江游击队（1943年底改为东江纵队）一共抢救了89位国际友人，其中包括英国20人、美机师8人，印度54人，丹麦3人，挪威2人，俄国1人，菲律宾1人<sup>②</sup>。这些被营救的国际友人回国后对这次营救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信念和能力，在国际上树立了

<sup>①</sup> 刘中国，余俊杰. 白石龙大营救文献 [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106.

<sup>②</sup> 转自《宝安香港大营救》第222页，见1946年2月19日香港《华商报》东江总队营救国际友人统计。

党的形象和威望，对于团结一切热爱和平、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国际友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较早脱离日本集中营经过东江游击队护送到后方的英国赖特上校，回到后方向英国军事当局建议组织一个营救战俘的团体，经英国国防部批准，成立英军服务团。1942年7月，英军服务团前方办事处在惠州成立。东江游击队紧密协助英军服务团开展营救工作，他们在日军严密控制下，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英军服务团建立情报站，研究营救国际友人的办法，并布置秘密交通线，指导英军服务团关于秘密工作和坚持地下斗争的艺术。同时，英军服务团在新界游击区建立联络站。这些工作使东江游击队的国际声誉日隆。1977年赖特上校去世后，他儿子爱丁把赖特保留的关于英军服务团的资料 and 文件写成厚厚的一本书，名为《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五年抗战时期的英军服务团》，198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书中对东江总队港九大队在最危急和困难中，从日寇魔掌中抢救了约2000人的事迹倍加赞扬，给予高度的评价。

大营救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提高了共产党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声誉，也为巩固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东江纵队司令曾生后来在战斗总结中写道：省港大营救不仅拯救了中国一代精英人物的命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这次任务中得到锻炼，成长壮大，成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

### 丰富了文化统战的策略手段

如何运用策略手段是文化统战工作的重要内涵。省港大营救及其前后期间，党中央立足全局，从战略高度分析中外形势，充分发

挥香港独特的对外窗口优势，灵活运用各种策略手段，采取与内地有所区别的方式、方法和策略去开展文化统战工作，其成功的经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 （一）设立工作机构领导文化运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党中央就已经十分重视香港这个特殊的抗战文化运动地区，领导在港文化人通过建立社团组织向海外华侨开展抗战宣传、募捐等活动，支持国内抗战。如：1938年初，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支持、协助下，宋庆龄建立以“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援助”为宗旨的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任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廖承志任秘书长，一些国家的著名文化人参与其中工作。1938年6月，在保卫中国同盟的资助下，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成立，其主要成员有丁聪、李凡夫以及旅港的宝安县画家陈烟桥等，多次举办漫画展览，宣传抗日救国。1939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成立，展开各项文艺活动，宣传抗日救亡。其会员有许地山、茅盾、戴望舒、乔冠华、杨刚、叶灵凤、夏衍、陆丹林、林焕平等。这些文化团体，在宣传团结抗战，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投降以及反顽固派等一系列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香港的政治状况十分复杂，文化战线上的抗日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日趋激烈。随着夏衍等一大批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从大后方疏散到香港，党中央为了更好地领导全港抗战文化运动，决定把领导文化统战工作的机构从国统区延伸至香港。廖承志、潘汉年于1941年3月着手建立领导全港抗战文化运动的机构，并致电周恩来和党中央，提出建立党的统战文化委员会等建议，5月，经中央同意，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

绳、张友渔五人组成，下设文学、新闻、学术小组，各小组又分别组织文艺、戏剧、学术、新闻、国际问题和妇女问题座谈会。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党在香港有了对外宣传工作的基地，对于加强对香港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推动香港抗战文化的发展，建立香港文化界统一战线意义十分重大。周恩来曾于1942年6月21日就南方局领导香港文化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认为皖南事变前香港文化运动只限很小的下层活动，自从重庆大批文化人到港，才有新的展开。

## （二）创办进步报刊建立文化宣传基地

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化刊物可谓鱼龙混杂，各种势力都在这里办报刊占领舆论宣传阵地，日本在香港办有《香港日报》，汪伪政府有《南华日报》和《天演日报》，日、伪通过办刊，加紧进行反共宣传以及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活动。而国民党顽固派则加强新闻检查和邮查，查封内地各地的生活书店，致使港澳和海外读者看不到《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同时国民党特务又千方百计收买投机文人，深入香港报刊，建立各种社团到处活动。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致电廖承志，要求在香港建立我们自己的宣传据点，出版一张我们的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等地去。

于是，廖承志与邹韬奋、夏衍、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羊枣、张明养、胡仲持等文化人商讨，决定创办一份主张“团结、民主、抗战”的、又区别于《新华日报》的报纸。1941年4月8日，《华商报》正式创刊，邓文田任总经理兼督印人，邓文钊任副总经理，范长江任副总经理并支持日常工作，政治上由廖承志领导，夏衍、张友渔、邹韬奋、胡绳等参与了《华商报》的撰写工作。

从此，香港上空高挂着“一盏明灯”引领着文化人前进的

方向，《华商报》与香港文委成为当时香港文化宣传的重要基地。在《华商报》的影响下，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笔谈》、梁漱溟负责的《光明报》等30多种进步报刊陆续如雨后天春笋般创建起来，出版机构也由寥寥数家猛增至50多家，印刷厂多达500多家。此外，还加强了对华侨的统战工作，党组织派胡愈之等到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地，创办华侨抗日报刊。

### （三）通过文艺创作讲好抗战故事

有了文化宣传的基地和载体，还必须有合适的宣传内容。香港党组织十分重视引导文化人创作话剧、小说、电影、音乐、美术等文学艺术作品的方式，传播中国抗战声音，讲好中国抗战故事。

1941年夏，苏德战争爆发，日军加紧南进，中央指示香港文委要开展推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宣传活动。1941年秋，在保卫中国同盟主持下，旅港剧人协会上演揭露希特勒纳粹党迫害犹太人罪行的《希特勒的杰作》。首演时，宋庆龄与许多国外友人及在港中外文化界人士观看演出，一时间盛况空前，掀起了话剧运动的高潮。

在港的进步文艺刊物大量发表来自全国各地作家创作的文学小说和诗歌。如：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以特有的幽默笔法描写了一个在抗战中出现的“新人物”，想包办救亡运动的国民党“抗战官”，这篇作品标志着抗战文艺开始由初期轰轰烈烈的空洞的局面而向现实主义深入。姚雪垠的短篇小说《差半年麦秸》，刻画了一位善良、老实、受迫害的农民变成英勇的抗日战士的经过。旅港作家也创作了大量作品，如：许地山的《玉宫》《铁鱼的鳃》《桃金娘》《萤灯》，茅盾的《你往哪里走》《腐蚀》；杨刚的《伟大》《桓秀外传》《我站在地球中央》，萧红的《后花

园》《北中国》《小城三月》《呼兰河传》，骆宾基的《人与土地》《仇恨》；端木蕻良的《高坝》《新都花絮》《大江》《大时代》，夏衍的《春寒》，等。

电影是这个时期宣传抗战文化的重要方式。1941年初随着更多的电影工作者转移到香港，党加强了对进步电影的指导，在大观电影公司成立了两个党支部，由连贯、于伶负责，成员有李枫、邝任生、周钢鸣、罗志雄、冯一等。同时成立了大观电影公司剧本审查委员会，以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于伶、章泯、叶以群、周钢鸣等为委员。大观电影公司先后拍摄了《小老虎》《民族的吼声》《流氓之歌》等。这些电影的播放对于宣传抗日救国、树立民族自信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音乐、美术也是这个时期宣传抗战文化的重要方式。《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喀秋莎》等革命歌曲在香港得到传唱。全国漫画协会香港分会积极推动以美术的形式宣传抗战，在《华商报》开辟《新美术》副刊，选编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的《团结抗战大画册》，揭露汪伪卖国投降的《如此汪精卫》漫画册，并举办了规模较大的以抗战为主题的现代漫画展。由于党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式，抗战声音传遍香港，香港成为华南地区辐射海外的抗战文化运动的主要据点。

总之，党对香港文化人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在理论上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文化统战思想，对文化统战的战略意涵、文化统战的工作范围和文化统战的策略手段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使党的文化统战思想得到了升华，为后来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和文化统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 第三节

## 省港大营救深化了文化统战的思想内涵

省港大营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取得胜利的，特别是在日军对文化人虎视眈眈，港英政府无力保护，国民党不但无法营救而且还对其中一些进步文化人进行抓捕的残酷背景下，唯有共产党挺身而出，保护了这批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它再次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 坚持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是文化统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坚持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是文化统战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大营救再次证明的规律性认识。当得知在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深陷险境之时，中共中央果断做出决定，并指示要制定详尽的营救方案，不惜任何代价组织营救，确保在港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这与国民党顽固派派人到香港抓捕文化人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香港党组织、广东党组织以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对大营救进行精确部署并全力投入，最终取得大营救的胜利。

坚持党对文化统战工作的领导就是突出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确保文化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工作的政治方向，引导广大知识分子深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亦如此。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的奋进史中，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坚持对文化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工作的政治引领一直是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党始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心，用科学真理和实践真知加强文化界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

坚持党对文化统战工作的领导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环境的开放性使得知识分子队伍呈现出结构多样化、思想多元化等特点，迫切需要强化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引领。加强党对文化统战工作的领导，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帮助其坚定理想信念，明确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以此凝聚广泛共识、汇聚磅礴力量，是保证新时代知识分子工作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聚才爱才兴才的必由之路。

## 广泛团结知识分子是文化统战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历来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以文化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为主要工作对象的文化统战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在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是抗日救国不可替代的先驱分子，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要社会力量。

他们为了躲避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撤离国统区前往香港，他们到香港后，组建新的文化阵地，开展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他们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基础力量，对他们的营救和保护，实则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营救和保护，也是对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反对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命内战、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力量的营救和保护，更是对建设新中国知识分子人才力量的营救和保护。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其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中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sup>①</sup>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作为统一战线成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改革开放后，包括党外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工人、农民共同构成了统一战线的重要基础。

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日益凸显。他们人数多，作用大，影响广。党外知识分子不仅数量大幅增加，而且构成更加多样，思想更加多元。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党外知识分子数量、比例大幅度增加，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留学人员人数增加，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一个特殊的重要群体。党外知识分子不仅发挥着统一战

<sup>①</sup> 毛泽东论统一战线：知识分子工作 [EB/OL]. (2014-02-26). <https://www.rmzxb.com.cn/dpsy/tzll/2014/02/26/297888.shtml>.

线人才蓄水池的作用，还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发挥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方面军、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思想库、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服务团、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的观察站等作用。知识分子作为生产力的开拓者、文化的创造者、知识的传播者，不仅影响着社会生产力发展，也影响着社会舆论和价值观念；不仅影响物质文明建设，也影响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影响着今天，更影响着明天。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进一步凸显，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更加活跃多元，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任务更加繁重，地位更加突出，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做好以党外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文化统战工作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更加突出。

### 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文化统战的新使命

省港大营救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文化理念为引领，这就是高举抗日救国大旗，深得国内民众拥护，高举国际反法西斯主义大旗，深得国际社会的认同，省港大营救成功地树立起了把国内文化统战和国际文化统战相统一、以文化统战反对文化霸权的典范。这对新时代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进入新时代后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价值理念，是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

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sup>①</sup>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凝聚广泛力量支持中国的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和使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文化统战的使命任务。

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防范抵御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任务更重。必须增强文化自信，通过正确的思想政治引领，影响和团结广大海外同胞和国际友人，加深对友好中国的认同，涵养海外知华友华力量，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通过文化统战工作，发挥广大知识分子作用，讲好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结成了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命运共同体”，追求“协和万邦、四海一家”的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反对文化霸权，不进行强加于人的文化输出，不谋求文化霸权的传统，从而澄清西方的负面舆论误导和误解，粉碎西方国家企图利用民族、宗教、人权等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进行不实的甚至是曲解性、妖魔化的“抹黑”图谋，有效化解我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和挑战，在中西不同的意识形态交锋和较量中结成最广泛的海内外文化统一战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增进国内人民对国家、民族、执政党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增进海外华侨华人、国际友人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迫切愿望的理解和认同，团结积极因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和平稳定发展环境，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推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sup>①</sup>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第1页。

#### 四 统战干部的忠诚与担当是开展文化统战的关键

省港大营救的线路是一条在港文化人的生命通道，这条生命通道既经过日伪军设卡阻拦的地区，也经过军警密布四处搜捕文化人的国统区，然而，几百名文化名人及其家属全部得以安全转移，堪称奇迹。关于支撑起这个奇迹的原因，2021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广东党史》原主编王国梁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这样回答：“奇迹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一是各级党组织站位正确，均把营救行动当成神圣的任务去完成；二是中国共产党策划营救行动的领导人深入透彻分析敌我双方形势，组织严密、方法对头；三是参与组织筹划营救行动的党负责人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坚强有力，忠心耿耿；四是东江特委武装力量与地方党组织紧密配合，不畏艰险地力保护送工作。”<sup>①</sup> 奇迹背后的原因就是各级党组织及干部的忠诚与担当。从省港大营救的决策者、策划者、组织者以至于游击队的一般队员、交通员，在营救路线所经之处，无不体现了他们的忠诚与担当。他们忠诚于党，服从党组织的命令，践行自己的誓言，宁愿牺牲自己甚至亲人的生命，也要牢牢地支撑起这一营救文化人的生命通道，以保证被营救者的万无一失。廖承志、张文彬、尹林平、连贯、乔冠华、李少石、廖梦醒、潘静安、卢伟如、廖安祥……一个个跃然纸上的名字，令人肃然起敬。如：廖承志为了营救文化人士，部署营救路线，抛下老母亲和有身孕的妻子，身先士卒第一批撤离。就在营救计划进行的途中，1942年5月被国民党特务抓获，国民党费尽心思企图利用金钱美女

<sup>①</sup> 揭秘“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妙设枢纽 雁过无痕 [EB/OL]. (2021-07-15). [https://www.gdszx.gov.cn/tj/lnws/content/post\\_25518.html](https://www.gdszx.gov.cn/tj/lnws/content/post_25518.html).

等诱饵引诱他签字脱离共产党，但都被他严词拒绝。在监狱期间，廖承志曾给周恩来写信，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张文彬被国民党特务抓捕，但始终没有背叛党组织，最终被残酷杀害……在参与省港大营救的人中，历史记载下来的有名有姓的不少，但更多的是无名英雄。他们展现了文化统战干部非一般的精神品质，那就是：忠诚于党、勇于担当、冒险犯难的革命精神；过硬的对敌斗争能力和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发动群众、争取多方支持的动员能力；身先士卒、胸怀宽广、凝聚人心的感召力。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后来者，成为文化统战历史上的精神丰碑。

统战干部的忠诚与担当是开展文化统战的关键，这是省港大营救对新时代文化统战的重要启示。新时代，文化统战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对统战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强调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坚决纠正‘四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引导统战干部担当作为，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团结联系，对党外人士待之以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助之以实，做到诚恳谦和、平等待人、廉洁奉公”，“打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统战干部队伍”。<sup>①</sup>因此，新时代文化统战工作干部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胸怀“国之大者”，正确认识文化统战的重要性，善于与知识分子打交道，提高交友联谊的本领，做好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为广聚天下英才，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汇聚起磅礴的力量。

省港大营救取得胜利已经整整80年，它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一座永远的丰碑，其丰富的文化统战思想必将在新征程上继续发扬光大。

---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法律出版社，2021年3月版，第26页。



当日本侵略者占领香港时，中国共产党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全力营救在香港开展抗日救国工作的大批文化名人，并将其全部安全地转至东江游击区。这一场历时近一年、转战粤港澳三地的大营救，不仅保护了一大批承载中国千年文脉的文化精英，而且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界和文艺界爱国民主人士中的威望，是中国共产党以文化人为对象开展统战工作的一个典例。时隔80年后的今天，在粤港澳这片曾经播撒和传承过红色火种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正通过“人文湾区”的建设续写着文化统战的新篇章。



## 第一节

# 人文湾区建设是文化统战的新实践

2019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明确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共建人文湾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粤港澳三地的文化建设既谋划着新的发展蓝图，也肩负着新的时代使命。以粤港澳人文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建设为抓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文化形象标杆，是将大湾区的文化发展战略纳入顶层设计的统筹考量，也是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生活力、凝聚湾区文化认同、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人文湾区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人文指向性更强、针对性更鲜明的概念，人文湾区建设是文化统战的新实践。

## 一 粤港澳三地共建人文湾区的要点

《纲要》从“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和“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四个方面提出粤港澳三地共建人文湾区的要点。

首先，通过坚定文化自信、塑造大湾区文化软实力、弘扬廉

洁文化，塑造大湾区的人文精神。《纲要》指出，坚定文化自信，需要粤港澳三地发挥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共同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岭南文化的传承发展，为大湾区的交融与合作提供共同的文化基础。近代以来，因长期处于不同的政治制度之下，粤港澳三地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导致粤港澳三地的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在中西方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容易形成相互之间的文化冲突。尽管改革开放促进了三地的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港澳回归也为三地文化融合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但是，粤港澳三地长期形成的文化差异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消解，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sup>①</sup>因此，在共同的岭南地域文化空间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深化三地共同对大湾区内文物古迹、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发展，弘扬以粤剧、龙舟、武术、醒狮等为代表的、粤港澳三地共有的岭南文化，坚定三地对自身共有文化的自信，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基础性工作。

在粤港澳三地形成共同的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纲要》指出，要增强大湾区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人民文化素养与社会文明程度，共同塑造和丰富湾区人文精神内涵。增强“湾区文化软实力”，既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共建人文湾区”所必须依靠的精神动力。纵观世界，美国纽约湾区成功的金融及商业发展历程表明，多元移民文化的交织在其城市文化与精神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旧金山湾区“硅谷精神”的内涵之一表现为特立独行的“小众文化”对科技创新和时尚潮流的引领；日本东京湾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则离不开一众日本企业追求精致乃至

<sup>①</sup> 田丰. 岭南人文精神与人文湾区 [J]. 学术研究, 2022 (2).

极致的“匠人精神”。若从自身定位与发展历程来看，尽管金融、科技及产业在三个湾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交织，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与东京湾区大致上可以分别理解为金融湾区、科技湾区与产业湾区。而比较之下，粤港澳大湾区所要建设的“人文湾区”很可能将是一个超越单一定位范畴的新型世界级湾区形态。<sup>①</sup>因此，要实践这一人文愿景，就必须依托共同的历史文化纽带，着力塑造共同的湾区文化与湾区精神，并以此为持久的内在驱动力。<sup>②</sup>

与此同时，《纲要》强调，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要大力弘扬廉洁修身、勤勉尽责的廉洁文化，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推动廉洁化风成俗。这是因为，一个地方的“廉洁指数”，直接关系到其“人气指数”和“发展指数”。在推动港澳融入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过程中，投资的项目往往资金多、涉及面广、影响力大，着力发现并纠正工作推进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督促有关部门高质量推进改革举措和项目落地，是大湾区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在积极推动粤港澳三地廉政机制协同建设的同时，大湾区也要充分营造能够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人文氛围，确保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廉洁高效。

其次，通过完善大湾区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创意产业体系，推动大湾区文化的繁荣发展。《纲要》提出“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是以完善公共服务和创意产业两个体系为切入点。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纲要》强调文化人才的培育、文化精品的打造和文化市场的繁荣，同时强调与其配套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音乐产业、演艺产业、文博产业的发展。在完善创意产

---

<sup>①②</sup> 金凯. 建设“人文湾区”，展现“文化自信” [N/OL]. 深圳特区报，（2019-04-09）. [http://sztqb.sznews.com/MB/content/201904/09/content\\_631101.html](http://sztqb.sznews.com/MB/content/201904/09/content_631101.html).

业体系方面,《纲要》强调要推动形成区域内多个各有优势与特色的文化大都市。例如,香港须依托其中西合璧的城市文化魅力持续“汇聚创意人才,巩固创意之都地位”;而作为快速成长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深圳将吸纳“世界高端创意设计资源”,大力发展时尚文化创意产业。以发展的视角看,若缺乏创意与创新,文化将变得迟滞而缺乏活力。因此,“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须要切实关注作为文化载体的人以及作为文化产业载体的文化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同时,不追求同质化发展,而要着眼于“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中的创新与创意。<sup>①</sup>

再次,通过关注港澳青少年群体的亲历与实践,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纲要》的用意,不仅在于为青年人提供各种优质的自我成长的机会,而且在于粤港澳青少年群体之间的交流交心,从而促使粤港澳青年一代成为大湾区共同文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对于粤港澳青年一代而言,由于成长环境存在各方面的差异,彼此之间客观上存在文化交流的隔阂。如果交流活动仅仅停留在见面、交谈、走访、参观等短暂或浅表层面上的交流,参与的港澳青少年在活动结束后往往难以与内地青年保持紧密的联系,交流也不可能持续。因此,《纲要》强调有必要通过研学旅游结合的形式,建立研学基地,为青年人提供“创业、就业、实习和志愿工作等机会”,从而增强港澳青年对国家建设和民族文化的融入感、参与感和责任感。

最后,通过发挥大湾区中西文化长期交汇共存等综合优势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从世界文明与文化多元共存的视角来看,大湾

---

<sup>①</sup> 金凯. 建设“人文湾区”,展现“文化自信”[N/OL]. 深圳特区报,(2019-04-09). [http://sztqb.sznews.com/MB/content/201904/09/content\\_631101.html](http://sztqb.sznews.com/MB/content/201904/09/content_631101.html).

区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能够也应当起到交流平台与文化辐射的重要作用。自古以来，中华文明与文化一直都是开放包容的，与其他文明文化的交流互鉴也不曾中断。这一点也恰好体现在大湾区文化多元以及制度多样的特质上。以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为愿景目标的大湾区，也只有在与世界不断的交流和互鉴的过程中才能够真正建成秉持中华历史文化血脉且包含多元文化元素的新型“人文湾区”。对此，《纲要》强调，大湾区各个城市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丰富文化交流内容，提高文化交流水平，来促进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合作，从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交流门户或平台。例如，广州要建设成岭南文化中心和对外文化交流门户，以扩大岭南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中山要成为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的城市；江门要建设为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澳门要发挥东西方多元文化长期交融共存的特色，建设成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中心；香港须发挥中西方文化交流平台作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从以上四项规划要点可以看出，共建“人文湾区”必须以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基础。无论是对于湾区人文精神、大湾区文化软实力、青年群体的交心交融而言，还是对于大湾区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而言，若没有共同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纽带，这一切都将难以实现。因此，共同的文化是建设“人文湾区”的基石，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以及对共同文化价值观的秉持既是建设“人文湾区”的必然要求，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文化交流交融、人心互联互通的必然结果。从粤港澳以区域文化视角分析，对以岭南地区生发的文化进行继承和发扬，并对中西文化交汇枢纽地位的保持与巩固，是粤港澳大湾区在建设“人文湾区”、发挥文化交流平台与文化辐射作用时应发挥的文化优势。

## 二 人文湾区的内涵剖析

根据《纲要》赋予粤港澳三地的创新性使命，人文湾区是一个多维度、高层次、人文指向性强的概念。其内涵须从三个层面来把握。

第一，人文湾区的内核是人文精神。很显然，相对于“经济湾区”“产业湾区”“科技湾区”等“硬实力”概念而言，“人文湾区”属于“软实力”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文湾区”的核心是文化，而文化的核心则是精神。因此，精神层面的要素应该是构成“人文湾区”最基础的要素。基于这样的考量，“人文湾区”的核心精神要素是大湾区人文精神。这一人文精神属于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一种形态，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华文化与地方文化等碰撞交融再创造的一种新的综合性精神形态。因此，湾区人文精神既应该体现人文精神的普遍性气质，又应该体现中国的、现代的及湾区独特的、稳定的、具有传承功能的气质。

第二，人文湾区的载体是包括湾区内一切承载了文化的具体物质形式、可见形态、表现平台等。这些载体包括大湾区城市内的标志性建筑和场馆、扬名海内外的名胜古迹和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红色革命资源、独特的文化标识和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等，它们能够展现大湾区各个城市或共有的或独特的精神风貌、民俗传统、气质气度等，是代表大湾区的独特的品牌和标识。如在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中，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星光大道，澳门的大三巴牌坊，广州的广交会展馆、岭南骑楼，深圳的莲花山公园、“拓荒牛”雕塑，佛山的武术与醒狮，中山的孙中山先生的出生地翠亨村，广东

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开展省港大营救的交通线、工作站、名人手稿等，都是湾区重要的人文载体，是湾区独特的人文符号。此外，湾区人文载体还应该包括湾区产出的各类著名文化产业品牌，如香港的电影电视产业、澳门的博彩产业、广州的电视和音乐产业、深圳的动漫创意产业、佛山的传统武术文化产业等。这些文化产业也集中体现了湾区人文的精髓，是湾区人文的重要载体。

第三，人文湾区的动态标识是人文行动，即大湾区人民践行人文精神的结果体现，这是人文湾区流动的风景，体现的是大湾区人民的文明素养和精神风貌。如果说人文精神、人文载体是“人文湾区”的静态标识，那么人文行动则是“人文湾区”的动态标识，前者体现的是“对象性人文”，后者体现的则是“主体性人文”。从某种程度上讲，湾区人文行动是“人文湾区”的流动风景，集中展现了大湾区人民的文明素养和精神风貌。因此，建设“人文湾区”的最终归宿是“人的建设”，“人文湾区”的成果终究应该付诸行动，体现在大湾区的人文行动之中。具体而言，大湾区人文行动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群体性人文行动。这主要指的是大湾区人民集体参与的以践行人文精神为目的的行动，如香港传统的各类文体颁奖盛典、赈灾义演，中山每年元宵节举办的“慈善万人行”活动，湾区城市举办的各类大型音乐及体育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等。二是个体性人文行动。这主要指的是大湾区内的人民个体参与的以践行人文精神为宗旨的行动，如日常邻里关系的妥善处理与维持、个体日常社会交往的亲善行为、个体日常践行传统美德的行为等。这些人文行动是湾区人文精神的“流动风景”，集中体现了大湾区人民的人文素质和精神风貌，是“人文湾区”内涵的题中之义。

从以上分析可得，人文湾区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坚定文化自

信，充分依托粤港澳三地的文化基础和发展优势，继承并弘扬粤港澳三地文脉相亲、人文相近、同根同源的历史纽带，充分发掘大湾区文旅资源，繁荣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展示中国发展模式，构建人文荟萃、文化引领、文明和谐的人文高地。

### 三 “人文湾区”的建设目标

对应于“人文湾区”的概念内涵，“人文湾区”的建设目标须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丰厚历史沉淀的大湾区独特人文精神体系。一方面，大湾区人文精神是丰富并具有一定源流的。这跟近代广东社会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发生在广东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战争的失败造成了深重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同时也刺激了一批先进的岭南人在民族危机中向西方学习和寻找救国之道。以林则徐、洪秀全、郑观应、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代表，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率先开眼看世界，探索中国变革图强的道路，提出了许多新思想，特别是洪秀全发起的太平天国起义、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孙中山发起的民主共和革命运动动摇了千年封建社会的旧制度、旧观念，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风貌，使广东乃至粤港澳地区成为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的策源地和新文化的生长点。粤港澳地区的人文精神在近代社会革命实践中不断转型创新，以鲜明的世界性、先进性和岭南特质引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明进步。而自从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粤港澳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罢工和抵制运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省

港大营救在内的东江游击队抗日救亡斗争，则激发了粤港澳地区人民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这些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共同记忆与血脉传承中的精神力量，是激发粤港澳人民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努力建设和谐美好湾区的精神力量。

另一方面，在具有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特征的基础上，大湾区的人文精神又是独具区域特色的。也就是说，湾区人文精神应该是粤港澳大湾区所独有的标识，至少人们在讨论这种精神时首先想到的是粤港澳大湾区（或其中的某个城市）而非其他区域。<sup>①</sup> 中华传统文化是维系粤港澳一体化的根本纽带。但由于百年政治治理的差异，三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认同也存在着差别。如在传统学术思想上，港澳学者较之内地学者对儒家学说有更深认同，而内地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有着更多的研究。又如在语言文字上，汉语文化、英语文化、葡语文化的差别以及字体的繁体简体之别也显而易见。即使是广东的湾区城市，由于历史沿革、风土民俗的不同，在受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上也呈现多元多样性。如广州市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特色、深圳市的多元移民文化特色、中山市的孙中山文化特色、江门市的华侨文化特色、肇庆市的六祖禅宗文化特色、惠州市的道家文化特色等。这些不同特色的地域文化样式的存在，形成了岭南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家园。<sup>②</sup>

此外，大湾区人文精神还须表现出一定的体系性。即“人文湾区”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并非零散的、断片化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第二个层面是，打造丰富而出彩的大湾区人文载体。具体而

<sup>①</sup> 曹峰. 人文湾区的内涵及建设目标 [N/OL].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08-0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7221124331123827&wfr=spider&for=pc>.

<sup>②</sup> 田丰. 岭南人文精神与人文湾区 [J]. 学术研究, 2022 (2).

言，一方面，从量的角度讲，人文载体足够丰富多彩。这些人文载体应该既包括传统的丰富多样的载体，同时也有现当代的种类繁多的载体，相比于其他区域，在数量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另一方面，从质的角度讲，人文载体具有较大知名度和较高美誉度。“人文湾区”的人文载体除了量的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应体现在质的优势上。也就是说，“人文湾区”的各类人文载体应该具有足够的影响力，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赞誉。

第三个层面是，大力发展深入人心的湾区人文行动。从行动层面来看，“人文湾区”的人文行动也应该得到充分开展。作为“人文湾区”，其人文行动应该达到以下建设目标：一方面，以文化艺术为媒，推动湾区各个城市的文化互融并逐渐形成大湾区的人文共识。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大湾区高水平大学众多的优势，打造大湾区的人文活动品牌。例如，大湾区各个城市共同打造大湾区慈善日募捐的品牌活动。当这些活动成为家喻户晓的行动品牌，其背后的人文理念就能融入人们的生活日常，成为人们思想及行为的自觉。与此同时，还要扩大对外交往，提升大湾区城市群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综上所述，建设“人文湾区”，既是依靠“文化自信”，更是展现“文化自信”。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一个在人文精神及文化软实力方面独树一帜并且成果丰硕的“人文湾区”，就必须真正理解并践行“文化自信”的实质与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湾区建设丰富了文化统战工作的内涵，创新了文化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粤港澳三地必须共同推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本地区特色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将对湾区人文精神的塑造首先建立在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的基础之上，并将青年一代的相互认同与交心交融当作粤港澳大湾区未来人心愈发凝聚的重要基

础。唯有如此，建设“人文湾区”才能够在最大的范围内凝聚最广大的人心、形成最有效的共识，进而形成建设“人文湾区”的第一推动力。<sup>①</sup>

---

<sup>①</sup> 金凯. 建设“人文湾区”，展现“文化自信” [N/OL]. 深圳特区报，（2019-04-09）. [http://sztqb.sznews.com/MB/content/201904/09/content\\_631101.html](http://sztqb.sznews.com/MB/content/201904/09/content_631101.html).

## 第二节

# 人文湾区建设的机遇和挑战

粤港澳三地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而共建的“人文湾区”，可以理解为在大湾区建设发展过程中坚持对共同文化记忆、社会认知、道德规范及价值观体系的认同与发扬，从而在大湾区范围内依靠文脉相亲而促进人心互通，进而形成一个既保留共同文化特质与内涵又实现不同文化元素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和谐湾区。显然，这将是一个不同于其他世界级湾区的新的湾区形态，既有尊重“两制”差异的国家顶层设计，又有文脉相亲的内在禀赋；同时，既包容不同的文化元素，更蕴含着我们对国家历史与民族文化的尊崇与自信。

基于深厚的地缘、亲缘和史缘等关系，在既有共同又相对独立的时空背景下，粤港澳三地文化各自作为一种类型先后形成，并经过长期、基本未间断的交流、碰撞，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而这个综合体在人文湾区建设的背景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 作为文化综合体的大湾区的形成

珠三角是广府文化核心区，也是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的历史

核心。自秦汉统一、开发岭南，至唐宋以粤方言形成为标志以来，广府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核心已形成。明清以后，珠三角受西风东渐之影响，建立起发达的商品农业，人文兴旺；各类科举人才、教育机关和公私著述的数量甲于全省。广府文化内涵得以充实与提升，并以强劲的文化势能，向国内外辐射。改革开放以后，珠三角成为全国经济高峰区，广府文化被染上浓重的商业色彩。香港文化、澳门文化、华侨文化、西方文化，使珠三角文化愈发丰富多彩；随着在珠三角谋生的数百万外来人口学习和融入广府文化，珠三角的文化再一次辐射全国。粤语、广货、影视、音像作品、时装、流行音乐，以及新潮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民风民俗等，在全国扩布，新时代背景下珠三角文化脱羽成熟，为当前粤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sup>①</sup>

自宋到明迁居香港新界和港岛的邓、侯、文、廖、彭等姓氏家族主要是客家人；清初至鸦片战争前，沿海“迁界”和以后人居香港也均以客家人为主。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客家文化是香港文化的底色。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大批内地人（主要是珠三角人民）迁居香港，广府文化、粤方言和风俗习惯逐渐成为香港文化的主体，传统的客家文化则主要在新界得以传承。在英国殖民者的管治下，以海洋文化为主体的西方文化迅速在香港传播、发展、渗透。这促使香港文化既有与珠三角广府文化“同声、同气、同根”的一面，又有西洋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另一面。因此，香港文化的本根在广东，与珠三角文化紧密相连，同时又具有中西荟萃、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性。这种多元性甲于世界其他许多地区，成为粤

<sup>①</sup> 司徒尚纪，许桂灵.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综合体的形成、作用及其建设路径[J]. 岭南文史，2022（2）.

港澳区域文化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澳门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文化处于独立发展阶段，社会文化主体是广府文化，辅以中葡文化相互交流、调适为特征。7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的香港现代文化占领了澳门市场，香港电视、音像制品、服饰等成为消费潮流。这时的澳门文化的独立发展受到了香港文化的左右。从70年代后期开始，内地的改革开放促使澳门文化受到珠三角文化的影响。尽管占总人口2%左右的中葡混血、土生葡人依然坚持着葡萄牙文化，但澳门绝大多数平民百姓更多地往来于香港和深受香港文化影响的珠三角，因此，这时的澳门文化被香港文化大规模渗入。但与香港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不同，澳门文化有着浓厚的拉丁色彩，中西文化交融的和谐性更为突出。<sup>①</sup>

由此可见，粤港澳三地文化各自作为一种类型先后形成，并经过长期、基本未间断的交流碰撞，包括广府文化因珠三角几次大量人口迁居港澳而传播至港澳地区的各个层面，以及港澳的广府文化被西方文化所涵化和改造后重新传入珠三角，最终，在经历了上百年历史后，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区域文化综合体。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综合体是人文湾区建设的一个主要存在方式，发挥着促进大湾区多元文化交流和繁荣发展的作用。<sup>②</sup>

## 当前人文湾区建设的机遇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广东已经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大省蝶变为

<sup>①</sup> 许锡挥，李萍. 粤港澳文化关系 [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30，209.

<sup>②</sup> 司徒尚纪，许桂灵.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综合体的形成、作用及其建设路径 [J]. 岭南文史，2022（2）.

全国第一的经济强省。珠三角地区更是引领时代风气之先，不仅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了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香港和澳门则在“一国两制”的贯彻实践下，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正追求更长远的稳定发展。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实力雄厚，又同属血脉相连、语言相通、文化相融的岭南文化圈，同时秉持沿海开放包容的风气，拥有国际文化传播的平台和经验，这都为三地建设文化湾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纲要》及相关实施细则的引导下，人文湾区建设必然迎来新的机遇。

### 1. 湾区人文精神的塑造将极大推动粤港澳三地的文化合作

人文湾区的宏伟构想，是一幅凝心聚力、共谋未来的壮阔蓝图，需要三地人民并肩携手、共同创作。珠三角九市与港澳双城，虽然地理毗邻、血脉相连，但在过去百余年里的岁月里却走过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多元化、复杂化、差异化的思想文化脉络。这使得过往粤港澳三地的文化合作难以持续有效地展开。而湾区人文精神的塑造则能够极大地提升湾区人民彼此的文化共识和价值认同。

湾区人文精神的塑造主要依靠三个方面。一是对湾区人文精神的全面和充分的提炼。这就要求发挥大湾区的高校、官方学术研究机构 and 民间文化力量的推动作用，通过三地重要文化、学术机构的紧密合作，推动湾区人文精神的有效凝练。二是根据人文精神的塑造方向加强有本土地域特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需要各地不断推动文化设施、资金、人才、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尤其是推动内地城市对港澳文化创意人才培养的取经式交流。三是合理配置大湾区内共通的文化资源，推动粤港澳三地发

挥各自文化建设的优势力量并形成相互交流合作格局。塑造大湾区的人文精神只是意味着消弭因制度和价值观不同而产生的深层次隔阂，而不是也不可能推动文化精神的完全划一。事实上，大湾区各个城市因历史的沉淀有着各自的文化比较优势，要真正塑造湾区的人文精神，就要尊重各地文化的差异与特色，通过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在差异化和多样化中实现对中华文化和家国情怀的高层次融合发展。因此，湾区人文精神的塑造将极大地推动粤港澳三地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深入合作。

## 2. 人文湾区的建设将极大提升粤港澳三地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2020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政府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要统筹大湾区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这是一项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紧密结合的系统性规划。2021年年中，香港特区政府宣布要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结合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在2022年开春之际，广东召开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大会，重磅推出《广东省文化发展改革“十四五”规划》《关于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行动方案》。这一系列的政策出台背后，预示着湾区文化建设将与传统文旅项目进行结合再造，通过“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方式推进大湾区文化的时代性发展和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从而为粤港澳三地文化和旅游事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事实上，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通过大湾区文化和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人文湾区建设已经初见成效。第一，广东省在对文化

遗产进行保护的基础上，重点打造了一批文化旅游路径，为粤港澳青年在交往交流中聚焦大湾区文化特色、认识祖国历史文化、增进彼此情感认同提供了有效的平台。例如，2020年6月，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发布了首批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包含孙中山文化遗产游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游径、华侨华人文化遗产游径、古驿道文化遗产游径和海防史迹文化遗产游径五大主题共27段实体游径。其中，孙中山文化遗产游径主要分布于广州、东莞、惠州、中山、珠海和肇庆等地，包括广州孙中山读书学医游径等9段实体游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游径主要分布于广州、佛山和江门，包括广州海丝申遗史迹游径等3段实体游径；华侨华人文化遗产游径主要分布于广州、江门、中山和佛山等地，包括广州新河浦“东山小洋楼”游径等5段实体游径；古驿道文化遗产游径主要分布于广州、惠州、珠海、中山和肇庆等地，包括广韶古道（从化段）等5段实体游径；海防史迹文化遗产游径主要分布于东莞和深圳，包括东莞虎门炮台游径等5段实体游径。2021年6月，在继续深入挖掘粤港澳三地共有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广东省创建推出第二批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包括：西学东渐文化遗产游径、近代商埠开放文化遗产游径和非物质（粤剧）文化遗产游径三大主题共16条实体游径。其中西学东渐文化遗产游径主要分布于广州、珠海、佛山和肇庆，包括广州西医东渐游径等5条实体游径；近代商埠开放文化遗产游径主要分布于广州、深圳、珠海、佛山和江门等地，包括广州近代商埠游径等9条实体游径；非物质（粤剧）文化遗产游径主要分布于广州和佛山，包括广州粤剧名伶纪念游径等2条实体游径。这次发布还对首批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进行了修订和增补，包括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游径修订江门川岛贸易遗址游

径1条实体游径，海防史迹文化遗产游径增补广州虎门炮台游径1条实体游径。截至2021年末，广东省共发布八大主题44条文化遗产游径。在2022年6月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的粤港澳青年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体验活动上，三地青年就对古驿道文化遗产游径（中山段）、孙中山文化遗产游径、华侨华人文化遗产游径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并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的文旅融合、粤港澳生活圈和文化遗产创新转化”这一主题分享了各自参加体验活动的感想，并结合自身在粤创业经验对文旅融合的文化遗产游径活动的策划提出了工作建议。这让参与活动的粤港澳三地青年在了解岭南地区经贸往来、文化相融的基础上加深了对彼此的信任以及对粤港澳文化同源的认同。

第二，粤港澳三地通过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项目的保护力度，以旅游产业推动非遗的发展。据统计，至2020年12月，广东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147项、省级代表性项目701项；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32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729人。其中大湾区的广东9个城市，国家级代表性项目66项、省级代表性项目320项，分别占全省的45%和46%；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61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98人，分别占全省的46%和41%。香港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10项，香港代表作名录20项，列入香港首份清单的项目480项。澳门有国家级代表性项目8项，列入澳门清单的项目15项。大湾区11个城市的非遗项目的范围涵盖了包括粤剧、龙舟、醒狮、武术、凉茶等项目在内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

大类，内容非常丰富，具有鲜明的岭南特色。<sup>①</sup> 粤港澳三地纷纷通过文旅结合的方式推动非遗文化的创新，并通过创新适应市场的需求，从而让市场推动传承。作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永庆坊，就是通过开发深受市场欢迎的文化产品（如广绣与采芝林合作开发的广绣香囊、具有广彩特色的日用品等）来实现非遗的传承。在乡村振兴上，广东正在建设一批有当地根脉和社区人文基础的非遗特色小镇，打造非遗与文旅融合的标杆项目。广东不少地方还结合青少年成长的需求研发非遗传承的游玩性质的课程，如广州天河区车陂龙舟文化展览馆开设的龙舟文化和扒龙船技巧课程，吸引青少年通过旅游的方式了解和学习非遗文化。在香港，非遗的收藏、保育、多元化的教育和推广活动均由位于荃湾的香港非遗中心负责。这个中心重视文化多元的立场，让来中心参观的旅客都能从自身的角度关注传统文化资源。在向年轻人推广非遗项目时，该中心重视非遗文化“口传心授”的特性，让年轻人在实际参与中和非遗传承人面对面倾谈获得更好的体验。<sup>②</sup> 例如，对于与内地共享的非遗项目广彩，香港非遗中心除了以传统方式展示展品外，还配以各式多媒体设备，用视听载体呈现非遗项目的制作步骤、相关场景的声音，以及工艺人的现身说法，讲述作品背后的内涵。<sup>③</sup> 而在澳门，多数的非遗是随着移民迁徙而在澳门生根，充分体现了各种文化在澳门的互相涵养、不断演进和相互融合的动态发展趋势。因

① 张春雷. 对粤港澳大湾区构建人文湾区及其非遗如何助力的思考 [J]. 岭南文史, 2022 (2).

② 大湾区之声. 他们这样守护“湾的宝藏” [EB/OL]. 2022-06-11/2023-04-06. <https://view.inews.qq.com/a/20220611A097O800>.

③ 索有为, 魏华都. 探访香港非遗中心: 在“循声觅道”中体会传统文化 [EB/OL]. 2021-11-03/2023-04-0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5380667564467800&wfi=spider&for=pc>.

此，澳门在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中，比较注重推出与内地消费者或西方消费者发生关联、产生共鸣的文化产品。当产品讲好澳门故事，讲好中西文化交流故事，讲好澳门与内地紧密联系的故事时，才会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欢迎。<sup>①</sup>例如，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就是充分利用“妈祖”这一内地与澳门相互融合发展的文化资源开拓旅游资源。通过这一活动，加强澳门的妈祖文化建设，提高澳门旅游城市和澳门世界文化遗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第三，文化旅游已经成为激活大湾区各个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在广东，文旅产业已经成为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关键驱动因素。可以说，文旅产业破解了湾区内地城市大城大乡的二元结构，使城市和农村形成了有效的双向流动，让城市和农村的人民都能过上有品质的生活。又比如，在香港和澳门，“文旅+会展”显示出极强的经济活力。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阴霾笼罩下，香港仍是多个会展活动的目的地并且跃升为世界最大的艺术交易中心，在全球艺术市场的占有率从2019年的17.5%上升到2020年的23.2%，首次超越伦敦。澳门于2021年10月举办为期四个月国际大型艺术盛会——艺文荟澳：澳门国际艺术双年展2021。在全澳25个地点举办30余项展览，处处是景，处处为艺术，极大地丰富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内涵，同时也展示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并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人文魅力。港澳两地文旅产业在疫情之下的持续发展推动了商务旅游的新业态的出现。与传统观光旅游相比，商务旅游具有消费档次高、规模大、停留时间长、产业关联性强等优点。据统计，67%的会展客商在参展期间有

---

<sup>①</sup> 大湾区之声. 他们这样守护“湾的宝藏” [EB/OL]. 2022-06-11/2023-04-06. <https://view.inews.qq.com/a/20220611A097O800>.

旅游的意愿。<sup>①</sup>但与传统旅游者相比，会展客商更倾向于关注展会举办地的整体经济活力，比如展会的品牌、服务和设施以及城市整体形象等方面。会展客商在商务旅游上的高标准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港澳文化旅游产业的进一步提升。

### 3. 人文湾区的建设将推动大湾区各城市打造各具特色的对外文化交流品牌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是大湾区建设发展的重要背景，也因此形成中西文化相互融通的重要特征。按照《纲要》的要求，大湾区各个城市还将肩负着积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文湾区的任务。为此，《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将这一任务具体化为两个方面：一是建设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网络。强化粤港澳大湾区中外文化交流合作协同机制，鼓励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发展各具特色的对外文化交流品牌，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二是促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支持港澳打造“一带一路”功能平台，支持和鼓励粤港澳大湾区机构参与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博物馆联盟、艺术节联盟、图书馆联盟、美术馆联盟等“一带一路”文化和旅游机制及合作项目，利用“欢乐春节”“美丽中国”“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等交流品牌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平台，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和旅游交流，深化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合作。

要与海外文化交流互鉴，首先要有能够参与交流的文化品牌。为此，可以预见，人文湾区建设必将推动大湾区城市着力打造各具

---

<sup>①</sup> “旅游+会展”成文旅产业发展“新势力”[N/OL]. 消费日报, 2021-07-27. <http://dzb.xfb.com.cn/Html/2021-07-27/40501.html>.

特色的对外文化交流品牌，从而拓展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网络，实现《纲要》设置的对外文化交流目标。例如，广州积极推动一批国际组织在广州设立分支机构，持续打造“美丽花城”“千年商都”“美食之都”等城市品牌形象。佛山正在推动岭南广府文化高地的建设。东莞则突出高品质现代化都市的形象，并积极与海外媒体合作、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江门继续擦亮“中国侨都”品牌，通过国侨办“中国寻根之旅”“中华文化大乐园”等活动向海外华裔青少年传播中华文化。中山则以“孙中山文化”作为对外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文化品牌。而香港正尝试将自身打造成国际城市旅游枢纽及“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凭借自身完善的海陆空联系及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海外旅客经香港开展大湾区“一程多站”旅程。<sup>①</sup>可以预见，人文湾区的建设将极大提升大湾区各个城市通过全球视野、现代理念与时代精神对本地文化进行重塑、创新的能力，并促进各个城市积极探索与世界文明互鉴的新模式。

### 三 当前“人文湾区”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

1. 因粤港澳三地政治体制的差异，“湾区人文精神”的塑造与认同将受到较大的挑战

粤港澳三地文化的共通点在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低调务实、敢为人先、汇通中外的岭南文化。粤语、粤剧、粤语歌曲等共同的文化表达是粤港澳三地交融合作的核心纽带。然而，因为受到

---

<sup>①</sup> 香港特区政府：携手大湾区各市共建世界级人文湾区 [EB/OL]. 2021-01-04/2023-04-0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7961797543123514&wfr=spider&for=pc>.

不同政治体制的影响，岭南文化在当今粤港澳三地却有着差异性的表达，属于共同文化记忆并不深厚。而对于当代三地共存的社会核心价值，如富强、民主、自由、法治等价值观，粤港澳三地也因为有着不同价值观和法律体系而有着不同的认知。如何正视三地的差异性，从差异性当中提取具有当代价值的相似性，在相似性上找到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认同，这需要粤港澳三地在继续相互交流共融的基础上去发掘和提炼。此外，岭南的历史和文化里渗透着深厚的红色基因，湾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红色文化。从1840年起，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无数身处粤港澳的仁人志士投身到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在1921年建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组织创建、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都在粤港澳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工作。然而，在港澳长期缺乏红色历史教育的情况下，不少港澳人民对红色文化出现了认同上的裂缝。如何激活港澳两地的革命历史记忆，通过讲好大湾区的红色题材故事化解认同裂缝、重构湾区文化认同，成为塑造湾区精神的最大挑战。

为此，粤港澳三地要从三方面来提升湾区当代人文记忆。一是广东省要将人文建设与港澳民生发展（特别是与港澳青年发展）相结合。在推动港澳融入大湾区的过程中，为在内地就业、创业、求学、生活的港澳同胞提供便利、给予适当的保障，让他们能够在内地满足自我需求、获得自我成长，以此来增进他们对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人文精神的认同，并激发他们认识、了解粤港澳三地包括红色文化在内的共同文化内核。二是港澳特区政府要推动国民教育的持续有效的开展，让港澳市民对国史、国学（中华文化）、国情、国家安全有广泛的了解。三是粤港澳三地要以青少年作为人文精神传承传递的主体，在挖掘文化内涵、提供文化服务时，要充分考

虑青少年群体的特点，在创造文化产品时要考虑能否满足青少年的需求。

## 2. 因粤港澳三地文化共建共享机制尚未形成，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的优势互补在短时间内难以体现

穗深港澳四地公共文化设施完备，持续投入力度大，公共服务水平高，但囿于地域空间、行政隔阂等因素，四地公共文化设施目前基本还停留在“各建各的”“各用各的”的阶段，没有在加强合作的基础上错位发展，实现文化资源统筹整合，以打造粤港澳三地公共文化资源共享共建的文化资源配置平台。这也导致在文化产业合作中难以形成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局面。

为此，粤港澳三地要在认清自身优势的基础上，推动优势领域的强强联合。一是搭建公共文化服务共享平台，推动“软连接”，包括推进三地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借助各自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同时加强文化惠民的深入合作，推动三地联合打造一批公共文化活动合作品牌。二是推动三地在文化产业上的合作。事实上，珠三角地区以文化制造业为主，文化产业创新力有待提高；香港文化创意产业分类细致，文化产业法律法规健全，但限于本地市场规模，本土文化产业发展渐趋饱和；澳门因博彩业独大而致文化产业发展空间较小，但在开拓葡语国家文化市场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广东要强化与香港在利用国际资本、先进管理经验、文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动与澳门建立面向葡语国家的文化创意产品生产、推介、销售体系，全面推进动漫游戏、创意设计、新闻出版、文化装备制造等优势领域的合作，从而提升大湾区文化产业的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三是发挥民间机构的作

用，促进三地文化协同发展。例如，发挥三地各类文化产业协会、商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文化企业间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和项目对接。

3. 因珠三角绝大部分地区文化创新环境和文化产业支撑条件尚未成熟，构建湾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地”将会受到较大的制约

根据《纲要》的要求，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多元文化交流融合”“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的文化之区，就意味着“人文湾区”的建设对标的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地。这不仅需要营造宽松包容的文化交流合作氛围，还需要拥有支持不同层面文化交流合作的大小平台和设施体系以及旺盛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和丰富多样的文化精品。在目前的情况下，大湾区内除了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大致能够提供相关的环境和支撑条件外，其余大部分大湾区内地城市难以企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地指标。

为此，三地首先要更多地协同发展，以共同打造立足大湾区、辐射全球的人文艺术集散地为目标，合作打造平台汇聚人才。这需要充分利用大湾区文学工作坊、大湾区美术联盟、大湾区音乐艺术联盟等现有平台，打造一批汇聚世界级文艺人才的论坛节展；同时实施文艺精品共创计划，在集聚粤港澳文化资源要素的基础上，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建设若干个以粤语电影、动漫、文学、粤剧等为主题的文化人才孵化基地；同时发挥港澳国际人才往来通道优势，引进国际顶尖文化人才（团队）并推动交流共享。

### 第三节

## 发挥好大营救文化资源推动人文湾区建设

人文湾区的建设，目的在于塑造大湾区人文精神以凝聚人心，并在塑造国家立场的基础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因此，厚植家国情怀的红色文化是大湾区的重要文化内容。这一文化资源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孕育文化自信、塑造湾区人文精神的根脉源泉。省港大营救的文化资源就是其中的一个显例。

### 一 大营救文化资源在建设人文湾区中的作用

1. 全面发掘省港大营救的文化资源有利于在人文湾区建设中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省港大营救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一次横跨粤港澳三地、获得完全胜利的革命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之际敢于担当、无畏牺牲、善于斗争的精神，也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而坚定粤港澳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支持人文湾区建设的国家战略。

第一，省港大营救解救和影响的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文化和知识分子对于救国建国兴国的重要性以及自身对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当时，为实施这个庞大的营救计划，中国共产党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广东省委动员了数千名地下党员，建立了近百个地方基层党组织，集中了东江游击队大部分武装力量，共同参与了这次大营救行动。在香港避风塘、九龙塘、牛池湾、西贡、元朗十八乡和深圳、坪山、惠阳、惠州、老隆、韶关、澳门、珠海、中山、江门、肇庆、湛江、海丰、陆丰、丰顺、兴宁、梅县、大埔等各地建立了数十个秘密交通站；南方工委、粤北省委、粤南省委、东江前委、东江后委无不倾其全力，配合这次营救行动。时任南方工委副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的张文彬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在给延安的报告中要求中央最少拨付100万元，以解决在营救过程中的燃眉之急。100万元对于当时的延安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但中共中央为营救计划能够顺利实施，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而那时中央机关每人每天的伙食费仅有二毛。地处贫瘠的陕西一隅，又遭到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要靠大生产自救的延安，却勒紧裤带拿出100万大洋来营救文化人士，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知识分子特别宝贵……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事实上，获救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在辗转大后方后，沿途散播的是进步的文化及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友谊的种子，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华制华”、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企图。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在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依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通过在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广聚天下英才。

第二，省港大营救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参与营救的共产党员无暇顾及家小、全心全意完成党交给自己的营救任务。例如，廖承志、连贯把母亲、妻儿留在香港；陈曼云与新婚丈夫香港辞别；黄冠芳把恋人派去组建交通站；卢伟如、陈永为建秘密联络站，把未婚妻接到惠州“突击结婚”；李少石廖梦醒夫妇去澳门建交通联络站；等等。这无不体现了中共党员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怀。在人文湾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定新时代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永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第三，省港大营救的成功依靠的是港澳基层群众和在粤游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联系和依靠包括港澳人民在内的基层群众的优良作风。这为当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人文湾区、以大湾区人民群众的需求为主导提供文化服务等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 2. 开发利用省港大营救文化资源有利于塑造湾区人文精神

人文湾区实际上突出的是人的命题，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这是人文湾区最核心的地方。而省港大营救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尊重、关照和爱护，恰恰与人文湾区这一命题紧密相连。

与此同时，在大湾区的文化建设中，需要挖掘粤港澳三地的共同文化记忆，尤其是与家国情怀相关的文化资源来塑造具有国家立场的人文精神。例如，在香港新界元朗，日军不时在村民门口放置煤油，以放火来逼迫村民说出游击队和文化人的去向。村民杨竹南曾被日军抓走并严刑拷问了一个多月，杨竹南因气节高，一口咬定自己是华侨，定居在此耕种，不知道游击队的事情。日军最后只

好将他释放。<sup>①</sup>类似的史实，遍布省港大营救的整个过程，其中所蕴含的粤港澳三地基层群众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共同奋斗的精神，为塑造和提炼湾区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支撑。

### 3. 开发利用省港大营救文化资源有利于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省港大营救不仅营救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还营救了英国赖特上校等近百名英军官兵以及国际友人。被救的美国空军中尉克尔安全到达游击队大后方之后，深刻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游击队港九大队是动用了大量他所看不到的力量才能奇迹般地让他逃离日军魔掌。为此，克尔直接促成了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和美英盟军的情报合作。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足民族利益，重视开展统战工作，并善于通过统战工作在国际上树立党的形象和威望。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始终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主体。<sup>②</sup>省港大营救中，共产党人与外国友人的合作、友谊，所形成的文化资源，对于当前通过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树立国家形象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作用。

## 二 大营救文化资源在粤港澳三地的分布状况

### 1. 与省港大营救相关的遗址数量多、分布广，但整合力度不强

#### (1) 深圳设“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由于省港大营救中获救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大部分来

<sup>①</sup> 王茜，刘斐. 东江纵队香港大营救：真正的肝胆相照 [EB/OL]. 2021-05-02/2023-04-0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8649127058290116&wfr=spider&for=pc>.

<sup>②</sup> 仲音，深化人文交流互鉴 共创人类美好未来（人民论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sup>④</sup>，人民日报，2022-9-26，第四版。<http://news.cctv.com/2022/09/26/ARTIjyudBUZBSnlCqiLclEaB220926.shtml>.

到了深圳龙华的白石龙村并入住附近阳台山上的草寮再被送往大后方，因此，早在2005年，作为“接待站”的白石龙教堂就已经按历史原貌修葺并建造成为“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2010年，该馆被广东省委统战部授予“统一战线基地”，2018年被广东省委组织部授予“红色革命遗址”，2020年9月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22年入选第十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名单。

目前，该馆占地面积2860平方米，建筑面积900平方米，有当年作为营救“中转站”的天主教堂（原址）1座、“胜利大营救”雕塑1座以及展览厅、大型浮雕背景墙等建筑，共设三个展厅，有文物92件（组）、历史图片287幅、模拟历史场景3处，并设置沉浸式投影、幻影成像等多媒体展示系统。该馆全面反映发生在1942年初的历时近200天，从当时日本占领下的香港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等共计800人左右（包括英、美、印籍国际友人100余人）的“胜利大营救”，是目前岭南地区收藏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史料及文物最多、深圳市唯一的主题性纪念馆。

在该馆的基础上，深圳龙华区正大力打造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党史学习教育平台，围绕“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主题，挖掘阳台山、白石龙革命遗址线索，推动白石龙红色文化特色村落建设，并推进“营救文化名人旧址”升级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2）惠州设“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

由于惠州的东湖旅店是秘密大营救的主要中转站之一，2017年，惠州市、惠城区两级政府高度重视，拨出专款回购东湖旅店，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予以修缮，将其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2019年1月30日开馆以来，在短短3年内接待了十多万中外游客，成为省、市党史教育基地热门的“红色打卡点”，并先后获得

了“广东省文物古迹活化利用典型案例”“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佳案例”的殊荣。

### （3）龙川老隆镇福建会馆设史料陈列室

在省港大营救的龙川老隆镇中转站，福建会馆是行动的大本营。目前，老隆福建会馆的史料陈列室，收集了被营救转移的进步文化人士自传、文集中关于此次“大营救”的记述。为转移营救香港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黄用舒，其黄氏家族在水贝村有着深厚的人脉和威望。当年黄氏祠堂曾作为中共后东特委、粤北省委交通站的所在地。因此，水贝村作为红色革命资源，已经纳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4）江门台山都斛东滘口登陆地设旧址

1942年1月，经台山都斛东滘口回到内地的文化名人共有两批：第一批包括梁漱溟、陆浮、陈此生、范长江、沈谱。第二批包括蔡楚生、郁风、金仲华、夏衍、张云乔、司徒慧敏、郑安娜、金山、王莹、谢和赓等十余人。因此，台山都斛东滘口是重要的登陆地。目前，台山都斛镇正在组织开展“胜利大营救”粤西海上交通线及东滘口登陆旧址保护修复与活化利用项目建设，并推动都斛镇实施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同时，台山市博物馆将配合都斛镇政府挖掘相关资料，安排工作人员走访相关知情人士，形成口述史资料。

### （5）汕尾城区红草镇的成兴大院和陆河县螺溪镇福泰楼待开发

何香凝、柳亚子由于年龄比较大，走的“特殊路线”撤离，选择海路离开香港，并在海上漂泊了8个昼夜后到达汕尾。登陆后，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在汕尾多地留下足迹，包括汕尾城区红草镇成兴大院、陆河县螺溪镇福泰楼等。目前，汕尾这两处省港大营救遗址基础较好，但因历史久远仍需要进一步保护和开发利用。对此，

汕尾市政府已十分重视，规划将这些遗址融合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东纵抗战路、中央红色交通线等重要遗址群，打造出有汕尾特色的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实现文旅融合发展。

#### （6）香港元朗适庐

位于香港元朗乡下的客家大屋适庐，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东江游击队港九独立大队营救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一个根据地。当年参与过大营救的香港同胞的后人仍生活于此。因此，该地并未作为红色景区进行开发，但近年来有学者、报社记者到此地进行访谈、搜集史料。

#### （7）省港大营救红色资源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仍有大量散落在粤北和港澳地区

在省港大营救沿线存在大量活动遗址，遗迹，而当前只有不足十分之一的红色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或重视。当年在香港的党组织联络站、交通站，大营救线路中设置的中转站，东江游击队部署营救计划的各个司令部所在地还待进一步的发掘。至少，位于皇后大道18号2楼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即“粤华公司”）、先后有14人办公的铜锣湾利舞台戏院附近耀华街、著名爱国进步人士和文化名人在香港居住或工作地的旧址、中共香港市委旧址、两条主要交通线的主要交通站，都应该站在整合大湾区文化建设发展的高度进行发掘并整理成册，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修旧如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 2. 省港大营救所涉及人物或主题知名度不高、转化为教化资源的力度不足

省港大营救所涉人物和主题普遍知名度不高。这主要由以下三方面原因导致。一是省港大营救涉及多个地级市且各市分别进行

开发利用，缺乏大湾区层面的统筹规划，省港大营救的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明显缺乏。二是省港大营救的研究力度不足，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导致传播广度难以拓展，目前主要局限在大湾区几个重要城市以及省港大营救的主要涉及地进行传播，缺乏国家层面的宣传。三是文化发展成效难以量化，在经济数据仍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情况下，省港大营救的研究和宣传因难以直接体现在量化数据上，仍未得到足够重视。

此外，现有的省港大营救红色资源的研发深度不足。目前为省港大营救所设的纪念馆，多数仅限于对省港大营救当年组织策划和参加武装护送人员的回忆叙述，以及对被营救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和国际友人的描述。这些回忆和描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集中在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香港沦陷、再到组织抢救和护送出港，所叙述和研究的范围较窄，对于大营救所涉及的数百个人物和数十个秘密交通站和地下党组织的其他叙述研究未及开展，大营救的丰富历史内涵有待研究提炼，人物精神也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和转化宣传。尤其是，现有的大营救红色资源没有结合当今时代发展去发掘人物精神，导致人物的精神或事迹仅仅局限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与当代脱节。对于现已开发出来的省港大营救红色资源，利用的形式并不丰富，绝大多数限于展览和讲解的方式，参观者通常只是走马观花地参观，难以发挥明显的教育教化功能。

### 3. 省港大营救红色资源缺乏统一开发利用机制，没有形成大规模红色旅游文化产业

由于省港大营救的红色遗址在空间上非常分散，资源统一开发利用比较困难。不少交通站地处偏僻且周围没有相应的红色革命遗址支撑，即使进行保护也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利用。有关省港大营

救的文物在空间和时间上均具有分散性的特点，在征集整理时具有相当的难度和需要大量的时间，而革命文物、史料收集整理以及展示工作的不及时、不全面，反过来又容易导致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限制。从目前的情况看，没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红色经济，没有把保护开发与地方经济、旅游产业发展进行统筹，仅限于流水线式的标准化参观，相关场所就难以持续地得到保护和使用。这就需要突破固有的方式方法，一方面应创新革命历史题材故事的讲述方式与话语表述，展示大湾区人文精神的家国情怀与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实现“红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积极打造能够彰显省港大营救特色又具有国际化的中国文化创意符号的文创产品，推进具有省港大营救主题的文化旅游多层次立体式全方位发展。

### 三 做好大营救文化资源的阐释和开发利用

#### 1. 从人文湾区建设的高度，深度挖掘省港大营救的时代意义

省港大营救的文化资源的发掘工作已经形成了大致的脉络，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次大营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血肉相连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主动保护中国文化精英与中华文化的种子的担当，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等。但是，这些对省港大营救的文化资源阐释，并没能从民族精神和历史智慧的角度去发掘这次大营救的当代价值。目前，需要从有利于人文湾区建设的高度，对省港大营救的红色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使其注入时代内涵与精神。

对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而言，一是要从营救工作的路线规划、运送人员的分工、被营救文化人的行程和起居生活的安排、经

费的筹备等方面，发掘中国共产党的全局思维和底线思维；二是要从数十个秘密交通站的设立和运作去发掘中国共产党人求真务实、夯实基层的精神，为今天基层党组织大兴实干之风树立榜样；三是从共产党员在遇到各种困难险阻时均能迎难而上，巧妙运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手段不惜一切开展工作来化险为夷的历史，发掘共产党员信念坚定、不畏艰险的精神以及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sup>①</sup>在当前人文湾区建设中，共产党正是需要革命前辈这些精神来激发建设人文湾区的奋斗伟力。

对于参与人文湾区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民群众而言，我们需要从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在营救路上相互扶持，对游击队员的体谅和帮助，在敌后根据地与当地老百姓讲文化、讲政治、讲国际形势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粤港澳三地相亲的自觉协助等细节中，提炼在当今依然需要大力发扬的民族精神，如爱国爱乡、互相帮助、团结奋进、不畏苦难等。

对于港澳同胞而言，适当为他们发掘有关共产党员拯救英美盟军的故事及其时代价值，让他们深刻体会共产党员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地维护世界和平的追求。

在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宣传上，要适当突出大量华人华侨参与此

---

<sup>①</sup> 例如，何香凝、柳亚子由于年迈体弱，不宜长途跋涉走陆路，必须走水路用船护送。交通员谢一超用小船将何香凝和经普椿母子、柳亚子父女秘密送往长洲岛，然后再转乘大帆船到海丰县。船开至大鹏湾海面时，突遇海贼打劫，谢一超沉着应对，晓以大义，始得放行。随后又因无风扬帆，在公海漂流了六七天。柳亚子因身份不能公开，又怕被汕尾的汉奸、特务发现，故不敢直抵汕尾，只能在港澳同胞特别多的马宫上岸。上岸后，柳亚子化姓黄，扮成大商客住在港商杨胜昌的大院内。之后，海陆丰党组织在护送何香凝、柳亚子一行人员到粤北大后方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各种突发情况，但护送人员均能灵活应对，与海盗山匪、国民党特务、地方特务等周旋，并组织动用各方力量，把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巧妙地结合，圆满完成护送任务。

次营救活动的故事。例如，可以以捐赠者廖安祥为典型，通过讲述他参加营救工作以及之后的新中国的建设和侨务工作的事迹，彰显海外华侨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从而激发当代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此外，在深入发掘文化精神的同时，要更多地发挥人文学者专家的作用，在文物、遗存、典籍中提炼历史智慧和民族精神。

## 2. 从保护文化价值的高度，加大省港大营救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整合力度

一方面，要从大湾区的层面，对省港大营救的各种历史遗迹做清单式的查证和保护。保护文物，要把历史文化价值放在首位，重在文化保护，而不是片面追求经济开发效应。对于没有经济能力对散落在郊外的交通站进行核实和开展保护工作的地级市，广东省大湾区办应该拨付专项基金进行协助，至少要做到如旧修缮、挂牌认证、拍照留存。与此同时，各个地方要从史料中找准辖内文化资源的个性亮点，尽量避免同类化。文化资源比较集中的深圳、惠州、河源、韶关等地，可以与其他红色资源一起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连片打造革命史迹主题区域，从而打造城市的红色文化地标，通过“红色文化+旅游”的方式厚植省港大营救的时代价值。

另一方面，要从凝聚湾区精神的高度，推动大营救故事在大湾区的深入人心。粤港澳三地要加强协同合作，打造“省港大营救路线”的红色旅游品牌，组织包括港澳学生在内的青少年重走当年拯救名人的各条路线。与此同时，可以在各个有文献资料记载的文化遗址，通过科技手段或以原物再现的方式复原当年救援和生活的场景，让参观者从“历史沉浸感”中获得精神浸润。如当年的白石龙村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就在附近的树林搭建了草寮，再

现当年接待过文化名人的草寮招待所。同时，在开展游学活动的同时，培养一批中小學生担任的讲解员，通过他们的讲解来影响更多粤港澳青少年了解这段历史及其时代价值。此外，尝试推动省港大营救历史进入大湾区中小學的教材。

### 3. 从发挥好大湾区优势的角度，积极推动省港大营救文化产业的发展

当前，要积极发掘青少年喜闻乐见且具有大湾区特色的形式来展现省港大营救的故事。例如，深圳粤剧团通过多年精心打磨，出品了精品粤剧《东江传奇》，吸引了大批资深粤剧迷，加深了他们对省港大营救的深入了解。<sup>①</sup>深圳有动漫公司还将这一精品粤剧改编为动漫作品，从而吸引包括在深圳创业的香港青年在内的大湾区青年的关注。又例如，可以考虑将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在撤离途中所作的字画和诗词，以文创的形式展现，并在文化遗址进行展出和销售。此外，还可以通过越野打卡寻找省港大营救交通站比赛、省港大营救交通线旅游设计大赛等方式，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在协作上，要充分发挥大湾区文化互联互通、文化产业发展基础好的优势，打造有关省港大营救文化资源整合的产业链。例如，把省港大营救的文创设计放在香港、深圳前海或珠海横琴，让具有设计优势的港澳公司开发文创产品的设计；把网络宣传放在深圳，充分利用深圳互联网产业的优势开展文创产品的跨地域联动宣传；把生产放在珠三角地区，如深圳、东莞等地，或者省港大营救的发生地，如韶关、河源等，通过生产文化创意产品带动红色文化宣传，并推动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的整合，并提升文创价值。

<sup>①</sup> 人民资讯网：“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历史回顾展”亮相大剧院！观众“点赞”深圳粤剧 [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2409375297413287&wfr=spider&for=pc>。

附录一

永远记忆：铭刻历史的丰碑



## 参加营救行动人员（部分）

**廖承志**（1908—1983），曾用名何承志、何柳华，广东惠阳人。省港大营救主要负责人之一。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办和领导有大批赴港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士参加的《华商报》。全面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新华社总社社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华侨大学校长、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连贯**（1906—1991），原名学史，广东大埔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党支部书记兼华侨工委委员。在省港大营救中主要负责与部队、前东和后东特委以及韶关党组织的联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等职。

**乔冠华**（1913—1983），又名乔木、于怀，江苏盐城人。省港大营救主要负责人。1942年1月，到韶关与“侨兴行”经理陈炳传等一起建立接应香港文化人的联络站。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任《时事晚报》总编辑，以“乔木”笔名发表政论、评论文章。后任《群众》周刊主编、《新华日报》编辑。1946年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外交部部长等职。1971年11月，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第26届联大会议并发表讲话，标志着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

刘少文（1905—1987），原名国章，化名张明，河南信阳人。“港九疏散委员会”核心成员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苏联留学。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中共中央交通处港澳办事处处长、南方局交通处处长。在省港大营救中与梁广、潘柱等留港，担负具体的香港方面的联络营救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潘柱（1916—2000），初名桢干，又名静安，香港人。在省港大营救中与李健行、何鼎华等负责执行营救的线路、交通站、护送等工作，后期要落实的大营救主要工作是潘柱执行。抗战时期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机要部门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银行驻香港总稽核室副总稽核。

廖安祥（1907—1997），广东梅县人。爱国商人，省港大营救交通站的重要建设者，1942年在惠州开办“源吉行”，秘密协助卢伟如开展营救中转工作。柳亚子赋诗称其为“梅州大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香港亚洲（集团）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1994年被梅州市人大常委会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张文彬（1910—1944），原名纯清，湖南平江人。省港大营救主要负责人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书记。1942年1月在白石龙村主持召开了一系列重要军事会议，对进一步开展广东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1942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1944年8月牺牲于江西泰和监狱。

梁广（1909—1990），广东新兴人。“港九疏散委员会”核心成员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部长、香港工代会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期间，曾任中共粤南省委书记、广东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长等职，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在省港

大营救中与刘少文、潘柱等留港，担负具体的香港方面的联络营救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州市副市长等职。

**尹林平**（1908—1984），原名先嵩，曾用名尹利东、林平，江西兴国人。省港大营救主要负责人之一。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2月，任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时设第一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曾生**（1910—1995），原名振声，曾用名子屏，广东惠阳人。在省港大营救中率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负责文化名人的护送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2月任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队长。1943年12月，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1949年夏秋，率两广纵队南下，解放两广。1955年授少将军衔。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王作尧**（1913—1990），广东东莞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省港大营救中主要与尹林平负责从九龙到宝安沿途的警戒、经费、食宿问题。1942年任东江军政委员会委员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防空司令部第一副司令员等职。

**杨康华**（1915—1991），原名虞焕章，又名杨任康，浙江会稽人，生于广州。“港九疏散委员会”核心成员之一。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起历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东南特委宣传部部长、中共香港市委书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到东江抗日游击区，投身抗日武装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广东省副省长等职。

**李健行**，在省港大营救中与潘柱、何鼎华等负责执行营救的线

路、交通站、护送等工作。抗战时期为东江抗日游击队长期派驻港九地区负责物资采购运输的交通员，1942年护送廖承志等人至惠阳抗日根据地。

**黄施民**（1921—2003），原名玉宇，广东南海人。在省港大营救中与杨康华、刘少文、潘柱等人负责寻找、联络爱国人士的任务。1938年参加革命，抗战时期曾任中共香港市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和宣传部副部长、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广东省政协常委等职。著有《深圳风华词集》《南窗诗钞》等。

**张友渔**（1898—1992），原名象鼎，字友彝，山西灵石人。政治学家、法学家、新闻学家。1927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兼秘书长，主办《国民晚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燕京大学教授。1937年后，历任《华商报》总主笔、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新华日报》社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著有《中国宪政论》《法学基础知识讲话》《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问题》等。主编有《辞海·法学卷》《世界议会词典》《历史大地图集》《中国法学四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中外法律大典》等大型工具书，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韩幽桐**（1908—1985），原名桂琴，黑龙江宁安人，回族。张友渔夫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妇女之友》编辑部副主任。1937年留学回国，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并从事抗日救国活动。皖南事变发生后，被派往香港开展统战工作，并参加党在香港的刊物《知识青年》编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教育部副司长、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厅副厅

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

**邓文田**（？—1985），广东五华人，生于香港。爱国民主人士。邓文钊之兄。1941年中共在港创办《华商报》，邓文田出任督印人兼总经理，副总经理为范长江，总编辑是胡仲持，总主笔由张友渔担任，工作人员有邹韬奋、金仲华、乔冠华等，邓文田资助4万元自办印刷厂，使报纸顺利出版。解放战争时期，为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和解放海南岛，提供汽油、大米等物资。

**邓文钊**（1908—1971），广东五华人，生于香港。爱国民主人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后在香港从事金融业工作。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与胞兄邓文田冒险将自己经营的崇德堂进出口庄腾出作为办事处地址和支援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抗日战争的中转站。抗战胜利后，回到香港恢复出版《华商报》，出任董事长兼督印人，并掩护中共地下工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广东省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省侨委副主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广东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省副省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广东省政治学校（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校长等职。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左联执行委员，组织发起左翼戏剧家联盟。全面抗战爆发后，主编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后到广州、桂林、香港等地创办进步报刊，又到重庆主编《新华日报》副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日友协会长，中顾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

协常委。

**柯麟**（1901—1991），广东海丰人。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医学教育家。1924年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避难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1936年为照料叶挺将军，移居澳门，以医生身份开展社会活动，先后任澳门镜湖医院院长，镜湖医院慈善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澳门南通银行董事长等职。香港沦陷后大力救助逃往澳门的文化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州中山医学院（后改名中山医科大学，今并入中山大学）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委员等职。

**陈曼云**（1907—1976），广东南海人。蔡楚生夫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肄业于日本明治大学。1930年回国后在香港、广州、上海、浙江等地任中共交通员、电台译员、联络员等职。省港大营救期间，奉命潜伏，直到营救任务结束后才离开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联络处副处长、国外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全国妇联第二、三届执委。

**黄冠芳**（1911—？），广东宝安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香港沦陷后，率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武工队，进驻新界西贡地区，秘密开展对日游击战，先后担任武工队长、短枪队长和港九独立大队大队长。曾率领短枪队护送廖承志、胡蝶等众多文化名人经西贡转往深圳游击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粤中军区后勤部部长、澳门南光公司经理、佛山地区统战部部长、佛山地区行署专员等职。

**刘黑仔**（1919—1946），原名锦进，广东宝安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的同时，受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遣率领武工队进入港九地区。1942年元旦后参加营救被日军困在香港的著名文化人士的工作。2月后任港九大队短枪队副队长、队

长。1944年带领短枪队将中美联合空军飞行指挥克尔安全转移到东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1946年5月，在南雄县界址圩遭遇国民党军队埋伏，英勇牺牲。

**江水**（1917—？），广东宝安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港九大队武工队队长、东江军政干校第一队队长、北江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后勤部军械部副部长。

**谢一超**（1903—1945），原名源禄，广东海丰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海陆丰三次工农武装起义，失败后避往南洋。参与华侨青年回乡服务团、青抗会、救乡会等组织。1939年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香港沦陷后，专门护送何香凝、柳亚子等往海丰、兴宁等地。随后在老隆设立临时联络点，继续负责接待从香港抵老隆的爱国民士及文化界人士邓文钊等人的转移工作。1945年病逝。

**陈炳传**（1908—1969），一名启昌，又名劲军，广东梅县人。梅县早期中共党员及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时期在梅县、丰顺参加中共武装斗争，与其父陈卓民被通缉，举家逃往南洋。在马来亚参加救国运动，被英国殖民政府驱逐出境，回到家乡。1940年任地下党开设的侨兴行经理。1942年以侨兴行为掩护，协助转移从香港逃出的文化人柳亚子、陈汝棠等，将邹韬奋接到梅县江头村其家中隐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兴梅专区财经委员会委员兼专署财政科长、华南农垦总局计划处处长、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文革”期间遭迫害而死。

**黄秋耘**（1918—2001），广东顺德人，生于香港。曾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干部，香港沦陷后护送科学家和儿童文学作家高士其逃离香港到内地。后任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一支队司令部参谋。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州军管会文艺处组长、《南方日报》编委、中央联络部研究员、新华社福建分社代社长、《文艺学习》常务编委、《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羊城晚报》编委、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等。著有《黄秋耘自选集》《风雨年华》等。

## 二 经东线被营救的名单（部分）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笔名韬奋，江西余江人，生于福建永安。著名记者、出版家。1926年任上海《生活周刊》主编，后在各地创办生活书店60余家。香港沦陷后，在宝安白石龙村居留两个多月，留下“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打倒法西斯，必须有人民的枪杆子，也必须有人民的笔杆子”的名言，后经梅县、韶关到苏北解放区。1944年因病去世，留下遗嘱，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事业给予高度评价。1993年，“韬奋新闻奖”设立，自2005年起与“长江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

**沈粹缜**（1901—1997），江苏吴县人。邹韬奋夫人。1926年与邹韬奋结婚，之后长期协助其工作。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韬奋基金会名誉理事等职。是全国妇联第三、四、五届执委，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笔名茅盾，浙江嘉兴人。称这次省港大营救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

及社会活动家。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先后发表《子夜》《林家铺子》等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1981年，“茅盾文学奖”设立。

孔德沚（1897—1970），浙江人。茅盾夫人，1918年与茅盾成婚。后经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茅盾一起参加了五卅运动，逐渐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抗日战争期间，随同茅盾辗转香港、新疆、延安、重庆、广州、桂林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茅盾进京，受周恩来嘱托照顾茅盾。

张铁生（1904—1979），又名铭鼎，江苏高邮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赴德留学，在柏林大学研究院专攻哲学，曾任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1938年回国后，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员、国际新闻社编辑，并在香港等地主编《世界知识》《青年知识》等刊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亚非学会秘书长、中非友协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1959年协同周扬筹建亚非研究所，负责出版《亚非译丛》。著有《近代国际关系史》《中非交通史初探》，译有《实践理性批判》等。

宋之的（1914—1956），原名汝昭，河北丰润人。剧作家、报告文学家。1930年5月28日首次以“宋之的”为笔名在《新晨报》副刊发表处女作《黎曙》。从事革命戏剧活动，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主要作品包括话剧《谁的罪》《雾重庆》《国家至上》，电影剧本《无限生涯》，歌剧《打击侵略者》，古典歌舞剧《九件衣》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文艺》总编辑。

胡绳（1918—2000），原名项志述，笔名蒲韧、卜人、李念青、沈友谷等，浙江钱塘人，生于江苏苏州。中国著名哲学家、

近代史专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起在香港任《大众生活》编委。1942年后，在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新华日报》社编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吴全衡**（1918—2001），江苏常熟人。胡绳夫人。1941年2月至1942年1月任香港中国通讯社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

**李伯球**（1904—1986），又名琳，广东梅县人。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32年加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西安事变后，在广州主编《南针》周刊。1941年到香港参与《光明报》创办工作，同时以第三党人身份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1947年参与民盟中央的改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协委员、省农林厅副厅长、民盟南方总支部港九联席会议执行小组副组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于伶**（1907—1997），原名任禹成，江苏宜兴人。剧作家、导演、演员。1932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组织秘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左翼电影戏剧的创作和理论工作。1938年参加筹建上海剧艺社。皖南事变后转移至香港，为香港播下话剧种子。1943年参与组织中国艺术剧社。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恢复上海剧艺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代表作有《七月流火》《长夜行》《夜光杯》《夜上海》《女子公寓》等，合作电影剧本有《聂耳》。

章泯（1906—1975），原名谢典、谢韵心，笔名杜山、陆擎，四川峨眉人。剧作家、翻译家、话剧和电影导演。1929年起从事戏剧导演工作，并创作剧本。1931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被选为执行委员。1935年任剧联编导部主任。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反侵略斗争。1938年至1945年先后在桂林、武汉、香港、重庆等地执导了《夜光杯》等剧目；创作了一系列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映人民疾苦的剧本，如《我们的故乡》等，撰写了《论战时工农演剧》等专著。和郑君里合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第一卷，和万籟天合译《电影导演基础》等。1955年调北京电影学校工作。北京电影学院成立后，历任副院长、代院长、院长、党委书记等职。

戈宝权（1913—2000），笔名葆荃、北辰、苏牧等，江苏东台人。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苏联文学专家、外交家。1935年起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联记者。后担任《新华日报》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首任驻苏联临时代表，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国外的第一位外交官。翻译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各国文学著作多部，著有《中外关系史》《翻译史》《作家论》。编著有《戈宝权译文集》《普希金在中国》等。

沈志远（1902—1965），浙江萧山人。经济学家，哲学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成名之作《新经济学大纲》于1934年初版，翻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于1936年出版。全面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重庆生活书店副总编辑、香港达德学院教授兼系主任、香港《大众生活》周刊编辑，主编季刊《理论与现实》。1944年以救国会成员身份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1月任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代理主任。1949年6月被选为《共同纲领》起草小组成员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成立后，历任出版总署编译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著有《社会科学基础》《新经济学大纲》，译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

**刘清扬**（1894—1977），天津人，回族。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妇女运动领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并加入旅欧共产主义小组。1941年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香港九龙创办中华女子学校。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和妇女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

**廖沫沙**（1907—1990），原名家权，笔名繁星、楚容、野容、达伍、熊飞、闻璧、怀湘等，湖南长沙人。中国现代作家、杂文家。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远东日报》《抗战日报》《救国日报》编辑、香港《华商报》编辑主任、重庆《新华日报》编辑主任、《华商报》副总编辑兼主笔等。曾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而三次被捕入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全国第三、五、六、七届政协委员，北京市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等职。1961年9月，北京市委刊物《前线》为廖沫沙、邓拓和吴晗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三人轮流撰稿。著有《廖沫沙文集》。

**袁水拍**（1916—1982），原名光楣，笔名马凡陀，江苏吴县人。诗人。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历任重庆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候补理事兼会刊主编，同时从事诗歌创作。1949年调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兼《人民文学》《诗刊》编委。1961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著有通讯文集《华沙·北京·维也纳》、论文集

《文艺札记》、诗集《马凡陀的山歌》《沸腾的岁月》《歌颂与诅咒》等12种，译作《马克思主义与诗歌》《巴黎的陷落》等13种。1976年任文化部副部长。

许幸之（1904—1991），安徽歙县人，生于江苏扬州。中国电影导演，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作家。1924年赴日本留学。1929年回国，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科主任，为左联发起人之一，当选为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主席。1935年导演故事片《风云儿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科教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作品有《巨手》《海港之晨》《红灯柿》《伟人在沉思中》等，出版有《许幸之画集》，论文有《时代美术社宣言》《新兴美术运动的任务》《法兰西近代画史》《罗丹的雕刻》等。

黎澍（1912—1988），湖南醴陵人。历史学家。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创办《火线下》，后任《观察日报》《开明日报》总编辑。1940—1941年在桂林、香港任国新通讯社经理，1943年任《华西晚报》主笔，1946年任上海《文萃》周刊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新闻总署、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任职。198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晚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著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等。

凤子（1912—1996），全名封凤子，原名季任，笔名禾子，广西容县人。演员、作家。1949年前，在武汉、上海、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参加话剧和电影演出。曾任桂林《人世间》月刊编辑、上海《人世间》月刊编辑、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有长篇小说《无声的歌女》，散文小说集《废墟上的花朵》《八年》《旅途

的宿站》等。

**特伟**（1915—2010），原名盛松，广东中山人，生于上海。动画导演、美术家。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日漫画宣传队，编辑《战斗画报》漫画版。1941年赴香港，与张光宇等组织新美术会，为《华商报》编辑《新美术周刊》。出版《特伟讽刺画集》和《风云集》，年底赴桂林，与黄新波、叶浅予等举办“香港的受难”画展。1947年在香港参加人间画会，发表长篇漫画《大独裁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从事美术电影的编导工作。1951年，执导个人首部动画短片《小铁柱》；1954年执导动画短片《好朋友》，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奖美术片二等奖；1956年与李克弱联合执导动画短片《骄傲的将军》；1960年执导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短片《小蝌蚪找妈妈》，获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美术奖；1963年与钱家骏联合执导水墨动画短片《牧笛》，获丹麦顾登塞国际童话电影节金质奖；1976年与沈祖慰联合执导动画短片《金色的大雁》；1985年与严定宪、林文肖联合执导动画电影《金猴降妖》，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1988年执导动画短片《山水情》，获第一届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大奖。

**任白戈**（1906—1986），原名承煜，四川南充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后历任上海左联宣传部长、秘书长，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教育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任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中共八大代表。

**叶以群**（1911—1966），原名元灿、华蒂，笔名以群，安徽歙县人。文艺理论家。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斗》《上海文学》《收获》等杂志主编或副主编。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

抗敌协会，任该会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编委。后根据周恩来的安排，赴重庆协助茅盾做文艺领导和组织工作，有“茅盾的参谋长”之誉。1948年被派往香港主持文艺通讯社，开展对海外华侨文艺社团和报刊的通讯及联络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文学》和《收获》副主编等职。

**周钢鸣**（1909—1981），原名刚明，笔名周达、康敏，广西罗城人。文艺评论家、作家。1932年参加左联。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救亡日报》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南文联副主任，广西省文化局局长，广东省文联、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广东分会主席。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歌词《救亡进行曲》，论文集《论文艺改造》《怎样写报告文学》。

**徐伯昕**（1905—1984），笔名徐吟秋、徐味冰、赵锡庆，江苏武进人。出版家。1926年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1932年起和邹韬奋一起创办生活书店，历任经理、总经理，利用书店广泛联系文化出版界的进步知识分子。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7月，根据中共指示转移至香港，继续积极从事爱国民主活动。1948年在香港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1949年4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管理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文化部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秘书长、第五届中央秘书长、第六和第七届中央副主席。

**杨刚**（1905—1957），原名季微，学名缤，湖北沔阳人，生于

江西萍乡。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1938年任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主编。1944年至1948年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员，在美国从事新闻采访，并根据党的安排做国际统战工作。1948年11月，担任天津《大公报》副总编辑、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职。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共八大代表。

丁聪（1916—2009），别名小丁，上海人。漫画家、舞台美术家。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救亡漫画》杂志作画，在上海、香港等地编辑《良友》《大地》《今日中国》等画报。1942年在桂林、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担任《钦差大臣》《正气歌》《北京人》等美术设计，同时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后在上海主编《清明》文艺杂志。1945—1947年在上海发表过不少较有影响的以“争民主”为题材的讽刺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经常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作品，1979年《读书》创刊起，他的漫画专栏，始终没有中断过。1987年，丁聪根据省港大营救的经历创作《东江百日杂忆》组画。

叶籁士（1911—1994），原名包叔元，笔名叶籁士、罗甸华、索原等，江苏吴县人。文字改革专家、语言学家、出版家。1932年任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负责人。1938年初参加由周恩来领导、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受党组织委派前往香港主持新文字学会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人民出版社（即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前身）首任社长，人民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兼第一副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党组书记。

殷国秀（1920— ），江苏无锡人。叶籁士夫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重庆生活书店编辑部担任校对文书。抗战胜

利后，先后在山东《大众日报》、山东新华书店、华东新华书店、华东人民出版社工作。

**高汾**（1920—2013），江苏江阴人。记者。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在茅盾领导的文艺通讯社工作。香港沦陷后，在重庆《新民报》和上海《大公报》任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大公报》首都记者组组长、报社工会主席。

**戴英浪**（1906—1985），广东惠阳人。画家、木刻家。1927年加入马来亚共产党。1938年以素描参加英国皇家画家学会展获银质奖章。因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40年被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经香港到上海，后在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任美术系教授。广州解放后任《新商晚报》总编辑。1951年到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任总务处长、副教授。

**于毅夫**（1903—1982），原名成泽，笔名洪波、逸凡，吉林双城（今属黑龙江肇东）人。1933年起参加中共地下情报工作。1935年起在东北人民抗日会工作，主办会刊《东北之光》。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与领导成立东北救亡总会，任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38年往重庆，任中共东北救亡总会党团书记兼《反攻》半月刊总编辑。1941年春转移至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调查研究室主任。1945年11月任嫩江省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吉林市委书记、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吉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陈汝棠**（1893—1961），广东高明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孙中山北伐期间任中将军医总监兼陆军军医司司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医处长。全面抗日战争期间任第四军军医处看护干部训练班主任、广东省救护团团长、广

东省赈济委员会救护总队队长等职。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南方总部副主委。1948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驻港办事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卫生厅厅长、华南联合大学副校长、广东省副省长、广东省政治学院（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校长等职。

**张明养**（1906—1991），浙江宁海人。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复旦大学教授、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国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民进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

**杨潮**（1900—1946），笔名羊枣等，湖北沔阳人。早年在上海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工作，后从事电影、戏剧等文化进步活动。1933年加入左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三”事变后，在上海协助于伶等组织抗日戏剧活动。1939年离沪去香港，任《星岛日报》记者、编委。香港沦陷后被营救离港赴广西桂林和湖南衡阳，主编《大刚报》；1944年在福建永安主持《民主报》。曾创办进步刊物《国际时事研究》。1945年7月被捕。1946年1月被国民党特务暗害于杭州。

**胡蝶**（1908—1989），原名瑞华，广东鹤山人，生于上海。著名影星，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1933年主演中国首部左翼电影《狂流》。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前往香港，拍摄了古装片《绝代佳人》、爱情片《孔雀东南飞》等影片。1960年凭借主演的爱情片《后门》获得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1966年拍完《塔里的女人》后结束了电影生涯。

**胡仲持**（1900—1968），字学志，笔名仲持、宜闲等，浙江上

虞人。编辑、翻译家。大革命时期在其兄胡愈之倡导下，曾编《上虞声》周报。1928年任《申报》电讯编辑、国际版主笔。全面抗战爆发后，与梅益、王任叔等合办《译报》《译报周刊》《集纳》等。翻印出版毛泽东《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等，与其兄翻译出版《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1940年被迫转香港，任《华商报》副总编辑。香港沦陷后，辗转昭平编《广西日报》。后任新加坡《南侨日报》驻港特派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解放日报》编委、《人民日报》国际资料部主任、中联部亚非研究所研究员、外文出版社图书编辑部副主任等职。译有《世界文学史话》《愤怒的葡萄》《森林里的悲喜剧》《月亮下去了》《白痴》《俄罗斯母亲》等。著有《世界性的风俗谈》《三十二国风土记》。

恽逸群（1905—1978），原名钥勋，字长安，后名逸群，笔名翊勋，江苏武进人。记者，中共情报工作者。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浙江萧山县委书记、浙北特委秘书长，后建立浙江省第一个中共地下支部。1932年到上海，在新声通讯社当记者。1934年加入中共地下情报系统。1936年受邹韬奋邀请，往香港协办《生活日报》及《生活日报周刊》，后回上海任《立报》主笔。1939年出走香港，负责国新社香港分社工作。香港沦陷后，受中共地下党之命回到上海，进入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身份是上海编译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解放日报》社长、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等职。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蒙冤入狱。1984年平反。

胡耐秋（1907—2003），江苏丹阳人。编辑。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参加上海妇女界救国会。1937年后任生活书店《抗战》、《全民抗战》期刊助理编辑，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秘书、人

事委员会委员。后任妇女生活出版社社长、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妇联国际宣传部部长、书记处书记。

**黄药眠**（1903—1987），原名访、恍，笔名达史、黄吉、番茄等，广东梅县人。政治活动家、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工作者。早年开始新文学创作。1927年参加创造社，出版诗集《黄花岗上》。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往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1933年回国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因叛徒出卖被捕。全面抗战爆发后保释出狱，赴延安在新华社工作。1938年参与创办国际新闻社，任总编辑。皖南事变后逃亡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从事国际宣传工作。香港沦陷后，回到家乡梅县，潜心著述。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再赴香港，主编《民主与文化》，兼农工民主党机关刊物《人民报》主笔。参与创办达德学院，任文哲系主任。同时主编中国民主同盟刊物《光明报》，兼任中华文协香港分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参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职。

**胡风**（1902—1986），原名光人，又作光莹，湖北蕲春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33年被日本驱逐出境，回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宣传部长、书记。全面抗战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皖南事变后到香港，为《华商报》《笔谈》等撰稿。香港沦陷后在东江游击队帮助下，转迁桂林，创办南天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被打为“胡风反党集团”，入狱24年。1979年平反。

**杨东莼**（1900—1979），湖南醴陵人。马克思主义教授、学

者。青年时代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湖南省总工会宣传部长兼工人日报社社长，为湖南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日本。1930年回国后，任中山大学等校教授。1938年任湖南省政府高级参议。1939年任广西地方行政干部学校教育长。皖南事变后到香港，参加全国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香港沦陷后在中共安排下回桂林。后到乐山任武汉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曾回香港任达德学院代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等职。

沙蒙（1907—1964），原名刘尚文，艺名沙蒙（法文“骆驼”音译，意为“负重道远”），河北玉田人。著名导演、编剧、演员。1933年参加左翼戏剧活动，先后加入新地剧社、晨曦剧社、大地剧社等，参与《罗密欧与朱丽叶》《大雷雨》等演出，拍摄《夜半歌声》《十字街头》等影片。1937年参加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及救亡演剧队第三队，先后在武汉、长沙、信阳、衡阳等地从事抗日演出。1941年皖南事变后到香港，任旅港剧人协会理事、导演、演员。香港沦陷后被东江游击队营救，曾为游击队员演出抗日活报剧。后到桂林。1942年到重庆，参与组建中国艺术剧社。1944年到延安。1948年任东北电影制片厂（今长春电影制片厂）管委会委员、艺委会副主任、编导组党组组长。1957年当选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副主席。1960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导的电影《赵一曼》《上饶集中营》《丰收》《上甘岭》《汾水长流》等，广受欢迎。

赵树泰（1912—1987），艺名施威。香港电影演员及监制。大观片厂厂长及演员，代表作有粤语国防电影《小广东》（1940

年6月8日公映，1940年的粤语片卖座冠军）及粤语国防电影《小老虎》（1941年5月2日公映）。提拔新星张瑛、梅绮、冯峰及导演罗志雄及罗君雄。1965年后到美国，任职美国旧金山准声戏院。

**李枫**（1912—1984），原名成乐，又名学萍、端民，广东斗门（今属珠海）人。1939年到澳门任《大众日报》编辑。1940年任香港大观影片公司宣传部主任、编剧，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港创办中原剧艺社，接纳一批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后又投资合办中侨旅行社、新中洋行、茂生船务行等，作为党的活动据点。1948年遭港英当局通缉，乃到台山，任滨海纵队政工队指导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翻译组副主任、珠江电影制片厂宣发科副科长、致公党广东省委主任秘书等职。

**蓝马**（1915—1976），原名董世雄，浙江余杭人，生于北京。影剧演员。1934年参加中国旅行剧团。1939年随中国救亡剧团赴香港、新加坡等地演出。1942年在重庆参加中国艺术剧社，主演话剧《戏剧春秋》。1946年后参加上海剧艺社。次年转入昆仑电影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总政文工团副团长。参演话剧《万水千山》，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表演一等奖。

**盛家伦**（1910—1957），广东中山人，生于汉口。作曲家。1935年在上海参与组织业余合唱团，从事抗日救亡歌咏运动。1937年为著名电影《夜半歌声》配唱主题曲。1938年任中国电影制片厂作曲，为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塞上风云》谱写主题歌。与光未然合作《抗日游击队歌》，后为舞台剧《为自由和平而战》《民族万岁》《小人物狂想曲》《吃耳光的人》《戏剧春秋》《复活》等作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

**胡考**（1912—1994），浙江余姚人，生于上海。小说家、文艺

理论家、漫画家。1937年任武汉《新华日报》美术编辑，1938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教员。1940年到重庆，次年赴香港，参与创建新美术社。香港沦陷后经东江返上海。后到新四军军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苏北画报》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著有《胡考素描》及长篇小说《上海滩》。

**成庆生**（？—1959），1939年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委派，任广西地方教育干部学校教员。后到香港。香港沦陷后撤回内地，抗战胜利后再到香港。1949年任香港中业学院院长。

**叶方**，教育界人士。曾任广西地方教育干部学校指导员，中共支部委员。

**王显章**，台湾籍爱国商人。香港沦陷时，经中共营救，由九龙经西贡坐船到惠阳游击区。为尹林平好友，借给尹林平10万元，充作省港大营救的后期经费。

**俞颂华**（1893—1947），名垚，又名庆尧，笔名澹庐，江苏太仓人。1919年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1920年赴苏俄采访，为最早采访十月革命后苏俄的中国新闻记者之一。1932年任《申报月刊》主编，并创办《新社会》半月刊。1936年西安事变后赴延安采访，在国统区最早报道中共抗日主张和陕北情况。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到湖南芷江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新闻系教授。1940年到香港任《星报》总主编。1941年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总编辑。香港沦陷后转移到桂林，任《广西日报》主笔。1943年到衡阳任《大刚报》总编辑。1946年到苏州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主任。1947年10月病逝。

**陈策**（1893—1949），又名明堂，字筹硕，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国民党海军中将。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5年策动“宝

璧”“江巩”舰起义反袁。1917年任广州大元帅府参议。1920年任广东航政局长。1922年任长洲要塞司令、广东海军陆战队司令、大本营第四路游击司令、广东海防司令及江防司令。1927年任军事委员会海军局顾问、国民党广东“清党”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委员、海军第四舰队司令、第一舰队总司令兼海军学校校长。1931年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海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海军事务处处长。1936年任广东江防司令、虎门要塞司令、海军部次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指挥虎门要塞守军，多次击退日军进犯。1938年6月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国民政府驻香港军事代表。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前后，参与指挥抗战，从香港突围到大鹏，在中共游击队接应下，安全回到内地。1942年5月授海军中将军衔。1945年任广州军事特派员、广州特别市市长。1946年当选“国民大会”代表，任国民政府顾问。1949年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同年去世。

上官德贤，山东商河人，上官云相之妹，余汉谋夫人。1938年，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将其疏散到香港九龙。1941年12月香港沦陷，避居新界沙田。1942年1月下旬，在中共东江游击队港九大队手枪队长刘黑仔等护送下，经西贡、小梅沙、田心、淡水等地，安全回到惠阳。

### 三 经西线被营救的名单（部分）

范长江（1909—1970），原名希天，四川内江人。1933年起先后为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等撰稿。1935年沿红军长征路线做考察采访，所写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首次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曾作《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

锁，向人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8年，与恽逸群等创办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与胡愈之等创办国际新闻社。1939年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在香港与邹韬奋等创办《华商报》。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和平的一个窗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等职。1991年，“范长江新闻奖”设立，2005年起与“韬奋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广西桂林人，生于北京。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1941年与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并任常委，并代表民盟在香港创立机关报《光明报》出任社长，呼吁各党派一致抗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著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中国人》《唯识述义》《读书与做人》等。

沈谱（1917—2013），字筱婵，小名又菊或幼菊，浙江嘉兴人，生于北京。沈钧儒之女，范长江夫人。由邓颖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与范长江结婚。1941年随范长江到香港，参加《华商报》编辑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科研设计院制浆造纸研究所副所长、轻工业部科研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陆浮（1915—1993），广东兴宁人。1941年在香港参加《华商报》筹建工作，1947年和夏衍同去新加坡参加《南洋日报》工作。1949年在党组织安排下回国，先后在新闻总署、《新观察》杂志、

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陈此生**（1900—1981），原名勉勤，广西贵县人。曾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香港达德学院等学府任讲师、教授、教务主任等。1933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后在香港参与组织筹建抗日救国会华南区总部的工作。194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任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广西省文教厅厅长、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西省副省长，《光明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民革中央常委兼副秘书长、宣传部长、副主席等职。1981年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司徒慧敏**（1910—1987），原名柱，广东开平人。中国著名电影技术专家及导演。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广州起义。1937年秋，转到香港开展抗战电影工作，组织和亲自拍摄了《孤岛天堂》《白云故乡》《游击进行曲》和《血溅宝山城》等影片。后参加组织旅港剧人协会，团结在港的电影界、文艺界人士。1943年在重庆担任党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的领导工作，从事革命戏剧活动。抗战胜利后，受党组织派遣，赴美学习电影技术和电影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艺术学会理事长、全国侨联委员会第三届顾问、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华侨摄影学会会长、文化部归国华侨联谊会名誉主席等职务。

**金山**（1911—1982），原名赵默，字缄可，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演员、导演、编剧、制作人。主演作品有《娜拉》《钦差大臣》《保尔·柯察金》等，导演有《上海屋檐下》《丽人行》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主任。2005年，在中国电影诞生100年之际，金山被评为“中国电影百位优秀演员”。

郁风（1916—2007），浙江富阳人，生于北京。画家、美术评论家、散文家。1937年开始随郭沫若、夏衍赴广州创办《救亡日报》，后转粤北四战区从事美术宣传工作，1939年到香港任《星岛日报》及《华商报》编辑。与夏衍、叶灵凤、戴望舒、徐迟、叶浅予、黄苗子等创办《耕耘》杂志，任主编，并参加香港文艺界协会活动。后在桂林、成都、重庆工作，发表散文，举办画展，为话剧团设计舞台服装；任重庆及南京《新民报》副刊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理事，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香港《文汇报》驻京特派员，中国美协副秘书长，《新观察》兼职副主编，《诗书画》半月刊主编等。著有散文集《我的故乡》、文论集《美的世界》等。

谢和庚（1912—2006），广西桂林人。曾是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周恩来亲自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工作。曾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其夫人是演员、作家王莹。

张云乔（1910—2006），浙江余姚（今属慈溪）人。曾任《桃花劫》《风云儿女》等经典影片的美术设计。创作大型壁画《淞沪抗日闸北之战》（又名《血战宝山路》）作为“一·二八”纪念堂主体壁画。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离开上海至武汉，弃影从商。在长沙创办中国汽车贸易公司，以工商业者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56年参加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工作并任美工设计。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常委等职。著有《旧梦拾零》。

郑安娜（1913—1991），浙江宁波人。冯亦代夫人。1939年在香港与冯亦代结婚。1943年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做文化交流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返沪，到宋庆龄创办的福利基金会任秘书。1949年7月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任翻译、口译。与冯亦代合译《年

轻的心》《青春的梦》《当代美国获奖小说选》，用冯之安的笔名独译《吉诃德大神父》和《食人者和传教士》。

**金仲华**（1907—1968），浙江桐乡人。现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社会活动家。抗日战争前后，协助邹韬奋创办《大众生活》《生活日报》《永生》《抗战》《全民抗战》等报刊，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宣传和参加抗日救亡斗争。1938年赴香港编辑《世界知识》和主编《星岛日报》，兼国际新闻社的领导工作和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教学工作，还曾担任香港《文汇报》主笔。1942年初与夏衍、金山离开离港，来到桂林。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新闻社社长和上海市副市长等职。

**王莹**（1913—1974），原名喻志华，又名王克勤，乳名桂贞，安徽芜湖人。表演艺术家、作家。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赴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募捐演出，宣传抗日救国。1942年与未婚夫谢和庚一起赴美留学，受邀在白宫表演话剧，被称为“第一个在白宫演出的中国演员”。主演的话剧、影片有《赛金花》《保卫卢沟桥》等，著有小说《宝姑》《两种美国人》等。

**蔡楚生**（1906—1968），广东潮阳人。电影编剧、导演、制作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编导的影片《渔光曲》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抗日战争期间，编导了《孤岛天堂》《前程万里》等爱国影片。1941年执导的战争电影《前程万里》讲述三位在香港艰难讨生活的男女回内地参加抗战的故事。1947年与郑君里合作编导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合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

李少石（1906—1945），原名国俊，又名李振，号点农，广东新会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香港组织交通站，并担任站长，负责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中转任务。1933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兼中国工人通讯社负责人。1934年2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1937年8月，经周恩来交涉获释，被党派往华南沦陷区工作。1943年调到重庆，任《新华日报》记者兼编辑，实际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秘书、周恩来的英文秘书。1945年10月在重庆红岩咀附近遭国民党士兵枪击去世。

廖梦醒（1904—1988），广东惠阳人，廖仲恺之女，李少石夫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对外宣传机构中国工人通讯社中担任英文翻译工作。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何香凝主持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工作，1938年在香港协助护送白求恩、柯棣华等人前往解放区，随后和廖承志、邓文钊一起筹建由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任宋庆龄秘书，同时负责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委、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千家驹（1909—2002），笔名钱磊，浙江武义人。经济学家。1936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常委。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南方总支部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兼《中国钱币》主编、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端木蕻良（1912—1996），原名曹汉文，又名曹京平，辽宁昌图人，满族。作家。1932年加入左联，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33年

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6—1938年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抗战文学活动。1940年与妻子、作家萧红到香港，主编《时代文学》和《大时代文艺丛书》。香港沦陷时因萧红病重，未随营救文化人的队伍离港，1942年1月萧红病逝后，他在地下党帮助下，经澳门到桂林，后又辗转于重庆、上海等地，继续文学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所著长篇小说《曹雪芹》，影响卓著。

**骆宾基**（1917—1994），原名张璞君，山东平度人，生于吉林珲春。作家。1935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边陲线上》。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发表报告文学《大上海的一日》。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浙江嵊县县委宣传部部长。1940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辗转到香港。香港沦陷时因照顾病重的作家萧红，未随营救文化人的队伍离港，1942年1月萧红病逝后，他在地下党帮助下，经澳门到桂林。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东北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战旗》《文学报》《东北文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等职。

**华嘉**（1915—1996），原名邝剑平，广东南海人。1934年参加上海青年文艺界救国会活动，后任《救亡日报》记者、编辑。《救亡日报》停刊后任香港《华商报》记者。香港沦陷后到桂林。出版报告文学集《香港之战》等。1946年在香港参与创办《人间书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方日报》副刊部主任，华东文艺学院教授、广东省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广州市文联主席等。

#### 四 经特殊路线被营救的名单（部分）

何香凝（1878—1972），原名谏，又名瑞谏，别号双清楼主。广东南海人，生于香港。中国国民党左派代表、政治活动家、女权运动先驱、美术家，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夫人。早年随孙中山参加革命。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1928年因反对国民党反共而辞去国民党内职务。1932年后积极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任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主席兼总务组长。上海沦陷后迁居香港，宣传抗战，争取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支援抗战。香港沦陷时被中共营救逃难到海丰，再到兴宁、韶关等地。抗战胜利后再迁居香港，后参与创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职。

经普椿（1917—1997），浙江上虞人。1938年与廖承志结婚，参加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香港沦陷后经中共营救，随婆母何香凝逃难到海丰、兴宁，在兴宁产子（廖晖）。1946年后在重庆和南京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理事、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顾问等职。

柳亚子（1887—1958），名弃疾，字安如，号亚子，江苏吴江（今属苏州）人。清末创办并主持南社。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政

府通缉，逃往日本。1928年回国，进行反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活动。1940年12月前往香港。因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而被开除党籍。香港沦陷时被中共营救逃难到海丰，再到桂林。后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柳无垢（1914—1963），江苏吴江（今属苏州）人，柳亚子次女。1927年随父逃亡日本。次年返国读书，后就读清华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在就学期间积极参与宣传抗日活动。1938年在上海国际劳动工局中国分局工作。1939年赴香港，任保卫中国同盟秘书。香港沦陷后随父逃难。1949年8月陪宋庆龄北上出席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全国民主妇联、外交部工作。以郑培芳的笔名著有《美帝对台湾的侵略》等书。

高士其（1905—1988），原名仕祺，福建福州人。生物学家、化学家、科普作家、诗人、教育家。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医学博士，其间因实验意外感染甲型脑炎病毒，导致全身瘫痪。1931年开始发表科学文艺作品。1935年与人合著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1949年后创作了大量的科学小品、论文及诗歌。

## 五 被营救的国际友人和盟军人员名单（部分）

赖特（Gol. L. Ride，？—1977），一译林赛·赖德。英军上校，陆军野战救护队总指挥。1942年1月在香港深水埗俘虏营逃脱，经中共游击队营救到东江，后回到英国，促成营救战俘的团体——英军服务团的建立。战后封爵士，任香港大学副校长。其子

爱丁据其所留存资料，整理出版《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五年抗战时期的英军服务团》。

京（Lt. Col. G. King），英军上校。

谭臣（Mr. W. P. T-Homson,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一作汤姆生，港英政府警司。1942年3月逃出赤柱集中营，经中共游击队营救到东江。

祁德尊（Major J. D. C. Clague），英军少校。1942年3月逃出赤柱集中营，经中共游击队营救到东江。

李玉标，港英政府秘书。

摩利，英军海军上尉。1942年1月在香港深水埗俘虏营逃脱，经中共游击队营救到东江，后回到英国。

戴维斯，英军海军中尉。1942年1月在香港深水埗俘虏营逃脱，经中共游击队营救到东江，后回到英国。

波利斯屈特夫人，港英政府运输署负责人。1942年3月逃出赤柱集中营，经中共游击队营救到东江。

夏斯特，英军中尉。

怀特，英军中尉。

比尔斯，英军中尉。

恩维克，英军（不详）。

何文礼（Major R.D.Holmes），英军海军上尉。原为港英政府见习文员，日军侵占香港时，加入陈策将军属下的鱼雷快艇队，后随陈策逃回东江。后到曲江加入英军服务团。1942年7月到港九游击区与东江游击队商谈合作情报和营救战俘等问题。

克尔，美军空军中尉。1944年2月，驾飞机由桂林空袭香港时跳伞到新界，为中共东江纵队营救到东江。

依根，美军十四航空队中尉。1945年1月被东江纵队营救到东江。

克利汉，美军空军少尉，第二舰队飞行员。1945年1月被东江纵队营救到东江。

威廉·列夫柯，美军飞行员，空军中尉航行指挥员兼轰炸员。

佐治·H. 小拉维里尔，美军空军中尉驾驶员。

亨利·M. 爱里斯，美军空军技士。

罗拔·D. 石克，美军空军通讯员兼炮手。

丹尼士·E. 康利，美军空军驾驶员兼机炮手。以上5人于1944年5月在大亚湾被东江纵队营救，后到东江。



附录二

大事年表



1937年7月7日 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

——8月 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8月15日 香港海员工会成立，会长曾生。

——10月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成立，书记张文彬。

——年底 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到香港筹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

1938年1月 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廖承志负总责。

——4月 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书记张文彬。南委撤销。

——5月 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成立。

——6月14日 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主席宋庆龄，日常工作由廖承志负责。

——6月 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成立。

——9月 香港政府颁布新修订的《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加强对香港社会的控制。

——10月11日 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成立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队长王作尧。

——10月12日 日本侵略军在广东惠阳县大亚湾登陆。21日，广州沦陷。

——10月13日 中共中央电示廖承志，要在东江日占区开拓游击区。

——10月24日 中共广东东南特别委员会（简称“东南特委”）在香港成立，书记梁广。

——同日 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在广东惠阳县坪山成立，书记曾生。

——12月2日 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总队长曾生，政委周伯明。

——12月 叶挺在深圳圩成立东路守备区总指挥部，中共领导的武装曾生部和王作尧部归其指挥。不久，叶挺受中央指示赴重庆，东路守备区总指挥部结束，由东南特委善后，余部后来参与了大营救。

1939年1月1日 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在东莞苦草洞成立，大队长王作尧。

——1月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惠阳淡水成立，团长叶锋。

——1月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成立。

——年初 金山、王莹率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到达香港并改名中国救亡剧团。

——2月 国际新闻供应社和国际新闻社在香港合并，成立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

——3月 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成立。

——4月 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改称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直属大队，大队长王作尧。

——4月 保卫中国同盟的英文会刊《保盟通讯》在香港创刊，主编爱泼斯坦。

——4月 中国新闻学院在香港创立，院长郭步陶。

——4月 中国漫画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香港举办抗战漫画展览会。

——5月 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

新编大队，大队长曾生。

——5月 东江军事委员会在坪山成立，书记梁广。

——上半年 东江游击队在香港创办《东惠》半月刊，主编孙钊。

——8月中旬 日军进占深圳和沙头角，与新界英军对峙。

——11月 日本特务岩井机关在香港创办《二十世纪》杂志，主笔恽逸群。该刊实由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掌握。

1940年5月29日 港英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疏散英国妇孺。

——6月 中共粤南省委在香港成立，书记梁广。

——6月22日 日军进行广九作战，重占深圳和沙头角，封锁中英陆路边界。随后，港英政府宣布香港进入非常时期。

——7月3日 广东军政长官余汉谋、李汉魂专电香港赈济委员会，宣达国民政府欢迎香港同胞回内地意旨。

——8月3—5日 香港文协、漫协和木刻协会联合举办鲁迅先生六十诞辰纪念木刻展览会。

——9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

——9月 王作尧率36人到宝安县龙华地区，开辟阳台山根据地。根据地中的白石龙村，后来成为大营救的指挥中心。

——9月 曾生、王作尧两部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

——10月1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凯丰，副书记周恩来。11月凯丰返延安，南方局文委由周恩来负责。

——11月 南委再次在广东大埔县成立，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香港属其领导范围。

1941年1月 “皖南事变”发生。

——1—6月 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委组织和动员了大批重庆的党内外文化人士疏散和转移，其中转移到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士达100余人，如茅盾、邹韬奋、李公朴、胡风、胡绳、宋之的、王莘、叶以群、张友渔、韩幽桐、叶籁士等。

——2月10日 廖承志致电中共中央、周恩来，提议在港办《华商晚报》，由邓文钊等做老板，胡仲持任总编辑，廖和范长江、夏衍、恽逸群任编委，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

——2月24日 邹韬奋因生活书店受迫害出走重庆，在胡绳陪同下到桂林，3月5日抵达香港。

——2月 夏衍、范长江等文化人由桂林转移到香港。

——3月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曾生部）、第五（王作尧部）大队，相继成立民运部，加强根据地政权、统战等工作。

——3月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社长梁漱溟，总经理萨空了，总编辑俞颂华。

——3月中旬 中国民主保障同盟在香港创办《保盟通讯》，主编金仲华、邹韬奋。

——4月8日 《华商报》创刊，社长范长江，总编辑胡仲持，总主笔张友渔。该报由廖承志直接领导。

——5月17日 《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主编邹韬奋。

——5月 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委员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

——5月 中共香港市委在九龙恢复设立，书记杨康华。

——6月22日 苏德战争爆发。

——6月 南方局成立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亚群。

——9月12日 中苏文化协会香港分会成立，会长颜惠庆。

——10月下旬—12月上旬 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与港英当局秘密谈判合作抗日问题。

——12月7日 周恩来电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廖承志，要求做好应变准备。

——12月8日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日 日军越过罗湖桥，开始进攻香港。日机轰炸启德机场、驻港英军据点和交通设施。日军约三万余人，由深圳出发，分两路攻占新界。英、印、加军退守沙田、垃圾湾防线。

——同日 廖承志召开紧急会议，工委和文化界、新闻界有关人员参加。会议商讨应急措施，决定立即派人与东江纵队联系，以疏散大批进步文化人。决定《华商报》和《大众生活》做好停刊准备。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我对英美政府应建立广泛和真诚的反日反德统一战线：香港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

——同日 周恩来两次急电香港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应派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离港。

——同日 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开始将在九龙的文化人疏散到香港岛。

——12月9日 中国对日、德、意正式宣战。

——同日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发表宣言，提议建立太平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同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再致电廖承志，对撤退在港文化界人士做具体布置。

——同日 国民政府驻港代表陈策成立香港中国抗战协助团，

协助英军抵抗日军。

——同日 宋庆龄召开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部署应变事宜。

——同日 王作尧派曾鸿文小分队进入新界元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之后曾鸿文利用洪门和绿林关系开辟了从九龙经大雾山到白石龙的交通线。

——同日 香港中国航空公司华籍、美籍飞行员在炸弹声中，冒死载客飞离香港，救出宋庆龄、宋蔼龄及平准基金委员会中、英、美三方委员陈光甫、福克斯、霍伯枢等275人。

——12月11日 东江游击队派出短枪队到香港西贡半岛活动，开展游击战，并建立交通线。

——12月12日 《华商报》停刊。《大众生活》此后也不再出版。

——同日 启德机场及九龙沦陷。英军退守香港，与日军隔海湾炮战数日。

——同日 为策应香港英军作战，国民党军进攻坪山、坑梓、淡水、龙岗、布吉、从化等地。

——12月13日 《大公报》停刊。

——同日 东江抗日游击总队为配合英军作战，对广九路、深圳及淡水附近之敌开展攻势，打击日军。15日进攻布吉。20日进攻横岗。

——12月15日 南委书记方方等致电中央，汇报香港战事及广东工作，其中包括：将撤退文化人，有计划输送到桂、曲、梅、漳、泉、赣等地。

——同日 黄冠芳率东江游击队惠阳大队武工队进入新界西贡等地，开辟新交通线和游击区。

——同日 日军占领澳门。

——约12月中下旬 为统一协调指挥香港党组织以及民主、文化界人士撤退，中共在港各组织成立“港九疏散委员会”，核心成员包括廖承志、尹林平、张文彬、连贯、梁广、杨康华、刘少文、李少石、夏衍、张友渔等。

——12月18日 日军在香港北角、铜锣湾、筲基湾、太古、鲫鱼冲登陆。

——12月25日 日军突破跑马地、黄沙涌防线，港督杨慕琦和马尔比少将奉命签署投降书，香港沦陷，守军官兵9000余人被囚于俘虏营。日军封锁香港至九龙海上交通，实行宵禁，同时告示在港知名文化界人士到“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

——同日 国民政府驻港代表陈策将军与英军部分军官和情报官员等60多人，从香港突围到大鹏，在惠东宝游击队接应下，数日后抵达惠州。至次年1月6日抵达韶关。

——12月下旬 梁广率中共粤南省委留在香港开展日占区工作。

——约12月下旬 港九疏散委员会派李少石到澳门，与地下党负责人柯麟医生筹划经澳门到台山或广州湾再到桂林的撤退路线。

——12月28日 日军举行入城式。

1942年1月1日 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由香港偷渡九龙，在九龙与尹林平等会合，布置具体工作，开始实施营救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工作。

——同日 日本在香港成立军政厅。军政厅下设的民政部设立遣返局，并组织“归乡指导委员会”，推行遣返华人政策，预定目标是将香港人口减少到100万人。

——1月2日 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在游击队护送下由九龙出发，次日到达深圳坪山，与张文彬、曾生等会合，布置下一阶段营救和接待工作。

——1月初 日本香港军政厅发出通告，限令所有一无工作，二无居所的华人离开香港，开始遣返华人。趁此机会，港九疏散委员会和游击队决定，让营救对象扮成返乡客离港。

——1月初 连贯到广东龙川县老隆，与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简称“后东特委”）书记梁威林等建立秘密联络站“义孚行”和“侨兴行”商号，以接待香港文化人等。

——1月上旬 经廖承志、连贯、刘少文、夏衍等安排，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机要人员潘柱几经周折找到张友渔、徐伯昕，进而找到一批民主人士、文化人士。

——1月9日 邹韬奋、茅盾、胡绳、叶以群、戈宝权、于伶、恽逸群、黎澍、胡仲持、廖沫沙、殷国秀、高汾等文化名人，由秘密交通员潘柱带领，由香港岛偷渡，次日到九龙。11日，一行人扮成难民，跟向导经荃湾、元朗、梅岭、深圳、梅林坳等，于13日抵达白石龙村，受到东江游击大队领导曾生、王作尧、尹林平等的接见。

——同日 国民参政员、岭南大学原校长钟荣光在香港南塘道，被日军殴打重伤去世。

——同日 英军赖特上校、摩利海军上尉、戴维斯海军中尉及秘书由香港深水埗俘虏营逃脱，12日被东江游击队武工队救出，进入东宝根据地。18日又护送他们去惠州，再转回英国。

——1月10日 范长江、梁漱溟等从香港偷渡到澳门。

——同日 夏衍、张云乔、金山、王莹、司徒慧敏、谢和赓、金仲华等从香港出发，经长洲岛偷渡到澳门。

——1月11日 华嘉、谢加因等人从香港偷渡到长洲岛。3天后再从长洲岛偷渡到澳门。

——约1月上旬 司徒美堂在地下党和游击队帮助下，从香港偷渡到九龙，经大埔、澳头到达东江游击区。

——1月14日 东江游击大队司令部在白石龙村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从香港脱险，被秘密营救出来的文化人。

——1月15日 何香凝、柳亚子两家在地下党谢一超和游击队帮助下，乘船从香港出发到长洲。翌日转乘拆去发动机的轮船偷渡海丰，途中因无风漂泊海上，水尽粮空，遇东江游击队巡逻艇而得救。至24日抵达汕尾港。

——1月17日 范长江、梁漱溟一行5人从澳门偷渡，翌日到达都斛。之后经台山、肇庆等地，至2月5日抵达桂林。

——1月18日 华嘉、谢加因一行9人在范长江安排下，离开澳门，经岐关路到石岐。之后经江门、白石、棠下到肇庆，于1月底到达桂林。

——1月19日 日本设立“香港占领区总督部”，总督矶谷廉介陆军中将。“总督部”下令使用日军发行的“军用券”，以港币2元兑换军用券1元。香港许多人逃回广东避难。

——同日 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张云乔、郁风、王莹、郑安娜等人和广西方面的人共约40多人从澳门偷渡，经南北水到都斛，再经台山、肇庆、柳州等地，2月5日抵达桂林。

——1月20日 邹韬奋为曾生题“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建议把我军办的《新百姓报》和《团结报》合并，改为《东江民报》，并书写了报头。

——同日 茅盾等5名文化人士在游击队护送下离开白石龙村，经平湖上木古村到达茶园，与从香港脱险经海路到沙鱼涌再到田心

村的张友渔等10多人会合。后于2月14日（除夕）到达惠州，入住东湖旅店和水东街东和行。

——1月下旬 由香港撤退到白石龙游击区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人员刘澄清等，建立电台并接通了同延安的联系。

——1月25日 东江游击总队收复淡水。

——1月下旬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干部会议在宝安县白石龙村召开，成立新的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林平，委员：梁鸿钧、曾生、王作尧、杨康华、谭天度、黄宇；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梁鸿钧，政治委员林平，对外称曾生、王作尧为正副总长。

——1月下旬 端木蕻良、骆宾基从香港偷渡到澳门。

——1月下旬 后东特委在龙川县老隆等地建立营救文化人的中转站。

——1月下旬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一行，在东江游击队港九大队刘黑仔等护送下，由新界沙田，经西贡、小梅沙、田心、淡水等地，安全回到惠阳。

——1月 国民党广东省政府（驻韶关）成立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救济和安置由港九逃回内地的难民。

——约1月 千家驹等在秘密交通员潘柱帮助下，由香港偷渡到广州湾（今湛江）。

——1—4月 东江游击队共营救出约1000多名工人、学生、职员、医务工作者等，其中约五六百人报名参加刚成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游击总队成立干部训练队来培养这批港澳青年。

——2月3日 何香凝、柳亚子两家在东江水上游击队保护下到达海丰马贡港，居南新村。9日，何香凝移居海丰县城，在红场做演讲。至2月下旬，何香凝、经普椿母女转往兴宁县罗翼群家。

——2月4日 日军攻占惠州，血洗4天后退出。

——2月上旬 周恩来致电方方，关于接待柳亚子、邹韬奋等事，嘱即移交廖承志指定专人负责。

——2月上旬 东江游击队司令部将一批文化人转移到宝安县阳台山。

——2月14日（除夕） 香港艺人关文清、吴楚帆、黄曼梨、白燕、卢敦、谢益之等，因拒绝为日本人拍摄电影而逃往广州湾。

——2月17日（正月初三） 茅盾等文化人离开惠州，经东江到老隆。后经韶关，于3月9日到达桂林。

——2月中下旬 胡风、张友渔等文化人离开惠州，经东江到老隆。后经韶关，到桂林等地。

——2月20日，日本宣布香港为“占领地”，正式任命矶谷廉介中将为“香港总督”。

——2月27日 中央书记处致张文彬、林平、梁广、周恩来电报，同意张文彬、林平暂时设立电台与中央联络。

——2月底 李少石、廖梦醒夫妇在中共地下党员护送下，离开香港岛，到达长洲岛，隐居18天后又到达澳门。

——2月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香港西贡成立港九大队，对日军开展城市游击战。

——2月 港九疏散委员会留港负责人刘少文致电中央书记处，报告“全体同志及朋友”均已安全撤离香港。

——2月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国际统一战线部，负责营救香港俘虏营中的国际友人。

——春 游击队的白石龙医务所请知名文化人士中的病理学家吴在东教授、军医陈汝棠等授课。

——春 中共惠阳县委派卢伟如等以昌业公司名义在惠州建立

水东街交通站。廖承志派廖安祥到惠州水东街大东旅店开办源吉行商号。此两处与农工民主党特委机关东和行商号一起，成为营救香港文化人的重要站点。

——春 廖承志派乔冠华到韶关，与“侨兴行”经理陈炳传（地下党员）等一起建立接应香港文化人的联络站。

——春 南方局指示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李亚群等，负责接待由香港脱险到达桂林的文化人。

——3月4日 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致张文彬电报，就香港撤退的文化人安置问题做出指示。

——3月7日 洪深、田汉、夏衍创作的反映香港沦陷与逃亡的话剧《再会吧，香港》，由新中国剧社在桂林首演。5月，由桂林集美书局出版单行本。

——3月19日 港英政府运输署负责人波利斯屈特夫人和香港英籍警司汤姆生逃出赤柱集中营，经东江游击队护送出香港，于24日进入国军粤东南防区。

——3月29日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机关报《前进报》创刊，社长杨奇。

——3月 英警司谭臣、少校祁德尊等先后逃出香港集中营，在游击队护送下到达东江游击区。

——3月 连贯到兴宁，护送柳亚子父女到老隆，至4月中旬，柳亚子等到达韶关。行前柳亚子赋诗赠别连贯等人。

——4月中旬 邹韬奋离开白石龙游击区到惠州，至下旬到老隆。因国民党特务搜捕，邹韬奋避往梅县畲坑江头村。

——4月 戈宝权、沈志远离开东江游击区阳台山赴重庆。

——4月 科学家和儿童文学作家高士其，在黄秋耘护送下，逃离香港，到达广州。后经清远到达韶关。

——4月9日 周恩来在重庆听取夏衍关于香港沦陷时文化界人士安全撤离的情况汇报，关注柳业子、邹韬奋、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并要求夏衍在重庆争取公开合法，以文化人面貌做统一战线工作。

——4月 周恩来得悉国民党下令通缉邹韬奋后，立即电告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一定要让邹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

——5月初 文化服务社社长刘伯闵（CC系文化特务）受蒋介石之命到桂林，邀请由港归来的文化人去重庆。刘拜访张友渔、沈志远、千家驹、金仲华、梁漱溟等人，都没有结果。

——5月5日 在国民党驻港澳情报机构帮助下，陈寅恪一家逃离香港。之后到达广州湾（湛江）。26日由广州湾出发往桂林。

——5月 廖梦醒与叶挺夫人、女儿等在梅文鼎陪同下，离开澳门，经台山等地，辗转到达重庆。

——5—6月 国民党制造“南委、粤北省委事件”。5月30日，廖承志被捕。6月初，张文彬被捕。

——6月初 连贯告知郑展，粤北省委遭破坏，廖承志被捕，上级要他撤退去东江部队，交代郑展要想尽办法安全护送邹韬奋脱险。

——6月 茅盾著《劫后拾遗》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反映香港战争前后生活的中篇小说。

——7月 英军服务团前方办事处在惠州成立，与东江纵队合作开展营救工作。至1943年8月，因国民党当局阻挠，合作中断。

——7月 胡绳离开东江游击区阳台山。

——9月27日 邹韬奋在郑展等护送下离开梅县江头村，前往韶关。10月，转到上海。

——11月22日 在地下党护送下，邹韬奋抵达新四军根据地苏中三分区如西县（今如皋）江安区。

——11月下旬 苏中联抗司令部在曲北区王家庄（今海安县胡集乡）紫石中学举行欢迎邹韬奋大会。邹在讲话中简述了从香港经东江辗转至苏中解放区的经过。

——12月 盛此君、新波、杨秋人、温涛、郁风、特伟6位画家创作的“香港的受难”画展在桂林举行。

1943年1月 中共广东临时省委成立，书记尹林平。

——2月5日 由宋之的的创作，洪深导演，中国艺术剧社主办的多幕剧《祖国在召唤》在重庆首次公演。该剧反映了省港大营救的经历。

——2月 中共广东临时委员会和东江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在香港新界乌蛟腾村召开。

——4月13—15日 特伟等6位画家创作的“香港的受难”画展，由中英文化协会主办，并增加叶浅予、丁聪、林仰崢3位画家作品，在重庆展出。被东江游击队营救脱险的陈策将军撰文介绍此次画展。4月16—19日，该画展又在中苏文化协会展出。

——11月 以群创作的话剧《姊妹行》，由重庆东方书社出版。该剧以香港沦陷为题材。

——12月2日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尹林平。

——12月 蔡楚生创作的话剧本《自由港》，由重庆文风书局出版。该剧以香港沦陷为题材。

1944年2月11日 美军空军由桂林空袭香港，克尔中尉因飞机被击中而跳伞到新界，为东江纵队营救到东江根据地。

——5月2日 东江纵队在大亚湾救出盟军美籍机师勒夫哥中尉等5人。

——6月11日 5位获救的美军飞行员给东江纵队致感谢与致敬信。

——7月1日 东江纵队成立东宝行政督导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主任谭天度。

——7月24日 邹韬奋逝世于上海。10月12日，东江纵队发出《给邹韬奋同志家属的唁电》。12月9日，东江纵队政治部编辑的《韬奋先生逝世纪念特刊》由前进出版社出版。

——8月 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在大鹏半岛土洋村召开。此后建立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0月7日 美军派欧乐义博士到东江纵队司令部，双方开展情报等方面的合作。

——10月12日 袁水拍创作于东江游击区的诗《阳台山之春》在《新华日报》发表。

1945年1月16日 东江纵队救护美军十四航空队依根中尉和第二舰队飞行员克利汉少尉。

——3月 美军海军与东江纵队合作，在东江地区进行沿海测量工作。

——4月 东江纵队成立惠东行政督导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主任练铁。

——7月 美国《美亚杂志》发表《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延安《解放日报》于9月11日转载此文。

——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附录三

《南方》杂志对大营救研究成果的报道



## 大营救与大统战

——当我们谈“省港大营救”时，我们在谈什么

蒋 玉 李梦醒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数百名遭到日军搜捕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在日寇的重重封锁之下，突然在孤岛“蒸发”般地神秘消失，几个月后，却又安然出现在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一时之间，敌人为之震惊，世界为之刮目。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没有硝烟的秘密转移和非常行动。

转战粤、港、澳，历时近一年，行程两万里，营救出800多人，没有牺牲一个人，没有被捕一个人，这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省港大营救”，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是中国文化界的“肖申克的救赎”。穿越历史厚重的尘埃，回到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今日的人们难以想象，80年前这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组织的大营救，曾经历了何等的困难和凶险。

因为“省港大营救”，中国的“文脉”和精英得以保护；因为“省港大营救”，革命和文化统战的种子深深地播撒在了营救的过程与道路上；因为“省港大营救”，茅盾、夏衍等一大批承载中国千年文脉的文化精英，各自奔赴战场，继续进行抗战救亡运动，传承着红色火种，并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当我们在谈“省港大营救”时，我们在谈什么？是抢救，是文脉，还是文化统战？在“省港大营救”8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南方》杂志记者跟随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调研组，沿着当年文化名人的足迹，再走深圳、惠州营救路线，寻访发掘当年的传奇故事，实际上也展开了一场在文化统战研究视野下的学术“再抢救”……

从本期开始，《南方》杂志开设《广东红色文艺百年》专栏，梳理百年里广东发生的重大文艺事件，访问广东文艺名家，展现广东文艺的厚重红色传统、百年精彩瞬间。敬请关注！

——原载：《南方》杂志，2021年第9—10期合刊。

## 最伟大的抢救



惠州东湖旅店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

- ◎ 《南方》杂志记者 / 李梦醒 发自广州、深圳
- ◎ 本文责编 / 蒋玉

80年前的中国，战火纷飞。80年后的中国，充满希望与活力。而就在80年前的岭南，中国共产党曾主导这样一场非常营救，将当时中国的文化精英、国际友人秘密保护和转移，让中国文脉得以保留。而今，人们重新学习和审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才深知这场非常行动对当时与当下，乃至未来中国的深刻影响。

## 深圳“小延安”白石龙村

“近期，慕名而来参观的游客和团体特别多，馆里的接待压力有点大。但我们依然将此转化为动力，做足准备迎接新的挑战。”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执行馆长张紫歆放下案头工作对《南方》杂志记者说。

几间平房、一方刻着人物浮雕的围墙，在高楼林立的深圳，这是一处看似不起眼的建筑，略带几分古意和沧桑。从深圳北站步行一公里左右，就能到达位于深圳龙华区民治街道白石龙社区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走进僻静的小院，三棵百年老榕树、当年作为营救“中转站”的天主教堂（旧址）都是“省港大营救”的历史见证。

1941年12月25日，经历了“黑色圣诞夜”的香港沦陷。在馆内陈设的历史照片和资料中，人们能够深深感受到沦陷后的香港危机四伏，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当时因“皖南事变”来港并继续抗日宣传和民主活动的大批文化名人处境更岌岌可危：日本侵略者妄图逼迫他们公开表态支持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邹韬奋、柳亚子等人更是登上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黑名单”，要求抓捕。此时，中共中央及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多次急电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廖承志等人，要求其组织协助文化界知名人士安全离港。

很快，在廖承志的指挥下，港九地下工作人员通过报社和书店等文化人密集出入的场所，与频繁搬家的他们取得联系。1942年1月9日晚，廖承志等人终于成功集结起第一批离港的茅盾、邹韬奋、叶以群、戈宝权等及其家人。众人乔装成被日军要求离港的难民，趁巡逻的士兵换岗时，藏在木船舱板下，趁着茫茫夜色从香港铜锣湾渡海抵达九龙红磡。



深圳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内



深圳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内

从九龙出发，经元朗十八乡、大帽山，再从落马洲渡深圳河，最终到达宝安抗日根据地。这条被称为“省港大营救”的西行线路，也是大营救中撤离人数最多的一条路径。当时白石龙村的民居差不多被日军烧毁殆尽。铺稻草、打地铺，白石龙村唯一留存较好

的天主教堂，成为他们从香港脱险后在内地游击区停留的第一站，之后又转移到阳台山上的草寮。

如今，在纪念馆内，人们可以通过复原遗址看到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和爱国人士当年亲历的救援和在草寮招待所的生活场景。尽管条件艰苦，但白石龙村依然被称为“小延安”。停留不到一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又紧急将他们撤离，白石龙村几天后便受到了国民党军队袭击。

惠州东湖旅店、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的福建会馆……此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独立队开辟了三条水路和一条西部陆路撤离交通线。第一条东部水路撤离交通线从香港岛到九龙，再到牛池湾，最后到达惠阳的田心村。廖承志、乔冠华等人从这条线路撤离。第二条东部水路撤离交通线从香港岛到长洲岛，再坐船到马宫上岸，前往海丰。何香凝、柳亚子等人从这条线路撤离。第三条水路撤离路线从香港岛到长洲岛，再经澳门前往内地。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前往惠州调研

多方辗转、摸黑前行，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工作，中共粤、港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从港九地区胜利营救出近800名国内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对此次大营救，茅盾在《脱险杂记》中评价说：“这是难以想象的周密安排，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真是一场秘密大营救。”

### 抢救“大营救”

“大营救的意义在于体现了忠诚于党、勇于担当、冒险犯难的革命精神，过硬的对敌斗争能力，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发动群众，争取多方支持的动员能力，身先士卒，胸怀宽广，凝聚人心的感召力……”这是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务处一级调研员刘伟炬所在的课题组与记者采访讨论时在记录本上写下的文字。

79年前，在深圳白石龙村隐蔽期间，邹韬奋、茅盾等文化名人欣然应邀为村民授课。在邹韬奋的提议下，游击队创办的《新百姓报》和《团结报》合并为《东江民报》，邹韬奋还亲自为《东江民报》题写报头，茅盾为副刊题写“民生”二字……这些精彩感人的历史细节，是获救文化名人与广东军民之间深厚情谊的生动见证。

不仅如此，游击队千方百计营救国际友人还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更促进了反法西斯联盟的团结。新中国成立后，这批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从日寇屠刀下抢救出来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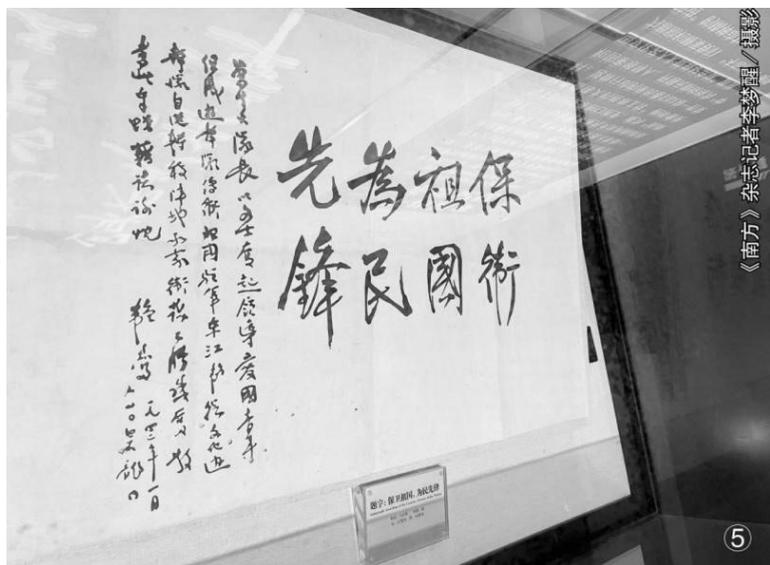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如今看来也是一样。在改革开放时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如何提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认识，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走向更好的发展道路，这段文化统战的历

史依然给后人无数启迪和思考。”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负责人、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鲁开垠教授这样探究“省港大营救”历史的时代意义。

在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二楼展厅，有这样一个展览常吸引来此培训的各地学员——“统战实践之源，改革先行之地——广东统一战线历史性贡献专题图片展”。除了这样一个陈列了珍贵图片、资料的展览，学院冯颖红教授等关于“百年党史——广东统一战线历史性贡献”的讲课内容，也早已深入到各个不同层面的课堂当中，让来自各领域的学员学习到了广东党组织和统战系统在各个历史时期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工作精神，为统战工作实践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的重要内容。研究越深入，冯颖红的感受越深刻：广东省作为统战实践策源地“省港大营救”重要阵地和改革开放统战工作先行地，在百年党史中，统一战线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是我们研究计划的第一年，课题组正在按计划沿着‘省港大营救’的旧址、线路开展调研、座谈、访谈，收集资料……”鲁开垠向记者介绍，为了研究好“省港大营救”这一段历史，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从上到下充分调研，以课题组为主要研究力量，制定了严密的三年研究计划。从调研到课题研究、著作撰写、出版及专家研讨会，研究工作的每一步开展都经过了仔细考量，专家学者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通过已有的调研，我们发现资料收集的难度还是很大，这是我们面对的最大困难和考验。首先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80年，几乎没有历史现场见证人，除了凤凰卫视拍摄的相关节目、我们已收集到的著作和回忆性文章外，史料的完整性还是不够。此外，我们省在‘省港大营救’上有深入研究的学者队伍还不成规模，这也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缺乏参考和溯源。”冯颖红说道。



被营救的文化人士邹韬奋为表达感激之情，为曾生题词：“保卫祖国为民先锋”

面对困难，课题组发动各方力量，联系各地党史办、档案馆寻找珍贵史料，继续加快调研步伐，为今年发布“省港大营救”研究报告做足准备。“我们希望此次课题研究能够充分显示学院的特色，从人文统战的角度、学术的切入点，将历史资料的收集、历史的还原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还原和丰富这段大营救历史的时代价值。”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肖莉介绍道。

### 让更多的人看见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各地对这段历史的建筑物、遗留线索等保护和开发程度并不相同，目前保护比较好的是深圳和惠州两处。”在采访过程中，肖莉向记者说明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今年4月，为庆祝建党百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多条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其中东纵抗战历史文化游径就涵盖了深圳龙华区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惠州的东湖旅店、河源的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旧址。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的专家学者们认为，历史文化尤其红色文化本身就是红色教育资源、文旅资源，保护好现存的遗址、展馆等，对开展各个层面人群的现场学习都很有帮助。但如何充分与当地文旅资源保护开发、社会经济发展充分结合，亟待高层和顶层设计并纳入地方规划发展中，而目前针对人们对“省港大营救”这段历史的普遍认识和相关旅游路径的开发来看，“省港大营救”历史的民众普及度还不够高、相关的研究少、文献及文物收集困难，更难以提及对此进行旅游产业的设计以及建立省一级博物馆的设想。

年轻的馆长张紫歆也有同样的苦恼和期待：“文物、资料的收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我们作为区一级的纪念馆，实在难以支撑相关整理和研究工作，需要专项经费、专业人才以及职能部门的指导。”

为迎接建党百年，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除了已有陈列、展览，还将与深圳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等机构合作，在馆内开设被营救文化名人专题展，如何香凝专题展、茅盾专题展、丁聪专题展等。不仅如此，深圳市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还作为牵头单位，正在开展《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大辞典》的编撰和以夏衍的《再会吧，香港》为基础的话剧《风雨归舟》的排演。

“不少被营救的文化名人的后代曾来到纪念馆参观，不仅帮助我们加强了对当年历史的梳理，也加深着海外侨胞、文化人士后代等人群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以及民族自豪感。我想我们有着这样一个使命，就是让纪念馆无论从文创开发还是文献研究、陈列展

览等都不断进步，不断提升影响力，让更多人了解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张紫歆说。

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人看见，对于历史的抢救与保护比想象中更加艰难。它不仅需要如同历史发生时一样的迫切与勇敢、智慧与担当，还需要人们以深远的目光看待这一次营救行动：走前人之路，追希望之光。

——原载：《南方》杂志，2021年第9—10期合刊。

## “省港大营救与文化统战”研究的时代价值

◎ 冯颖红（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广东文化工作部主任、教授）

◎ 本文责编 / 蒋玉

发生在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省港大营救”，不仅轰动全国，而且震撼世界。这个被茅盾誉为“抗日战争以来最伟大的抢救”，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开展“省港大营救与文化统战”研究，从文化统战视野对“省港大营救”的历史背景、组织营救及过程进行全面的梳理，串点成线，还原场景，凝练其当代价值，对于发展和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省港大营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生动的文化统战实践

所谓文化统战是相对于政治统战与经济统战而言，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中开展对文化界人士的团结工作，或者通过文化的方式和载体开展的统战工作。“省港大营救”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开展对被困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的营救，是中国共产党团结知识分子同心抗日的生动实践。

1941年12月8日，日军全面进攻香港，当月25日香港沦陷，英港督向日军投降。日本特务龟田正雄手下借机抓捕发表过反日言论的文化名人，并点名要茅盾、邹韬奋、梅兰芳等人向日军司令部

“会面”。国民党也趁乱派人进入香港，四处寻找并企图抓捕遭受其政治迫害而聚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战争铁蹄下的在港文化名人及爱国民主人士，处境十分艰险。

为了保护在港文化人的生命安全，保存中华文化血脉，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先后几次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发来急电，指示必须千方百计组织力量将被困在香港的数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全部营救出来。廖承志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香港党组织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进行了紧急研究和精心部署，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终于突破日军的严密封锁，从敌人眼皮底下把近800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及其家属营救出来，并安全护送他们到达抗日大后方。

“省港大营救”抢救出深陷日军虎口险境的一批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保存了中华文化血脉，推动了抗日民族精神高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共患难的亲密关系。正如被营救者张友渔在1985年4月29日回忆这段历史时所说，这次抢救工作，充分体现了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我军同革命知识分子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同时，营救出来的还有国民党军官余汉谋的夫人、国民党军官陈汝棠等，此外还有英、美、荷、比、印等国际友人近100人。1946年7月，英国外交部代表在下院报告，对东江纵队及其团体协助盟军逃出香港的服务工作，表示“钦佩”。大营救大大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壮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场文化人的大营救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化统战实践，其影响超越了“省港”，是一场影响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大营救。

## “省港大营救”深化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统战思想的内涵

“省港大营救”之所以被称为“最伟大的抢救”，它不仅意味着几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虎口脱险、无一伤亡的营救结果，而且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统战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一思想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涵：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大营救胜利的根本保证。当得知在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深陷险境之时，中共中央果断作出决定，并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组织营救，确保在港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这与国民党顽固派派人到香港抓捕文化名人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香港党组织、广东党组织以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对大营救进行精确部署并全力投入，最终取得大营救的胜利。

第二，保护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安全是大营救的使命任务。大营救的主要对象是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他们在抗战时期为了躲避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撤离国统区前往香港。他们到香港后，组建新的文化阵地，开展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如范长江和邓文钊创办、胡仲持主编的《华商报》，茅盾主编的《笔谈》，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等刊物，宣传抗日主张，呼吁民众团结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动了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也带来了香港抗战文化的繁荣。此外，中共党内文化骨干张友渔、夏衍、胡绳等人建立中共香港文化委员会，协助廖承志开展文化统战工作，为后来营救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因此，他们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对他们的营救与保护，实则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营救和保护，也是对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反对蒋介石集团发动反革

命内战、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力量的营救和保护，更是对建设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才力量的营救与保护。

第三，文化统战干部的忠诚与担当是大营救胜利的关键所在。夏衍在1985年回忆“省港大营救”时说：“秘密大营救是我们党史、军史上的一件难忘的大事。岁月流逝，年复一年，大营救已经是四十五年以前的事了，被营救出来而还活着的人，永远忘不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往事，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大营救也以生动的事实，说明了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事，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大营救的线路是一条在港文化人的生命通道，这条生命通道所经之处，无不体现了统战干部的忠诚与担当，他们忠诚于党，服从党组织的命令，践行自己的誓言，宁愿牺牲自己甚至亲人的生命，也要牢牢地支撑起这一营救文化名人的生命通道，以保证被营救者的万无一失。在参与大营救的人士中，历史记载下来的有名有姓的不多，更多的是无名英雄。充分体现了党的统战干部忠诚于党、勇于担当、知难而上的革命精神，过硬的对敌斗争能力和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发动群众、争取多方支持的动员能力，身先士卒、胸怀宽广、凝聚人心的感召力。东江纵队司令曾生后来在战斗总结中写道：省港大营救不仅拯救了中国一代精英人物的命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这次任务中得到锻炼，成长壮大，成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

### “省港大营救”是粤港澳大湾区人民共同的文化记忆

“省港大营救”的胜利是党组织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广东游击区军民无私奉献和付出的结果。它是广东人民包括香港、澳门人民集体共有的文化记忆。

广东之所以成为“省港大营救”的主阵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广东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革命传统。广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本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的策源地、发祥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广东人民又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组建抗日游击队，英勇抗战，保护家园。忠于革命忠于党、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红色文化基因，已经深深融进了广东人民的血液里，成为今天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最亮丽的底色。

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今天，从文化统战的视野研究“省港大营救”，挖掘大营救这段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讲好大营救文化统战故事，唤醒粤港澳三地民众共有的历史文化记忆，对于促进粤港澳融合发展，共建“人文湾区”具有时代意义。

——原载：《南方》杂志，2021年第9—10期合刊。

## 参考文献

### 一、著作及资料汇编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周恩来. 周恩来书信选集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周恩来年谱 (1898—1949) [M].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朱德. 朱德选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塔克. 马克思主义革命观 [M]. 高岸起, 译. 北京: 人民出

版社，2012.

希尔斯. 论传统 [M]. 傅铿, 吕乐,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 南方局党史资料3统一战线工作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广东省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 上册 [G].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编纂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

许振泳, 等.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G].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1992.

曾庆榴. 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香港历史博物馆. 香港抗战: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论文集 [G]. 香港: 香港历史博物馆, 2004.

廖承志. 廖承志文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曾生, 王作尧. 论东江纵队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尹林平》专集编委会. 尹林平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广东省档案馆. 梁广的革命人生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1.

《连贯同志纪念文集》编写组. 贤者不朽: 连贯同志纪念文集 [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东江党史资料汇编第三辑抢救文化人史料专辑. 惠州: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 1984

刘中国,余俊杰.白石龙大营救文献[G].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

余俊杰,刘中国.白石龙大营救始末[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

杨奇.惊天壮举:虎穴抢救文化精英与秘密护送民主名流[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尚明轩.何香凝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

廖梦醒.我的母亲何香凝[M].香港:朝阳出版社,1973.

茅盾.脱险杂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桂林分会.二十九人自选集[M].中华文艺界协会,1946.

陈坚,陈奇佳.夏衍传[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

袁鹰,姜德明.夏衍全集·文学·上[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夏衍.懒寻旧梦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6.

范苏苏,王大龙.范长江与青记[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8.

方蒙.范长江传[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邹韬奋.经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何小林、郭际.胜利大营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李洪涛.大师的密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

马勇.中国圣雄 梁漱溟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6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 王晶焄, 王学庄, 孙彩霞. 柳亚子选集: 下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 梁政海. 南天琐记 [M]. 香港: 南方人民出版社, 2008.
- 骆国和. 湛江珍闻 [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 秋石. 绘得红楼铸青史 [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5.
- 任丽群. 萧红传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20.
- 张云乔. 旧梦拾零 [M]. 中国烟草博物馆, 2004.
- 屈小强, 李拜天. 陈寅恪 [M].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20.
- 萨空了. 香港沦陷日记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 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 抗战时期西南的交通 [G].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2.
- 王德金, 徐霞. 永远的怀念——纪念端木蕻良一百周年专辑 [M]. 铁岭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政协昌图县委员会, 2012.
- 王文政. 千家驹年谱 [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4.
- 徐卫红. 陈寅恪画传 [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7.
- 姚蓝, 邓群. 谢和赓传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8.
- 中国电影家协会, 中国电影资料馆. 百年司徒慧敏 [M].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0.
- 复旦大学历史系.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 (1931—1945) [G].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 闫骥爽, 张雪峰. 秘密大营救与护送民主文化人士北上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1.
- 杨奇. 香港沦陷大营救: 1941—1945 [M]. 余非, 改编. 香港: 三联书店 (香港) 有限公司, 2014.
- 黄秋耘, 夏衍. 秘密大营救 [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6.

莫岳云. 广东统一战线史(1921.7—2011.7)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8.

卢玮銮. 香港文踪: 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 [M]. 香港: 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 1987.

杨永, 等. 海丰风情录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1.

张军民.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 二、论文等

习近平2021年5月31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徐文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柳亚子香港脱险记 [N]. 团结报, 1983-06-18.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大事年表. 广东文史资料: 第40辑 [G].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千家驹. 忆抗战生活片断 [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 第98辑.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侯介夫, 党德信, 可之. “人生有真爱快乐在贞一”: 访沈钧儒之女沈谱 [J]. 海外文摘, 1985(11). 大陆生活纪实 [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

管林. 东江人民抗日武装与柳亚子香港脱险 [J]. 惠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1).

李雪枝.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 (4).

李军晓.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述略 [J]. 抗日战争研究, 1997 (3).

张培德. 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向香港的迁徙 [J]. 史林, 2002 (4).

齐春风. 抗战时期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 [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3 (3).

杨汉卿.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统战工作 [J]. 广东党史, 2005 (6).

蔚建民. 抗战初期的廖承志与香港《华商报》 [J]. 中国记者, 2005 (8).

葛美荣. 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化和内地文人向香港的迁徙 [J]. 四海钩沉, 2010 (5).

臧运祜. 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 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 [J]. 社会科学研究, 2011 (5).

吕传彬. 香港沦陷前后中共秘密营救驻港进步人士始末 [J]. 历史足音, 2013 (6).

潘琦. 中共在香港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J]. 党史博览, 2014 (12).

杜俊华, 赵小洁. 论抗战时期中共对港澳当局的统战工作 [J]. 甘肃社会科学, 2014 (3).

曹二宝. 抗战时期的香港与中国共产党 [J]. 中国法律评论, 2015 (3).

蔡惠尧. 周恩来对日本南进战略的认识与香港秘密大营救 [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5 (7).

杨斐然. 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政治动员工作研究 [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5.

李向峰. 抗日战争中的秘密大营救 [J]. 党的生活 (黑龙江), 2016 (1).

侯萌萌. 浅析抗战时期中共报刊的新闻宣传策略: 以香港《华商报》为例 [J]. 新西部, 2017 (4).

司徒新梅. 电影《明月几时有》背后的历史故事: 父亲司徒慧敏回忆抗战时的香港大撤离 [N]. 北京青年报, 2017-07-12 (B6).

李慧. 1942香港大抢救: 部分文化爱国人士踪迹寻找始末 [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 (4).

孙扬. 全面抗战时期香港国共两党组织工作析论 (1937—1941) [J]. 抗日战争研究, 2020 (2).

游海华. 抗战时期香港秘密大营救若干问题考辨 [J]. 党的文献, 2020 (4).

陈启兵. 抗战时期的香港烽烟 [J]. 抗战风云, 2020 (8).

左双文. 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南沦陷区的抗日斗争 [J].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2021 (2).

游海华. 抗战时期香港秘密大营救若干问题续考 [J].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1 (3).

惠州开放大学, 惠州市委党史办, 东江干部学院联合课题组. 书写红色新闻史的华彩乐章: “秘密大营救”中的新闻巨子群像 [N/OL]. 惠州日报, 2022-11-08.

## 后 记

编写《省港大营救与文化统战研究》是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港澳和海外统战工作理论广东研究基地（以下简称“广东研究基地”）的一项重要任务。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是广东研究基地的共建单位之一，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港澳和海外统战的史料挖掘、理论研究和政策宣传工作。本书的编写工作自2020年立项以来，先后得到黄宁生、王瑞军等广东省委领导的亲切关怀。广东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郭汉毅，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吴显标在编写过程中给予指导。2021年，广东省委统战部将本书纳入广东研究基地的课题。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成立本书撰写组，在深入调研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形成初稿后反复修改，于2022年11月完成全书的撰写工作。

本书撰写工作在广东省委统战部、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领导班子领导下进行，由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鲁开垠教授担任主编，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冯颖红教授和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肖莉担任副主编，组织相关人员撰写。除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相关人员参与外，还邀请了部分地级市社会主义学院专家参与撰写。

本书框架策划和各章节撰写人员如下：全书写作大纲策划，鲁开垠；前言，肖莉；第一章，省社院副教授陈童敏；第二章，陈童敏、省社院副教授谭建军；第三章，省社院副研究馆员张山、省

社院一级调研员刘伟炬、陈童敏、省社院教授林少红、省社院讲师杜联藩、韶关社院副教授田千山、惠州社院副教授张婷；第四章，冯颖红、省社院教授杨竞业；第五章，冯颖红；第六章，省社院教授林伟；附录一，冯颖红、张山、刘伟炬；附录二，刘伟炬；附录三，冯颖红；后记，冯颖红。张山、刘伟炬、陈童敏对书稿进行编审，冯颖红、肖莉进行全书统稿，鲁开垠对书稿进行审改。

本书作者多为广东研究基地专家。<sup>①</sup>

本书撰写、出版工作得到了广东省委统战部有关领导同志、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帮助，得到了省内各地统战部门、各市社会主义学院的鼎力支持，也得到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华南理工大学莫岳云教授对本书的修改完善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谨向上述单位和个人以及所有为本书撰写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并对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阅过的论文和专著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书中引用的资料有可能因疏忽未能逐一注明出处，敬请谅解。由于水平不足，对省港大营救的资料掌握有限，不够周到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

<sup>①</sup> 鲁开垠，广东研究基地原副主任、专家；肖莉，原副主任、专家；冯颖红，副秘书长、专家；林伟、张山、林少红、谭建军、杨竞业均为基地专家。